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历史与现实

鲁修文 编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形成和发展·····	(1)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	(2)
一、产生的时代特点、历史条件和思想状况·····	(2)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14)
第二节 在三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24)
一、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 取得了胜利·····	(25)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使马克思主义 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27)
三、粉碎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无产阶级 专政思想的胜利·····	(33)
第三节 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完成·····	(37)
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37)
二、转变的思想渊源·····	(40)
三、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转变·····	(42)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44)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 (1921~1930年)·····	(44)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1930~1937年)·····	(49)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1937~1949年)·····	(51)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949~1957 年)	(54)
五、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1957~1976 年)	(57)
第二章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61)
第一节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化	
.....	(62)
一、反对主观主义的理论结晶	(62)
二、主观主义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实际工作中的	
具体表现	(64)
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	(66)
第二节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	(68)
一、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就是实际	(68)
二、从运动着的客观事物的特点出发,就是	
从实际出发	(69)
三、理论联系实际	(71)
第三节 尊重客观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	(72)
一、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73)
二、主体的能动性只有人类才有	(74)
三、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77)
第三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79)
第一节 《实践论》的问世及其意义	(79)
一、《实践论》的问世	(79)
二、《实践论》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提供了理论依据	(82)
三、《实践论》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传播与	
普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85)

第二节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和 发展	(89)
一、完整地概括实践的内涵及其特点	(89)
二、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90)
三、系统地阐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 作用	(92)
第三节 《实践论》对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深刻揭示	(99)
一、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及其相互关系	(100)
二、科学概括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105)
三、提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 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	(108)
第四节 《实践论》对认识真理的道路和真理 发展规律的揭示	(110)
一、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绝对真理	(110)
二、对真理的认识永远不会穷尽	(113)
三、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114)
第四章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 辩证法的中国化	(115)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宇宙观	(116)
一、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117)
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120)
第二节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124)
一、矛盾的普遍性	(125)
二、矛盾的特殊性	(129)
三、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与 相互转化	(133)
第三节 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	(138)

一、主要的矛盾	(139)
二、主要的矛盾方面	(144)
第四节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146)
一、矛盾同一性范畴的规定	(146)
二、矛盾斗争性范畴的规定	(152)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155)
四、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164)
第五章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167)
第一节 毛泽东的战争观	(167)
一、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168)
二、战争与革命的关系	(170)
三、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173)
四、战争中人和物的关系	(175)
第二节 毛泽东论战争中认识的辩证过程	(178)
一、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是发展的	(179)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也是 变化发展的	(183)
第三节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185)
一、进攻与防御	(186)
二、持久与速决	(188)
三、内线与外线	(190)
四、兵力的集中与分散	(191)
五、主动与被动	(194)
六、全局与局部	(195)
七、胜利与失败	(197)
第六章 毛泽东经济建设辩证法思想	(199)
第一节 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	(199)

一、依据我国经济的内在矛盾,制定正确的 经济政策	(199)
二、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的内部关系,探索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202)
三、正确认识沿海工业与内陆工业的关系, 促进工业的发展	(205)
四、正确认识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关系, 促进经济建设的全面高涨	(207)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	(209)
一、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尊重中国国情的 现实	(209)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212)
三、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是经济 发展的必由之路	(216)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人民 生活的关系	(221)
一、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221)
二、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	(222)
三、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224)
第四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自力更生与 对外开放	(226)
一、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	(226)
二、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	(229)
第七章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	(234)
第一节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234)
一、“社会基本矛盾”概念的提出	(234)
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 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	(239)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	(244)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办法	(248)
第二节 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249)
一、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主要贡献	(250)
二、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几点理论探讨	(256)
第三节 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	(264)
一、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提出 及其意义	(264)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 主题	(268)
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271)
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	(275)
一、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	(275)
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278)
第八章 毛泽东辩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论	(281)
第一节 科学的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	(281)
一、世界观就是方法论	(282)
二、方法论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哲学	(284)
第二节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285)
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与党的群众路线	(285)
二、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287)
第三节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288)
一、分析与综合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	(288)
二、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291)
第四节 调查研究的方法	(292)
一、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	(292)

二、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294)
第五节 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298)
一、民主和集中及其相互关系	(298)
二、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298)
三、实现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300)
第九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304)
第一节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恢复和发展	(304)
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304)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307)
第二节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恢复、运用和 发展	(314)
一、根据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	(315)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斗争性与同 一性的辩证关系，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318)
三、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22)
第三节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326)
一、社会基本矛盾与体制改革	(327)
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334)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38)
第十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347)
一、在唯物论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发展了“实践的唯物主义”	(347)
二、在认识论方面，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上， 系统论证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349)
三、在辩证法方面，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的 高度，集中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	(350)

四、在历史唯物论方面,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的统一上,着重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352)
五、在军事理论方面,全面发挥了马克思主义 军事辩证法和认识论	(353)
六、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 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354)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① 这就是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的独创性的经验，作出的理论概括，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来说，都具有它自己的显著特点。这不仅是由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92页。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世界东方大国——中国的大地上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现代世界的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

一、产生的时代特点、历史条件和思想状况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欧洲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由于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列宁为了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此时已不属于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属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如何进行，又是世界革命史上从未遇到的一个新的实践课题。

虽然列宁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地解决时代提出的这一新任务。因此，这个崭新的任务只能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解决了这个时代提出的新任务。

首先，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处于各种复杂而又激烈的矛盾之中，成为东方各种

矛盾的焦点。

其次，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人民的贫苦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而中国又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

第三，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起，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最激烈的一块肥肉。帝国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就必然要导致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从当时中国本身的社会政治条件来说，自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奴役和灭亡中国的目的，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侵略，而且他们还任意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致使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清朝政府也更加腐败，特别是在辛丑条约后，他们为了保持其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卖身投靠帝国主义，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相互勾结起来，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掠夺的罪恶勾当，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所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残忍，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从社会经济条件来说，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在灭亡的恐怖之下，采取了某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帝国主义资本的入侵，它又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发展很微弱。因此，摆脱外国压迫和封建束缚，发展资本主义，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把发展实业，发展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因而，尽管他

们对资本主义采取某些批判态度，客观上只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

帝国主义虽然在侵略中国时发了横财，但也造就了反对他们的革命势力，造就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造就了千百万破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

革命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改变国家命运，挽救民族危亡，在积极向西方学习、探讨各种救国方案的同时，在日本和西方也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之间严重对立。他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接触到马克思的名字及其学说的，因而也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解决社会危机和社会不平等的新学说予以关注和介绍，使中国人开始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新的学理，这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他们并没有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没有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

从当时的国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虽然已广为传播，但自恩格斯逝世后，由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搞议会斗争，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就既涣散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也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的流传。而且第二国际又把殖民地问题排斥在民族问题之外，把它看作是同社会主义无关的，不愿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指导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就使落后的国家更难有机会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流传的社会主义，主要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他们不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各项原则的发展，而且是为着这些原则彻底的实现而进行宣传的。另外，无政府主义也被当作一种“最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潮，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在以上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

义，并把它作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和医治社会弊病的最新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很可贵的。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以上情况，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传播开来，更没有形成思想运动，只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被歪曲和误解。

从现有资料来看，在中国史籍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则是由当时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创办的中文刊物《万国公报》，它在广泛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同时，也顺便地提到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日益扩大，到日本和欧美的留学生也逐渐增多。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连遭失败的情况下，他们急于寻求救国的新路，而日本也恰于此时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所以他们在学习西方思想的同时，也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并在他们出版的刊物上进行了介绍。中国人民自己写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始于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提到：“麦喀士（马克思——引者注），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之德国，有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一曰尼志埃（尼采——引者注）之个人主义。麦喀士之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服。”1903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上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以及46、47、48号合刊上发表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两篇文章中谈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动为百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万国公报》的记载相比较，比李提摩太称马克思的学说为“安民新学”，意义要明确一些。同时，

梁启超指出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而且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是少数强者压服多数弱者，资本主义社会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的社会”。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比起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介绍，就前进得多了。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梁启超，尽管他是中国人中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但他对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而且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却极尽歪曲之能事，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同中国古代井田制作了不伦不类的类比，说什么“中国古代井田制正为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随着新刊物的增多，谈论马克思主义的也就多起来了。就在梁启超写《中国之社会主义》的同一年，即1903年的2月，《译书汇编》里就有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发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极盛于德国马克思。“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释历史之人也，马克思尝谓的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①同时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的贫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书目。在同时期出版的《新世界学报》也介绍了傅立叶、欧文和马克思的不同学说。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因，是“社会的不平等而贫富之悬隔，贵贱之区别有以致之也。……下等人民之对富豪，上下之别，迥如天壤，苦心之士，乃为之发世界大不平之理，衷受困苦”^②。《国民日报》在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时指出：该党“向奉马枯士之革命的共产主义以为圭”^③。1903年由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编辑、于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第二号上，刊登了

①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译书汇编》第2年11号。

② 杜世珍：《近世社会主义之评论》，《新世界学报》第12号，1903年3月。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国民日报汇编》第1集。

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的文章，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它说：“共产主义，是派创于法人罢勃（巴贝夫——引者注）也，其后劲则犹太人埋哈司（马克思——引者注）也，今之万国劳动党其见象也。”还把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区别，指出共产主义以德国之埋哈司为代表，无政府主义以法国的帕洛吞、俄人巴宁为代表。共产主义主张废除财产私有制，而归国有。无政府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废除国家，而且手段则为“剑也，铤也，暴烈弹也，阴谋也。”在中国第一次提到了共产主义。当时的《政艺通报》、《翻译世界》、《大陆报》等也都刊载过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除此以外，当时在上海和日本的东京还翻译出版了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等文章。《近世社会主义》一文说，只有马克思“学识深远，思想精致”，“稽资本发达之历史，与现实之资本制相较，以驳他家之诸说，而造自家学理之前提”。颂扬马克思“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为一代伟人”。称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一代之大著述，为新社会主义发明无二之真理，为研习服膺之经典”。《社会主义神髓》则介绍了唯物史观和社会的发展。文章说：“一些社会的变化，政治的革命，其究竟之原因，勿谓出于人间之头脑，勿谓出于一定不变之正义真理。夫惟识生产、交换方法之变化为何。是以勿求知于哲学，惟观于各时代之经济。若夫之日之社会组织，非理也，不正也。如使昨日之正义成今日之非理，昨岁之正义成今日之罪恶，则即其生产交换之方法，渐暗迁默移以去，而其初适当之社会组织，可知已不堪其用也。”这些书和文章虽然存在着不少错误，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和基本观点，说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趋势，则是明显的。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大力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同时，也开始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和社会主义。以孙中

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为了实现其“恢复中华”的志愿，长期奔走海外，寻求革命真理，有机会能对当时已在欧美各国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予以较多的注意。孙中山在1905年春天旅行欧美时，曾到布鲁塞尔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请求加入第二国际，希望从欧美引进社会主义，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为使中国从封建的生产方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生产阶段，他提出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合并进行，“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①孙中山的这种想法诚然是主观的，行不通的，但这也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憧憬。

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这时比较深刻地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感到马克思的学说“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②有加以研究和评价的必要。当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于1905年10月刚刚创刊之时，他就在该报第2号、第3号连续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业绩。同时，他还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些段落的文字和思想以及《宣言》的第二章中的部分内容作了评介。不过朱执信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介绍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不反映出他的资产阶级的折光。比如，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评介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思想时，一方面说：“马尔克（马克思——引者注）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可另一方面他又说：“马尔克之言资本起源，不无过当”。^③他把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存款储蓄混为一谈，把资本家和劳动者混为一谈，说什么“夫资本固非一切为从掠夺得，蓄积之事，

① 孙文：《民报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0月20日。

② 蜚仲：《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1905年11月26日。

③ 蜚仲：《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1905年11月26日。

往往亦自劳动”；“既贮蓄而后用之，以使所生产多，是为资本之始。于是则资本家与劳动为同一人，安有如马尔克所示自掠夺而蓄积者”？^① 宣传资本来源于积蓄和劳动，这就明显地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偏见。

从以上的介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已经开始在中国传播。但是在这个早期传播中，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第二国际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中流传，它并没有和中国的社会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小的。这个时期，少数有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传介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都是出于他们本身的认识和需要；或是作纯客观的介绍，或只是介绍他们可以接受的观点，或者竟是出于反对才作介绍的，在传介中夹杂着歪曲或批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不可能有完整的掌握，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实质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比如，梁启超这个资产阶级改良派，本来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但也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他最早谈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承认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可是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可能的。他说：“完满的社会革命，虽以欧美现在之程度，更历百年犹未必能行之。”^② 他在和革命派论战中，极力反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说什么民生主义“摭拾布鲁东、仙士们、麦喀士等架空理想之唾余，欲夺富人所有，以均诸贫民。”^③ 显然，梁启超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意歪曲，并且公然主张“中国宜酌采社会改良主义”。

① 蜚仲：《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1905年11月26日。

② 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98号。

③ 梁启超：《驳孙文演说中关于社会革命论者》。《新民丛报》第68号。

又如，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社会主义，但又不能脱离资产阶级立场，正确对待社会主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崇敬马克思，也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但他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认为三民主义比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他不能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也没有承认唯物史观，而是坚持民生史观。他说：“马克思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阶级调和。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利益的相调和，不是相冲突”。“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的心得，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①所以，孙中山虽然承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在意识形态上，和共产主义是有原则分歧的。

长期追随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马君武等人最早谈到阶级斗争，但是他们也没有理解。朱执信同意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批判，指出“马克思以为资本家者，掠夺者也。其行，盗贼也，一出于剥削劳动者以自肥。”^②但是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原始积累学说作了错误的解释，否定资本原始积累来源于掠夺。马君武则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达尔文的生存竞争混为一谈，说它们是“相通”的。强调“争存”在任何社会也不可废。社会愈发达，“争存”一事“益复杂而永不息焉”。所以尽管他们提到马克思把阶级斗争作为解释历史的钥匙，而他们恰恰不懂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已开始传入中国，对马克思学说的若干基本思想作了介绍，但由于当时中国本

① 孙中山：《民生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70、775、779页。

②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号。

身的客观条件和思想状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传播开，也没有形成思想运动。

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的过程，既是中国人民破产的过程，也是中国的这些革命阶级和革命分子成长、觉悟和反抗、斗争的过程。所以毛泽东说：“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①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序幕到“五·四”运动前夕的70多年中，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进行了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多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和反抗斗争。其中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期间出现的三大革命高潮。在指导思想上，经历了农民平均主义的革命思想、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变化。

1851年以反对腐朽的清朝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为宗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爆发，是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后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它的领导人洪秀全用从西方学来的基督教教义和宗教形式，以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要求和幻想，作为团结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思想武器，从广西东部的金田村起义，率领10万农民大军，横扫17省之多，坚持14年之久，给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和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没有超出单纯农民战争的范围，它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又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此，不可能也提不出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科学的革命纲领，同时，又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难于形成统一领导的核心，所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失败表明，在

^① 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3页。

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缺乏先进阶级和先进思想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是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的，也不可能使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但是，太平天国的威力也说明，农民不愧为反帝、反封建统治的主力军。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把中国愈来愈深地卷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中国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富商、买办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通过官商合办进至商办的道路，转化为资产阶级或兼有资本家的身份。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但又不愿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这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

1898年，康有为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反抗情绪日益增长的形势下，代表一部分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掀起了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用从西方传教士的译著中学来的政治学说，附会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成份，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提出一套摆脱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实现君主立宪的救国方案。但是，他们不仅不敢提到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而且对帝国主义还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只要求地主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根本不想从根本上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仅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封建皇帝身上，所以，当反动势力进行反击时，他们就完全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最终只好以失败而告终。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也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中下层的政治、经济的要求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情绪的日益增长，同时由于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也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代表

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对现状极为不满，急于寻找新的出路。因此，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朝廷的代理人以后，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爱国者，纷纷走上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1905年孙中山以二元论和民生史观为哲学基础，以三民主义为战斗的旗帜，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中国同盟会，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于1911年发动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它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反动统治，并仿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由于中华民国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①，就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的觉醒，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民主精神的高涨，它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此。但是，革命胜利的果实很快被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社会学说，即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也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上述革命和反抗斗争都曾给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仍未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走上独立解放的道路。但是，这些斗争的失败，给寻找革命真理的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以极大的教训，即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却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和新的阶级力量，以指导和领导新的革命斗争。所以，毛泽东在《论

^① 《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国近代史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677页。

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①这是毛泽东对当时历史事实的真实描述。历史把这一伟大的使命留给了正在成长的并且富有革命性的中国的工人阶级。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实现的。经过“五·四”运动的激荡，它很快地传播开来，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主义的分子继承了 19 世纪末维新志士和 20 世纪初革命者的民主思想和战斗精神。他们通过辛亥革命的民主洗礼，根据新的历史要求，把这种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向封建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发动了一个强大的反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思想、宣传民主与科学、主张文学革命的新文化运动。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这一运动的开始。初期的文化运动虽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但由于它对封建主义思想堡垒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使广大知识青年受到了民主主义的熏陶，使他们从旧礼教、旧道德和旧传统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掀起了追求新知识，追求真理的热潮。这就为中国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则为这种思想在中国生根、发展，准备了阶级基础。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0 页。

从20世纪初期开始，资产阶级为了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的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进行的多次革命斗争，不但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是越变越坏。正是在这个时候，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革命，推翻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表明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破产。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立即出现了世界革命的高潮，在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里，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本主义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

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自己民族的希望所在，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方法，对中国来说，已经过时，因而把眼光转向俄国，走俄国人的路，向俄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命运，指导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因而可以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出现的这个伟大时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深入地获得传播和发展的时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期。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战胜各种唯心主义思潮并在人民群众的实际斗争中获得传播和发展的时期。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1919年在中国就爆发了有广大群众参加，震惊中外的政治运动——“五·四”爱国运动。这次运动和中国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不同，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它有着许多具有初步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先进分子作为运动的中坚；它在中国第一次鲜明的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它最初虽然只是知识分子中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运动，但不久就发展到“六三”运动，吸引广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形成了全

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它再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而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

“五·四”运动，既是政治运动，又是新文化革命运动，它作为新文化革命运动和以前文化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它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而“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以后的情形却不同，这个新文化运动主要地已不是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而是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主力和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首先为少数先驱者所接受，同时因山东问题，在多数知识分子中打消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而进一步传播开来。“公理”的迷梦醒了，真理的光辉才放射出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就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了。于是在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士中间，就陆续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在进步报刊上宣传马克思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亲眼看见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必要，决心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样，“五·四”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就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运动。当时，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刊物不断涌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学说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社团普遍建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在这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运动中起先驱作用的是李大钊。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是“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主要领袖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早

传播者。他早在日本时就曾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也谈到了社会主义运动。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他便把这个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得出了正确的认识。他正确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明确了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帝国主义必然要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欢呼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从1918年7月以后，就在进步刊物《新青年》等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他热烈地歌颂十月革命，赞扬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它的精神，可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就是20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①在哲学方面，李大钊是中国比较系统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最早的一个人。“五·四”运动以后，他又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一系列论文，概括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经济学说，并根据这些学说阐明了旧中国的社会制度的必然崩溃，而与这些制度相联系的旧道德、旧思想、特别是作为它的“结晶体”的孔子主义也不能不随着崩颓粉碎。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真理：“要晓得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现在已是我们

^①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世界的平民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努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产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他还宣传了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① 他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说：“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文学思想史》等课。1920年3月，他在北京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同年，又在北京大学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以团结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鼓励革命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相结合，根据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而斗争。他还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特别强调阶级斗争的思想。他说：“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例如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社会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阶级的产生和消灭，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他都作了介绍和论述。他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则是指

^① 李大钊：《真正的解放》。《每周评论》第30号。1919年7月13日。

“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然发生变动。”^① 根据这一观点，他批判了唯心史观“单纯从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② 李大钊的论述，虽有不精确，甚至错误的地方，但基本观点是正确的。他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了先驱传播者的作用。

“五·四”运动以前的陈独秀，是一个向往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崇拜者。到“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到了马克思主义阵营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就在1919年的五月号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专号。以后《新青年》就成为经常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给中国人民学习和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且由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誉，使他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但由于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经常流露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因而不能够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划清界限。比如，在当时他认为“中国目前工业不发达，工人觉悟不高”，因此，“政治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而只能“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所以，他后来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1927年堕落到对资产阶级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决不是偶然的。他还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可以相容的，并试图

①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②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史学思想史讲义》1920年。

劝说胡适相信历史唯物主义。所以，陈独秀在世界观上，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他后来堕落成为无产阶级叛徒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李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抹煞的积极的贡献。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李达为了“象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1918年5月再渡日本，放弃理科学习，用全力抓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日本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他认真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奉行者。当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就在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寄回国内陆续出版，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其中的《马克思经济学说》还被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阅读的文献之一。在“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之际，他又及时地撰写并发表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论述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李达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主张上是不同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社会主义时期“也要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政府，和那无政府主义根本打破政府组织的是不一样的。”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是主张全废私有资本，没有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因此，“把无政府主义置于社会主义头上，实在可笑得很。”^①1920年夏，李达怀着寻找同志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回国后，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并主编了1920年11月创刊的由

^① 李达：《什么叫社会主义》。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1919年6月18日。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出版的《共产党》月刊。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又创办并主持了地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十多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他先后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重要文章，全面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他概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内容，重点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消亡等基本理论。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中，他根据唯物史观，论述了社会革命的原因“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况之变动。”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中，他全面介绍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本质、目的和形式等。此外，李达还陆续发表了《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等9篇文章，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况，第三国际情况以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并积极参与了当时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三次论战，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种种谬论给予有力的批判。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宣传。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18年他到北京与李大钊接触后，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他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经验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同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讨论以及探讨中国革命的出路联系起来。在这些活动中，他开始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中国的真理。1919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办的《湘江评论》杂志是当时国内政治思想性最高、见解最深刻、战斗性最强的刊物之一。他在《湘江评论》上一开始就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

胜利，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

当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活动最杰出的地方，就在于他一开始就充分地注意到人民群众运动是根本改造社会的真正动力。他在《湘江评论》的发刊词上，就以磅礴的革命气概提出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的号召，来宣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紧接着，毛泽东又在《湘江评论》的第二、三、四期上连续发表了一篇当时很受进步青年和知识界欢迎的论文《民众大联合》。文章根据历史上和当时国际上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特别是俄国革命的事实，论证对中国“根本改造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指出马克思就是世界上最坚决地主张用“民众大联合”来根本改造旧社会的一派人的领袖。批评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最大的弱点，就在于它只是少数人的斗争，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毛泽东强烈呼吁：“刻不容缓的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1920年毛泽东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主张工人农民参加当时湖南的政治运动——自治运动，并在运动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另一方面，他又领导创办文化书社，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会，在知识界大量地推销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在新民学会的通信中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和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反对修修补补的改良主义，主张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毛泽东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的观点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他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

周恩来在“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他在日本留学时期，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就在思想上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回国后，在天津号召青年学习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他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创办了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为会报写了题为《革新、革心》的社论。社论中提出改造社会和自觉改造思想的主张，给人们以极大的启发。

1919年9月，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同志联合一些进步青年成立觉悟社。他在觉悟社成立的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受到了20世纪新思潮的激发，觉悟到要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就需要结成团体，学习俄国革命，宣传新的思想，唤起民众觉悟，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并为觉悟社出版了《觉悟》月刊，积极宣传新的思想，讨论改造中国社会问题。周恩来因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山东问题不得与日本直接交涉等要求，被反动政府逮捕后，在狱中也没有放弃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狱中组织学习，举行讨论会，不顾个人安危，演讲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传，宣传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史以及剩余价值学说。

周恩来为了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研究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于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经常给国内写信，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旅欧通讯中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因地制宜。”认为在我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周恩来还在法国主持建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并出版《少年》月刊（后改名为《赤光》），宣传共产主义学说，批判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反动思潮。

在“五·四”前后，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是作过贡献的。蔡和森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在几个月内，就“猛看猛译”了几十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而且亲自编写了阐述社会革命理论的著述。他还领导了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流派，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而且还和王若飞等组织工

学互助社（后改名为工学世界社），团结进步的中国留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旅法通信中，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并把自己归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广大青年和进步团体中，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种思想主流。如瞿秋白在《新社会》杂志上也提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行动是不可少的”，社会主义必将胜利，虽然胜负一时分不出来，但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他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在“人间”实行起来。邓中夏、恽代英也积极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宣传。

总之，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和刊物，不是个别的，如张太雷、高君宇、赵士炎、陈延新、王若飞、向警予、罗亦农、彭湃、王烬美、杨匏安、阮啸仙、方志敏、袁玉冰等等，也都进行了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的宣传，并先后在思想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上海《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反对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提倡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等等。

综上所述，正是这些众多的人们和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学习和宣传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形成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才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上。

第二节 在三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正如一切新生事物的出现必然受到反动势力的压抑一样，马

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于是对它的迫害和攻击便接踵而来。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没有退缩，而且针对反动政府对它的迫害与摧残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与抨击。同时对敌对思想和派别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一、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哲学上是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发展观的斗争，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思想的斗争。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挑起的。在“五·四”运动的前夕，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界为了对抗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美国请实用主义者杜威来中国各地演讲，鼓吹美国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胡适也跟着写了《实验主义》等许多文章，从各方面贩卖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世界观。由于美帝国主义者在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旧中国统治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影响的增长。也由于实用主义这种哲学是披着巧妙的科学伪装出现的，因此，胡适的思想活动在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界中找到了市场，并且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中一种占主要地位的思潮。于是，胡适写的那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就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从“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成长”这个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主张对于旧社会只应采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改良的办法，否认“根本解决”社会制度的必要和可能。他在反对“空谈主义”的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提倡“研究问题”的借口下，反对社会革命，把攻击的锋芒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用革命的阶级斗争方法来根本改造旧社会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恶毒的挑战。当李大钊看到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后，立即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

适的挑战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针锋相对的指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造腐朽的旧制度，那么一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是没有希望的。他着重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在经济制度方面，只有经济的解决，才是根本的解决。同时还批评了“自发论”的思想，指出不应该坐着等待经济的自发变动，而应该通过无产阶级自觉的斗争来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因此，“在根本解决以前，必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应当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指导思想，提出用革命的手段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击中了胡适这个实用主义的改良派，批判了他的谬论。同时，由于李大钊在论战中坚决表示“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造他的谣言。”他明确地肯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最理想而又可行的主义，只要把它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际。”李大钊驳斥了胡适把主义与问题割裂开来，并且用枝节问题的研究代替宣传主义的谬论，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指出问题与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要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应当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也就必须使他们接受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行动的准则和衡量是非的标准。所以，社会主义者“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并且指出，如果按照胡适的办法，只埋头于具体问题的研究，不去宣传主义，那么“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发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

响于实际。”正因为如此，从事社会运动的人，“一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面也要宣传主义，这是相互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这样，李大钊就不仅还击了胡适反对谈论“外来主义”的谬论，而且在逻辑上指出了胡适把主义与问题对立起来的错误，论证了向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从而粉碎了胡适抵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动企图。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是坚决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鉴于打击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所以，他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经常强调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树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有了马克思主义，大家才有方向。他在分析主义与问题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两者有着不可分的联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出路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能有所遵循，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给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了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这场论战中，邓中夏、恽代英、方志敏等也参加了对胡适的积极斗争。

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在十月革命光辉榜样的启示下，在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怀着充分的信心，敢于在反动派白色恐怖面前，在那些大言不惭和故弄玄虚的资产阶级名流学者面前，公开宣布自己的信仰，没有丝毫的隐讳、犹豫和畏缩。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的面前树立了鲜明的旗帜，在中国的思想界争得了巩固的地位，从而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并且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使马克思主义

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以研究系分子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反动分子，鉴于在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看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先后成立，中国共产党也在酝酿成立之中，于是就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起了新的进攻。马克思主义者们对他们的进攻立即给予了坚决的反击。于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大规模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就开始了。

早在1919年初就开始研究预防布尔什维主义方法的张东荪等人，在“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积极贩运反动的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又伪装成社会主义者，在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假面具下，大量偷运各种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谬论，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张东荪等人，利用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新实在论者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揭开假面具，提出所谓中国的出路只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反动说教，反对宣传社会主义，反对建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者进行恶毒的攻击。

罗素于1920年10月来到中国，1921年7月离开。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演讲，散发反苏论调，诬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宣扬所谓“中国的到自由之路”，即发展实业，兴办教育的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道路，反对中国正在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张东荪等人跟在罗素之后，大肆贩卖罗素的反动说教，发表文章系统宣扬：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宣传社会主义，更不是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纲领。

张东荪等人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是从歪曲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出发的。他们认为，中国人民所以长期陷于极端贫穷，只是由于“物产不丰”、“天灾人祸”和人们的“懒惰”与“无知”所致，而不是由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反动统治者的掠夺与压

迫的结果，企图以此来抹杀地主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的矛盾，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以达到根本否定中国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与可能的目的。

张东荪等人，为了反对中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反动成立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竭力否认中国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区别，否认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这一事实。硬说在中国由于生产不发达，还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当然就更谈不到有阶级自觉的工人阶级了。他说：“论到中国，劳动阶级，除了交通埠头因为有少数工厂才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况且他们要发生阶级意识还不知要经过多少次的经验教训。在他们的阶级意识未生以前，这种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简直不能有何势力。”^①梁启超也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兴起，“其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他们在否定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在中国的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以后，就把财阀绅商阶级即资产阶级抬了出来，认为只有依靠这个阶级发展了资本主义，才可以使中国富强，“增加富力及于一般人民。”这就充分暴露了张东荪等人改良主义的面目。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谬论虽然不足以欺骗有识之士，但鼓舞了资产阶级，涣散了人们的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却是一种阻力。因此，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毛泽东、陈独秀、何孟雄等人，便对张东荪等人的谬论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和斗争。

他们首先从分析中国社会状况入手，驳斥了张东荪等人的所谓中国没有阶级的区别，不宜宣传社会主义，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谬论，坚持了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他

^① 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3卷4号。

们指出，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广大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纷纷破产，大批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即工业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不但遭受本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而且遭受到国际资产阶级残酷的掠夺和压迫，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更大的痛苦和更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社会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趋势。蔡和森说：“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已隶属于西方，农业国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因此，经济上的压迫，东方农民国野蛮国的无产阶级之所受，较西方工业文明国无产阶级之所受为尤重。”“现在中国四万万人口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中国人民只有两条道路可走，如不甘心饿死或者在兵乱中死去，就只有起来革命。因此，“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①李达也指出：“就中国说，是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他认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由于国际资本阶级的压迫，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痛苦，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因此，即使说中国的社会与欧美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②同时，《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的其他文章也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以及本国资本家互相勾结，残酷地掠夺工农劳动阶级的事实，揭露了张东荪等人美化地主、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的谎言，并明确指出，只有实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彻底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是改造中国的真

①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4号，1921年8月。

②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1号，1921年5月。

正出路。上海《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上有的文章也明确指出：“要救中国社会，应当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应当先使生产社会化；要使生产社会化，必须借助政治的权力；要借助政治的权力，必须先干革命；要干革命，必须大家努力宣传，准备实力。”^①

其次，他们坚决驳斥了张东荪等人对中国工农劳动群众的诬蔑。指出，以客观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劳动人民的阶级自觉是革命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的黑暗已达于顶点，要想推翻反动统治，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只有依靠劳动阶级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才能挽救中国。中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或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如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的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十分的可能性了。这样，共产主义者就论证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为革命积蓄力量，并且通过革命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粉碎了张东荪等人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反对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谬论。

第三，他们还驳斥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所谓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使国家独立富强的欺人之谈。他们认为，在中国已沦于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之下，把国家的富强和保障祖国的独立寄希望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李达指出，因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战的战场。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

^① 载1921年9月25日上海《国民日报》副刊《觉悟》。

怕要遭到极点了。”^①万国竞争的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是绝对走不通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实业，不会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使中国永远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因此，企图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来竞存于世界，不过是白日作梦而已。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根据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形势的变化，指出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经济体系，共产主义的曙光出现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李大钊说：“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国内的劳动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②为此，中国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榜样，推翻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应当坐而等待资本主义的缓慢发展，延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痛苦，把革命推迟到无限的将来。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系到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大论战。毛泽东明确指出，主张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中国社会，而回避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就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

①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

②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载《评论之评论》1921年3月第1卷，第2号。

机关，而这些都在资本家的掌握之中。而且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是为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因此，企图用教育的办法来改造社会完全是一种幻想。他指出，在有产者控制着一切权力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除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以外，任何“温和的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周恩来也深刻地批判了改良主义，指出中国决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中国要独立富强，只能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根本改造旧的社会制度。所以，周恩来强调，共产主义者决不作枝叶的改良，而要大刀阔斧地主张共产革命，主张坚决走列宁指引的道路。

在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仅彻底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反动谬论，而且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

三、粉碎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胜利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但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谬论，取得了论战的胜利，而且同反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就已传入中国，而且在一个时期内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它的成分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则是利用它的名义伪装“革命”，招摇撞骗的流氓政客。他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标榜反对一切强权，他们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现在的国家”。尤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的国家”。这种反动思潮如果不及时反击，就不能真正开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于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从1920年起，就开始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首先，他们有力的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

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摆脱压迫，求得彻底解放，就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革命就不会成功。所以，他们公开宣告：共产主义者主张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的，只是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有强力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拿国家建树无产阶级的特权，而是要拿国家来撤废一切阶级的。

他们还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国家在于掠夺劳动人民和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无产阶级国家则在于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抵御外来的侵略，组织和领导社会主义的生产事业。因此，对于资产阶级的“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必须坚决反对，并把它们彻底打翻、打倒；对于无产阶级“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废止资产阶级财产私有的法律”，则不仅不应当反对，而且必须加以巩固。因为只有巩固它，才能保卫革命的果实，把革命进行到底。无政府主义者笼统地么对一切强权、国家和法律，反对阶级斗争，完全是非科学的武断。强权被少数剥削者利用来压迫劳动人民，自然是可恶的。但是如果倒转过来，用它来反对剥削者，那就不见得可恶，而且还是被剥削被压迫者所需要的。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斗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出现，而让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权法律，如此梦想自由，即使过一万年，那被压迫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主张不要政治，不要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实在是有产阶级的好朋友，是有产阶级的恩人，无产阶级的敌人！如

果要使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得到解放，就必须经过阶级斗争，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要有自己的国家政权，用它来镇压被推翻的压迫者、剥削者。毛泽东说：“非得政权则不能爆发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①李达也说，监狱也要，警察也要，因为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军队也要，因为要对抗资本主义敌国。而为了实现这一切，又必须有一个有组织有纪律，能够集中领导的党，即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党。

其次，他们着重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所谓“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的所谓绝对自由完全是主观的幻想，不论从经济上或政治上看，想实现绝对的个人自由，都是荒谬的。在人类社会，自由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个人的绝对自由，就只有离开社会，去过孤独的生活，而这又是办不到的，因为孤独一人不与社会发生联系，他就活不下去。因此，只有社会的自由，才会有个人的自由，离开社会自由的个人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毛泽东说，对于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只是理论上说得好，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就无政府主义者本人来说，尽管他们天天高喊绝对自由，但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仍不免要受统治者的支配，没有办法退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剥削者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的自由。由此，只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才能使劳动人民得到自由。就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也不能是绝对的，也还要有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的领导。如果凡事都要“人人同意”，“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不用说在整个社会行不通，就一个工厂来说，生产也无法进行，否则就只有闹到停顿而至破产为止。李达在《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之后，当然是社会主义，如

^①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今要跳过社会主义阶段，直接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结果无非是使众人不努力灭绝资本主义罢了。”^①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是站在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来看自由问题的。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实际上是关系到建立什么样的党的争论。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党，还是建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的“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党，是争论的实质。这场斗争是相当广泛的，除了《新青年》和《共产党》等刊物比较集中的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以外，当时的一些学校、社团以及国外留学的学生中也在进行着。这场持续一年多的斗争，最后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结束。

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胜利，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很容易迷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热情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曾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也有些人或多或少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只有经过对无政府主义的彻底批判和斗争，才能团结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也才能使共产主义的队伍在组织上更加纯洁，在思想上更加坚强。当这一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优势就确立了。

通过理论战线上述的三次大论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想要破坏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企图失败了，马克思主义不但在中国知识界日益扩大了自己的阵地，而且开始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使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同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斗争中进一步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思想

^① 李达：《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共产党》第4号，1921年5月。

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也为以后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创造了条件。

第三节 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完成

毛泽东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又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他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旗手，为中国革命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于史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卓越代表。毛泽东还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伟大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但这一切都不是天生的，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

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古老的中华民族，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猖狂的侵略和掠夺，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则卖身投靠了帝国主义。于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成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就成为近代中国一切革命运动的主题。

毛泽东 1893 年诞生在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里。

毛泽东少年时期，在家乡的一个私塾读书。16 岁时，他进入

新式小学——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当毛泽东 18 岁，即 1911 年，孙中山以二元论和民生观为哲学基础，以三民主义为战斗旗帜，联合各革命团体，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并仿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历时 2000 多年的封建统治制度从此结束。但胜利果实很快被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窃国大盗袁世凯所篡夺。当毛泽东 24 岁时，即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而且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作出了“走俄国人的道路”的正确结论。在毛泽东 26 岁的时候，即 1919 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无产阶级以战斗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肩负起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重任，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是在激烈动荡、新旧交替、守旧与革新两种势力尖锐斗争的历史时期中渡过的。在这样的时代里，他吮吸着时代的气息，思考着历史提出的课题，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他的思想发展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时代的特征，通过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在他的思想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毛泽东 1911 年到长沙后，就开始接受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而且强烈的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第一次看到孙中山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主报》，读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反抗清朝而起义牺牲的事迹，也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革命纲领。这时，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专制的斗争如火如荼，毛泽东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活动，并写文章，主张孙中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内阁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这就看出，当时毛泽东还分不清孙中山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只是模糊的意识到，为了反对清朝的专制独裁和投降英国，他们应该联合起

来。他受到辛亥革命很大的鼓舞，到革命军里当了半年兵。当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民主共和的希望破灭后，他为了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在此期间，正值国内连年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内新旧思想的斗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情况下，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而且政治思想也随之开始形成。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渡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①在第一师范期间，毛泽东最初的社会活动是参加学校学友会的工作，担任文牍、总务等工作。1917年暑假前后，北洋军阀傅良佐的溃军要占用学校的房屋，他就组织同学起来斗争，取得了保卫学校的胜利。与此同时，毛泽东为征求“有志上进，愿为救国救民出力者”为同道，用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共有二十八画——引者注）的笔名，写了一封信，在长沙油印后，发到各个中学，先后吸引了五、六个青年，并且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还在1917年7月4日——8月16日，利用假期，与肖子升一道“游学”农村，在长沙、宁乡、益阳、沅江五县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而且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仔细了解社会世态和当地历史地理情况。同时，还在1917年冬倡议举办了工人夜校，亲手写招生广告，亲自讲课。毛泽东由于积极接触工农群众，思想更加激进了。当1917年11月，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徘徊时，他就利用当时学校实行“军国民教育”，组织学生自愿军受简单军事训练，而自己又正在领导学生志愿军校巡警卫的机会，配合附近巡警的行动，缴了王部溃军的枪。1917年冬，毛泽东还与蔡和森等酝酿成立新民学会，1918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1页。

年4月正式成立。他亲自起草了学会会章，并被学会选为干事。从此，毛泽东便开始了他的初期革命活动。

二、转变的思想渊源

毛泽东早年生活在文化源远流长、社会思潮相继交替的近代社会末期，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曾不同程度的受到多种思想的思潮的影响。

毛泽东从1902年进入私塾读书到1912年退出新军的10年时间里，读了6年私塾，1年高等小学，投笔从戎半年，退出新军后，在湖南省立一中学习半年，后退学在湖南省图书馆开始了为期半年的自修生活。在自学的半年中，他看了很多的书，收获较大。他除了阅读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小说、古希腊的故事以外，几乎通读了西方所有重要的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的名著。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逻辑》等等。因此，毛泽东不仅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启蒙思想的教育，而且大大地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从而奠定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虽不喜欢经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教育制度下，还是读了6年私塾，就是在毛泽东就学五年半的第一师范虽未设经书一科，但教员在讲授国文、修身等课程中，也往往大量引证古代“贤哲”的遗教，所以毛泽东对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清代学术以及历代史实，都有相当的了解，这就使毛泽东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中国古典哲学有着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虽不为封建统治阶级所重视，甚至横遭摧残，但从先秦起，王充、范缜到王夫之，其流传从未间断。集中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之大成的王夫之是湖南人，其学术思想及民族气节，在湖南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在长沙设有专讲王夫之学术思想的“船山学社”。第一师

范不少教员，如杨昌济，非常推崇王夫之学说，在学生中也形成了研究王夫之思想的风气。毛泽东经常参加船山学社的讲习会。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传统，特别是王夫之的思想，是毛泽东早期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中国古典哲学也具有朴素辩证法的传统。早在先秦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中，就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谭嗣同的“仁学”一书，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书中体现着冲决罗网、改变现状的辩证法内容。谭嗣同在湖南创立“南学会”，鼓吹变法。在反旧维新中，他不怕牺牲，以身殉国，在湖南知识界有很高的威望，其影响比王夫之还大。杨昌济推崇谭嗣同并不在王夫之之下。第一师范学生在参加杨昌济研读王夫之学说的同时，也参与杨昌济研究谭嗣同的“仁学”。老子、庄子的著作和“仁学”中带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的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毛泽东把这段时期称之为“自我教育”时期。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①还说：“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②这就清楚地说明，毛泽东此时的政治思想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寻求革命的真理，对哲学抱有极大的兴趣。但他的世界观还没有最后形成，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又有许多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这对毛泽东以后彻底抛弃唯心主义，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

① 《毛泽东一九七三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6页。

② 周世钊：“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几个故事”，《新苗》1958年第9期。

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一个很为有利的条件。

三、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转变

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一方面从事革命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和学习的几个月，是他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开端。

1918年秋天，毛泽东为了筹备组织湖南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经李大钊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作助理员的工作。此时，他不仅旁听了北京大学的一些课程，参加学校的哲学会、新闻学会的活动，而且还深入到长辛店了解职工的生活状况，对政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思想也更加激进了。毛泽东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读了许多书，研究了各种新思想。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已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立即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领导新民学会的会员，参加学生示威游行的活动，并积极领导了湖南的青年学生运动，组织了湖南全省学生联合会，并在1919年7月，出版了学生联合会的会刊——《湘江评论》，并担任了该刊的主编。这个刊物不仅是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的宣传者，也是民众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大大地推动了湖南以至华南诸省的青年学生运动。与此同时，新民学会也积极开展活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发动了反对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学生总罢课。1919年12月毛泽东为了组织驱张运动，率领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他在北京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和陈独秀等组织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于1920年夏天，摆脱了残存于自己思想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20年秋，他在湖南提倡

人民政宪运动，创办文化书社，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工人运动。这些革命的实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而且，此时从他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创刊宣言》和《民众大联合》等文章来看，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了。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除了从事驱张活动以外，还博阅了各种共产主义书籍和俄国革命的书。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当时对他影响最大，帮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有三本书，这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①这是使毛泽东于1920年夏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从此以后，他就没动摇过。于是在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复蔡和森的两封信以及在新民学会1921年新年大会发言中，毛泽东彻底清算和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完满地回答了社会改造的最终目的和达到目的的方法以及从何处着手等重大问题。明确表示赞成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实现社会的改造，主张唯物史观为党的哲学根据。至此，毛泽东的世界观的转变已经完成。

毛泽东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为在中国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

^① 埃德加·斯诺：《西地漫记》，第131页。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任何科学思想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都具备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对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并在深刻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

(1921~1930年)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又可以1927年大革命失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27年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的大约六年时间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阶段。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时，则表现出了党的幼年性。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运用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研究和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研究中国的国情，制定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指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初步提出了革命要分两步

走。同时还指出，要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国情，回答中国革命提出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产生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如何进行分析，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完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极力否认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并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无视它的妥协性，并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分析，也是陈独秀在政治上从机会主义走向投降主义的思想根源。所以，在党的“四大”之后，就特别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调查、研究和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彭湃等同志曾从不同角度考察过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并发表文章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批评。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毛泽东为反对当时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于1926年的3月，发表了当时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代表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起点。它是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异常复杂的阶级关系，创造性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为指导，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用唯物辩证法的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揭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

众的历史，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基本观点，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对农民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是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就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更加重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研究更加突出。他认识到农民问题的解决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他把对农民问题的态度，看作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毛泽东为了反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指责和攻击，于1927年初，亲自回湖南对农民运动作了32天的考察工作，并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报告》科学的总结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经验，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与政策。《报告》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毛泽东根据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阐明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党派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由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指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毛泽东还从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出发，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问题，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发挥。这就是毛泽东所阐述的革命的斗争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根本的革命方法论的体现。毛泽东这种鲜明的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以及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萌芽的又一重大表现。

总之，实践表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相结合的方向上，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但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不够成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还比较肤浅，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还不能根据中国的国情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党的领导机关对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主要是听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多半是照搬外国的经验。因此，还不能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形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经过从成功到失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使党懂得了组织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紧紧依靠农民，开展武装割据的极端重要性，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1927年8月1日，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随后，发动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小200多次武装起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毛泽东认真总结实践经验，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1927年8月到1930年5月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在战争环境中认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极为复杂的矛盾，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一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又找到了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这不仅是唯物辩证法的基

本观点，特别是矛盾分析观点的创造性运用，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唯物辩证法。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总结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战略战术原则开始形成。此后，又逐步制定了一套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为我军的建设奠定的坚实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原理，对党的实践斗争经验，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总结，于1930年5月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为《调查研究》）一文。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国化的哲学著作，是反对教条主义和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斗争的哲学总结。

首先，《反对本本主义》作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提出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理，并进一步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其次，《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第三，《反对本本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新概念，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还提出了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即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与从本本出发的保守的思想路线的对立。《反对本本主义》以极大的鲜明性和尖锐性，明确地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以上几点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和中国的实际结

合及其在革命中的具体运用，是党的斗争经验的哲学总结。

综上所述，在此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初步奠定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提出了一条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唯物论和辩证法去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并作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这就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初步形成。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

(1930~1937年)

毛泽东哲学思想从形成到系统化，是1930年6月到1937年8月的这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虽然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也形成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但十分可惜，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没有被当时的党中央和全党所理解和接受。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中央的领导权长达4年之久。他们攻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狭隘的经验论”、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和“富农和线”。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他们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得照办，凡是苏联的经验就和照搬。结果，王明推行教条主义在实际斗争中不断遭受挫折，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抵制和批评了共产国际的错误。毛泽东哲学思想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系统化的。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人们从血的教训中看到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性。当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

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于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就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就转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了。当1935年12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之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新的形势、新的矛盾，系统地说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他运用矛盾分析法，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引起了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因此，基本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中日矛盾成了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其他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矛盾日益尖锐化，而其他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则暂时降到次要地位，就是在地主买办阶级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机面前，也会有所分化。这就是说，敌人营垒中间是存在着矛盾的，其他矛盾是会发生变化的。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及其分化，提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去克服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总之，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表现、性质及其危害，同时告诫全党警惕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毛泽东这种对形势、矛盾的辩证分析，阐明了一些同时存在着的矛盾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如果能正确区分和处理这些矛盾，就能促使矛盾向对人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策略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辩证法。

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机械地搬用一般战争规律或国外革命战争规律，或者机械地搬用北伐战争的经验是错误的，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推广运用于军事斗争领域，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指出了共产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消灭战争的途径；阐明了把握战争规律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战争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论述了战争中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论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辩证法；阐述了战争的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指出了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独具特色的贡献。

1937年7月和8月，分别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这两篇哲学著作，既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也是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哲学总结，深刻地阐明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唯一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矛盾论的基本观点，划清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和形而上学唯心论的思想路线的界限。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的标志。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1937~1949年)

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之后，党和毛泽东又把《实践论》、《矛盾论》中所论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实际斗争中，既指导了革命实践，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思想。

1937年8月至1949年10月，是毛泽东哲学向多方面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和失败到重新走向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全国胜利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全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活跃、最生动的新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内容最丰富多彩而又得到生动的证实和发展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总的特点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分析和党的建设方面，批判了在这些方面表现出来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及其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更系统更完整地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军事学说、社会革命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就是在这个时期系统化、完整化的。到40年代初，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公认，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在1941年到1942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献，系统地阐发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论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转变党的作风的根本方法，从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认识论。所以，在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就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抗日战争的实践经验，写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考察战争，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阐明了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战争中客观规律性和自觉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指明了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中的辩证法。

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战争新的形势和新的特点，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战略进攻学说，制定了战略决战的军事行动纲领，进一步完善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了充实和发展。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

在历史唯物论方面，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正确地指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阐述了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辩证统一；批判混淆两个阶段任务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和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进一步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些思想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一整套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它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发展的标志。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是怎样把这一科学的

方法论化为具体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在40年代，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我党的领导经验，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献，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毛泽东创立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内容十分丰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有基本的方法，也有具体的方法。其基本方法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矛盾分析等等。具体方法有：“解剖麻雀”、“弹钢琴”、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多谋善断、两条腿走路、波浪式前进等等。毛泽东创立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现实道路。

总之，在这12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已全面展开，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发展，斗争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经验也就愈来愈丰富。因此，作为革命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里，它的内容更深刻、更完整、在体系上更严密、更系统，体现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949~1957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新时期的新特点，如何解决新时期的新任务，是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既不能沿用民主革命的经验，也不能照搬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经验，而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去回答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解决新任务。因此，1949年10月至1957年4月，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总结和概

括新时期的实践经验中，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握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正确地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应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生产的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我们这样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的国家里，把个体经济（农业和手工业）经过互助合作的形式，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同时把个体生产者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生产者，这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是量变质变规律的杰出运用。

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正确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前提下，采取“和平赎买”的方针，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把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用邓小平的话说，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内容。

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阐明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以及开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处理客观经济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各种矛盾关系，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课题。1956年初，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找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道路。1956年春天，毛泽东亲自听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

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在这种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提出要正确处理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实际问题，指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而处理这些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关系和矛盾，都是针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倾向提出的，既充分体现了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又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又一新内容。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的原理还灵不灵？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完全没有矛盾？都必须作出科学的回答。否则，就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毛泽东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全面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正确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具体地阐明了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科学地回

答了时代给予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新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碰到的新问题，捍卫和发展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又一新内容。

总之，在此时间内，毛泽东哲学思想又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中的新财富，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新篇章。

五、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

(1957~1976年)

在1957年至1976年这段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晚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增添新思想的地方，也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错误之处。

在这一时间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增加的新内容是：

第一，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于1960年1月在《十年总结》中指出：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第二个十年的时间去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于是在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于是，毛泽东得出结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

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①这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哲学总结，也是对自由和必然这对哲学范畴的生动而深刻的阐述。

毛泽东在总结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人类认识不断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②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自由和必然的论述，既反对了骄傲自满、停止不前的错误倾向，又指出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不断反复的过程。这是对自由和必然这一哲学范畴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毛泽东撰写的《人为正确思想是人哪里来的？》一文，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与失败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对《实践论》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它批判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指出了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两个飞跃，论证了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指明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② 毛泽东：《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并阐明了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最后，指出了进行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教育的重要性，等等。总之，它不仅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而且也揭示了人们认识运动的分过程，从而把解决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辩证途径简明扼要地阐述出来了，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三，从世界观的高度，揭示了关于天才问题的本质，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毛泽东针对林彪一伙为了抢班夺权，极力鼓吹天才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的错误，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靠集体智慧。这就把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和历史观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从世界观的高度统一起来了。

第四，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国际形势，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战略。

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两种矛盾、三种力量和中间地带的理论。到60年代，国际政治力量、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根据这种变化，到1974年2月，就完整地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科学地制定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新的世界战略，为国际反霸斗争的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毛泽东晚年从实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所作的科学分析的结果。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里，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了不少新内容。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严重的失足和错误，因

而在探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道路上招致了严重失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和错误，指出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正确地区分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为我们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章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说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因为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认识论思想的唯物论前提。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叶剑英曾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它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邓小平也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①还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②

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具体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突出贡献。这条思想路线贯串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它集中了人民最珍贵的精髓，反映了时代精神的精华。

① 《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7页。

② 《邓小平同志谈端正党风问题》单行本，第7页。

第一节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 唯物论的中国化

一、反对主观主义的理论结晶

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的斗争是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近代以来的中国，虽然也有地主资产阶级唯心论、庸俗进化论出来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且一开始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此，在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出现的哲学倾向，主要的不是理论上公开反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心主义，而是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种种问题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或者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前者表现为教条主义，后者表现为经验主义。这两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给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这种主观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以及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同时，毛泽东不断地从思想上批判上述主观主义。1929年他在古田会议中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 and 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在

^①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1页。

《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①的科学论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在战胜了王明“左”倾路线之后，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挖掉机会主义的老根，即主观同客观相分裂、认识同实践相脱离的问题，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本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系统地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总的思想仍然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更加完整的论述，对主观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指出，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和学风，主观主义是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经过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条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全国胜利后，毛泽东又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

当然，毛泽东晚年，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具体经验，较少研究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逐渐地背离了他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产生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其主要表现，一是没有认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消灭后，仍然提出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二是求成心切，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离开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犯了急躁冒进的错

①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页。

②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误。

毛泽东离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作法又被林彪、江青两个野心家、反革命集团加以歪曲和利用，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致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林彪任意肢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天才论和现代迷信，宣扬“句句是真理”，主张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生搬硬套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江青反革命集团借口批判“经验主义”而否定革命实践经验，鼓吹“永远按既定方针办”。从这种思想路线出发，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打倒一切，实行“全面专政”；在经济上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攻击四化建设，鼓吹“穷过渡”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文化上搞专制主义和虚无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内两条哲学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和克服主观主义的倾向。只有如此，才能把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引向胜利。

二、主观主义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它的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不仅唯心主义是主观主义，而且形而上学也是主观主义。因为形而上学就是用片面的、表面的观点看问题，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毛泽东说：“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相互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①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3—314页。

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

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出发，只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不是根据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来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行动的指南，再到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而是抛弃马列主义的实质，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个别词句搬到中国来当作教条，根本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经验主义的特点，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感想当政策，只注重局部经验，轻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都是一致的，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割裂开来；都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所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東西。

主观主义在中国的条件下，实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它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认识论上的根源。194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

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① 所以，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这种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就是不从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想当作实际，把片面当作全面、局部当作全体、树木当作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比较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经验主义。

主观主义除了有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之外，还有认识上的根源。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就是它的认识论根源。所以，不能认为只有小资产阶级或受了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才会犯主观主义错误，无产阶级就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其实不然，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无产阶级能比较少地犯这种错误，一旦犯了这种错误，也能依靠马列主义的远见卓识，自觉地予以纠正。

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就是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加强调查研究。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加强理论学习，把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

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一语出于西汉时期，其原意指的是一种务实求真的学风。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民族传统的思想精华，并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赋予它以新的含义。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

^① 毛泽东：《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1页。

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同时毛泽东还说，“实事求是”就是要使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从此，“实事求是”一语就成了一个通俗的哲学概念。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

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说明：

第一，它肯定了物质世界——“实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人的认识对象和出发点。也就是说，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

第二，它肯定了客观事物有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认为规律——“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这种规律存在于事物运动变化之中，并各有其特点。因此，“实事求是”要求人们从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不同事物的具体特点出发，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运动观和规律论。

第三，它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掌握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它不是说人们对客观世界无能为力，而是要求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求”——研究事物发展的规律，并以此为向导，能动地改造世界。所以，它正确地解决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

除此以外，它还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同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获得了新的意义。这一原则的提出，使唯物主义不再是书本上关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一般原理，而成为从思想上保证无产阶级政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党在一切工作中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的一个发展，也可以说，它在理论上对唯物论原理作出了新的概括和补充。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原则的提出，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永存的。

第二节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实事求是的重要内容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用辩证的唯物的观点阐明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含义和基本要求，为我们彻底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明了方向。

一、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就是实际

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就是从实际出发。毛泽东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把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概括为“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什么是“实际”？按照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实际”就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

从实际出发的“实际”，有着比物质更为广泛的内容，它是指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也就是认识和研究对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①由于认识的任务不同，人们认识和研究对象既可以是物质的东西，也可以是精神的东西，只要它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外，只要是真实的东西，都包括在实际之中。例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状况；一个集团、一个人的思想状况、学术观点，等等，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构成我们面对的客观实际。

“实际”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从时间上看，有现实的实际，也有历史的实际。例如，要了解中国的今天，不能不了解中国的昨天。要了解中国的现状，不能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从空间上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单位，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一律对待。

二、从运动着的客观事物的特点出发，

就是从实际出发

实际是运动变化的，是多种多样的。

从实际出发，首先要从离开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来说，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客观环境、工作对象出发。

就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活动来说，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一个国家的国情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们认清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这个基本的实际的国情出发，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道路。教条主义者之所以使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的基本国情，从书本上的定义、外国的经验出发。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失误，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在于对“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在指导方针上就急于求成，犯了“左”的错误。

在社会历史领域，从实际出发，说到底，就是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

群众的。”^① 所以，尊重群众和尊重唯物论是完全一致的。

从实际出发，还要从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客观情况出发。“实际”是变化发展的，认识也要变化发展。一个革命者能否注意事情的变化和发展，从运动中把握客观实际，防止思想僵化，是能否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思想脱离实际，不能从实际出发，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左”倾，一是右倾。毛泽东说，事物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运动的。“左”倾或右倾，主要是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符合实际情况，时间还没到，看过头了，就叫“左”倾，时间到了，又看不到，就叫右倾。因此，既要反对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右的倾向，也要反对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左”的倾向。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时空观运用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一个典范。

从实际出发，还要从不同事物的具体特点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主观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知道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教条主义者从一般的公式出发，看不到事物的多样性；经验主义者把某一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情况加以无限夸大，把事物的多样性淹没在某一具体经验之中，两者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从实际出发还要从客观事实的总和和联系出发。客观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每个事物也是由矛盾的各个方面组成的。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② 列宁还说，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不从全部总和，不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② 列宁：《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所以，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并不是从个别事实、个别事例，或者事物的某个方面、某一枝节出发，而是要尽可能地把握它的各个方面，它的内部联系，从事实的总和与事实的联系出发去研究事物。因此，毛泽东要求我们详细地占有材料，用全面的相互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把握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反对主观性、表面性和片面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三、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所要求的。

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过程中，阐明了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①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运用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或把实践中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使它具有科学的形态。实事求是，一般地说，就是要解决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特殊地说，就是要解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所以，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地指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

在理论和实际的关系上，有两种倾向必须反对：一是教条主义倾向，一是经验主义倾向。教条主义者重视理论而轻视实际，他们不懂得，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空洞的理论又是没有用的。所以，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去和客观实际的事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列主义，也是不能起作用的。所以教条主义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重视实际而轻视理论，这也是错误的。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叶剑英 1977 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大会上谈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说：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具体对待，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所以，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马克思恩格斯一再指出，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毛泽东也说：“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國革命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个“结合”关系到我们国家兴旺发达这个重大问题。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个“结合”，革命和建设就胜利和发展；什么时候违背了这种“结合”，革命和建设就受挫折就失败。

第三节 尊重客观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

①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从实际出发的目的，就是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运用规律，改造世界，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唯物论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阐述“实事求是”的含义时指出：“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在《实践论》中又指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①这就告诉我们：

第一，规律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规律是一种客观必然的东西，不管你承不承认它，赞不赞成它，它总是要表现出来的。毛泽东在总结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时说：规律是个大学校，可以教育人，使人聪明起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就要碰得头破血流。价值法则，是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的干部和几万万的人民，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②

第二，规律不是偶然的东西，它在事物运动中反复出现。

事物反复出现，才能成为规律，人们才能认识、掌握和运用它。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过去是十年一次，经过多次反复，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

第三，规律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我们既承认规律具有普遍的、必然的、稳定的性质，又要看到它的形式的多样性。我们知道，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有不同的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② 参见《价值规律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学校》。

矛盾，因而也就具有不同的规律。毛泽东在谈到研究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的时候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来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① 研究战争规律是这样，研究其他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这样，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研究特殊规律，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才能找出一般规律来。他说，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状况，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社会普遍规律就认识了。要从研究许多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例如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二、主体的能动性只有人类才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指导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主观能动性的原理，并把主观能动性称之为“自觉能动性”，还对“自觉能动性”的内容、作用等作了充分地说明和发挥。

首先，毛泽东阐述了自觉能动性的含义。他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①他还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能动性。”^②这就精辟地阐明了自觉能动性的两种含义，即能动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

具体地说，就是：

第一，自觉能动性是人們以一定的思想、理论、意见、方法等主观的东西为指导所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因为它有主观的东西作指导，同人们的主观世界相联系，所以称之为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人的自觉的活动与努力，它同动物的那种自发的能动性不同，所以称之为“自觉能动性”。马克思说过，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不同于灵巧的蜜蜂的地方，就在于建筑师在建筑什么东西之前已经有了一个观念形态的建筑物即设计图。

第二，自觉能动性包括人的思维活动、实践活动、意志能力等内容。思维的能动性表现在人能够对通过感觉器官得来的感觉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事物的发展作出预测。实践的能动性，表现在人能够制造工具，改造自然界，并自觉地进行改造社会的斗争，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意志的能动性，是指人有一种精神状态。如决心、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干劲、热情等，它贯穿于人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之中，并调节和支配这些活动。不过，实践的能动性则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最重要方面。

第三，自觉能动性的发挥还有正确和错误之分。自觉的能动性是正常的人所共有的，任何个人、集团、阶级均无例外。但自觉的能动性并不等于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它有正确和错误之分。从实际出发，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规律，就是正确地发挥自觉能动性；脱离实际，思想和行动违背客观规律，就是错误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

其次，毛泽东正确地估计了自觉能动性的作用。他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还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②“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③这就是说，发挥自觉能动性，要以客观物质条件作基础，受它的限制；但另一方面，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们发挥自觉的能动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8页。

③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7页。

性，能够改变一些条件，创造一些条件，促进或延缓事物的发展；在具备了客观可能性的时候，自觉能动性在变可能性为现实性中，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胜负是这样，其它的工作也是这样。

三、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就要认真处理好与客观规律的辩证关系。只有尊重客观规律才能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只有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才能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达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目的。

要尊重客观规律，就要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只有掌握了客观规律，才能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所以，人们要想取得工作的胜利即取得预想的结果，就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符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就是说，当人们还不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时，行动就会处于盲目和被动状态；当人们认识了事物的规律并在实践中逐步学会运用规律时，行动就会比较自由。人们对客观规律认识得越深刻，运用得越正确，行动也就越自由，人们也就越能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促进客观必然的实现。因为越是认识和掌握了客观规律，就越能限制客观规律对人们的不利作用，发挥客观规律对人们有利的作用；同时，越是认识和掌握了客观规律，就越能了解事物变化发展的趋势，从而对客观规律的发展作出科学的预见。这样，就能在工作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另一方面，要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又必须发挥自觉的能动性。认识客观规律，特别是运用客观规律，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1页。

必须下定决心，鼓足干劲，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开动脑筋，勇于实践，善于学习，发挥聪明才智，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过：“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①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怎样取得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取得呢？显然要在用后者的方法而不能用前者的方法。

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必然和自由的关系。人们依据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就能获得自由。毛泽东曾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②这就告诉我们：自由必须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而对必然的认识和利用，又必须靠人的主观努力，自由不会自发的到来。人们只有通过实践，认识了客观规律，并且进一步在实践中学会正确地运用规律，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才有真正的自由。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实践的意义，认为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且应是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恩格斯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思想。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478页。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第三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著述的一部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专著。这部著作和其他革命导师的著作一样，不是偶然的、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为解决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思想而写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从哲学上概括了十几年来中国革命战争所取得的实践和认识的丰富经验，系统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规律，特别是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辩证规律。为反对革命斗争中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以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照亮了思想上前进的道路。它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理论的发展作出独特的重大的贡献。

第一节 《实践论》的问世及其意义

为了深刻领会《实践论》的精神实质，就要首先搞清楚这部哲学专著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当时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什么意义？

一、《实践论》的问世

《实践论》问世于1937年7月。此时，中国工农红军已经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到达了陕北；同时，在长征途中，结束了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日本帝国

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巨大的努力，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当时在中国面临着革命的新高潮。于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所以，当时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就在百忙中挤出时间进行哲学问题的研究，写出了《实践论》这部哲学专著，以解决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7月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止，经历了13年多翻天覆地的斗争，领导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主要是党的领导人）犯了四次严重的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受的损失更大，使辛辛苦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在苏区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丧失了百分之百。直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

在这样的时期中，中央领导机关之所以一再地犯路线错误，当时党中央的负责人要负主要责任，但究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于广大党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高，政治上还不成熟，还不能识别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如果党内多数同志不赞成机会主义路线，它要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可是实际上，每一次机会主义都取得了统治地位。相反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了，却没有为全党所认识。所以，机会主义的领导人虽然换过几次，机会主义本身却始终还是居于统治地位。显然，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存在下去，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经过事实的惨痛教训，广大党员和干部对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是逐渐有所认识了，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逐渐有了体会，遵义会议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当时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这种认识主要地还是从血的教训中得来的，还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如果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今后如果出现了新形态的机会主义，仍然不能抵制。因此，毛泽东认为，必须在全党开展一个马列主义的学习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形成全党在马列主义的思想上的统一。所以，毛泽东一到达陕北，就以极大的毅力和高度的勇气来从事理论工作，系统地清算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具体错误，当然必须清算，而且也作了清算。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立即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等著作，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的“左”倾路线错误，系统地阐明了马列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是仅仅这样作还不够，还没有挖掉机会主义的老根，即世界观的问题或认识论的问题。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具体形态，可是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主观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不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而正确路线的出发点，则是主观同客观相一致，认识同实践相统一。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分歧，是两种世界观的分歧。这就是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最深刻、最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党同志懂得了这个区别，找到机会主义的老根，那就不仅知道机会主义的个别形态的具体错误，而且知道一切机会主义的共同错误了，机会主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也就不可能了。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认为必须把世界观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放在思想斗争的最前列，必须从哲学战线上彻底打

败机会主义。只有这们，才能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

《实践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为着保卫党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解决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同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的分歧而写作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二、《实践论》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供了理论根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科学武器，没有这个武器，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历次革命的失败，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推导出，只要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革命就可以一蹴而就地取得胜利。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它的一系列原理和结论，是根据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具体情况总结出来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是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制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来指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否则，也是要遭到挫折或失败的。这是由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一再遭受挫折或失败的事实而证明了的。

毛泽东根据列宁关于“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应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同时它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①的意见，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

^①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与王明教条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斗争，集中地表现在中国革命应不应该、能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斗争过程中，逐步总结并形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就抵制了共产国际在许多问题上不了解实际情况而又作遥控指挥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以及当时党内那些不调查研究而只奉行“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无“的”放“矢”的错误。毛泽东著述的《实践论》，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从认识论的高度，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进行了科学的论证。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所决定的。马克思在他的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费尔巴哈论纲》中，阐明了新世界观根本不同于以往旧哲学的特点：以往的旧哲学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但不能以解释世界为限，而应当更进一步指导改变世界的实践。毛泽东为了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用“有的放矢”形象的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这种关系。他说：“‘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①他反复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射中国革命之“的”。并且针对我们革命队伍中曾经出现过的两种情况，作了尖锐的批评：一种是“无的放矢”，乱放一通，其结果是使革命遭受失败；另一种是口赞好箭、不愿放出的古董鉴赏家，这种人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1页。

系。这两种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所掌握的“矢”，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矢”，而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之“矢”。

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要求来看，也必须“实事求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阐述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时说过，唯物论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也正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从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求出其中固有的规律性；而不是从主观出发，不是从任何外来的成分出发，臆造出所谓的“规律性”。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原则，深刻地说明了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就理论的内容来说，理论应该和客观的真实情况相一致，因为科学的思想是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这也就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应该是从客观事实中求出来的“是”。就理论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关系来说，理论应该和实践一致，理论反映客观实际的科学内容要来源于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实事求是是在实践基础上主观正确的反映客观的问题，也就是物质变精神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是在理论指导下主观改造客观的问题，也就是精神变物质的问题。所以，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是主观改造客观和主观反映客观的辩证关系所要求的，是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所要求的。《实践论》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道理告诉了我们几条最根本的哲理，这就是：人的认识只有同客观外界的规律相符合，才是正确的认识，不符合就是错误的认识；正确的认识能够使我们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而错误的认识则只能使我们在实践中遭到失败；而要取得正确的认识，只有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又回到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去检验。所以，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

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了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表明，是否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认识论原则既融铸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提出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认识论原则，在理论上丰富和深化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它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紧密地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并且发展成为党的完整的思想路线。因为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更有成效的进行科学的社会实践，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同如何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结合起来，才能逐步形成党的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很明显，这条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深化和发展。

三、《实践论》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传播与普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打算写一本通俗论述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小册子，但都没有来得及做，就与世长辞了。毛泽东写的《实践论》一书的问世，就把这件具有伟大意义的工作完成了。它简明扼要，阐述精辟，全书只有一万多字，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读完。而且语言通俗，形象生动。在阐述上，除使用人民群众的语言之外，还结合人民群众的切身经验，使人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易懂。有了这样一部著作，就能真正使哲学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了。这是毛泽东对传播和普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贡献。这不仅是对我国人民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而且对于世界上一切革命的人民、革命的政党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直接意义。所以，原苏联《真理报》在毛泽东的《实

践论》重新发表时，于1950年12月18日发表了题为《论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编辑部文章，评论毛泽东的这一著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践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①。“作者全面地考察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而且论证和发展了每一个原理。”^②

原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1年第74期（中文版）上登载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一文说：“这篇著作渗透着党性和对唯心主义与主观主义以及庸俗经济主义的不可调和性。其目的在于教育干部进行中国革命，它是在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写的。因此，它是理论与实践之统一这一命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执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及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认识论的斗争中重要的资产。”他们的这些评价是公正的，是符合《实践论》的本来面目的。

除此以外，《实践论》还把认识论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把哲学原理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法，因而更有利于广大群众和广大干部把认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认识论的时候，同时把它具体化为工作方法；讲工作方法的时候，同时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这就不仅阐述了认识论的原理，而且告诉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运用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9日。

②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29日。

认识论原理的具体方法，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指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则是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相容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不断变更的历史，也就是说，社会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即劳动群众的历史。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且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英明论断。他们在同唯心史观的斗争中着重从历史观上阐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这一思想，而且进一步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一科学概念，把实行群众路线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来认识。

在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之后，毛泽东又把群众的观点引入了认识论，这就把他所创立的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路线紧密而有机地统一起来，阐明了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他认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剖“麻雀”等等，都是为了使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结合。因为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①

毛泽东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来源于实践，然而认识还要再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纠正、完善、丰富和发展已有的认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观点，即认识从实践中来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288页。

(人民群众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的观点。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去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同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也是一致的。因为毛泽东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就是把群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上所获得的十分生动,十分丰富,但又是分散地无系统地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到群众中去”,就是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正确认识所形成的理论、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等,再交给群众,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之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也就是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

毛泽东把群众路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并把它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样一来,无论作那一项具体工作的同志都感到哲学就在自己身上,无论作什么工作都应该而且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道理去做,就使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真正地树立起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集体的智慧、集体的经验的牢固的群众观点,也就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和集体、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从思想上防止主观主义以及在工作中避免官僚主义。党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其道理之一也就在这里。所以,《实践论》对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物质力量,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独特贡献。

第二节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没有用专门的篇幅复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认识论上已经解决了的某些理论问题，而是一开始就直接了当地从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讲起，抓住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和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致命弱点，系统地阐明、发挥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一、完整地概括实践的内涵及其特点

关于实践的内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作过论述。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感性的活动”、“客观的活动”，是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还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总结了新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他指出：实践是人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②还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③从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实践概念的科学含义和实践的基本特点作了明确规定和阐述。

首先，他指出了实践既不是纯主观的思维活动，也不是纯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8页。

②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5页。

③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7页。

观的实在本身,而是在主观思想指导之下的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这不仅与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根本不同,而且也与旧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划清了界限。

其次,他强调了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鲜明的突出了实践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人们通过实践能动的认识世界,更重要地表现在人们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中。

再次,他阐明了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所谓认识从实践中来,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主要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受人民群众实践的检验,这就突出了实践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由上可见,毛泽东关于实践的内容和特点的科学阐述,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二、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关于实践的形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都曾做过多方面的论述。他们认为实践不仅包括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而且也包括实验。列宁还认为,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也是一种实践。毛泽东发挥了他们的思想,对实践的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精辟的论述。

首先,他从实践领域的广阔性出发,阐明了实践形式的多样性,并对实践的外延作了科学规定。他说:“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①这就是说,实践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实践的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外延是极其广阔的。凡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活动，都是一种实践活动。

其次，他把实践的形式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分类。多样的实践形式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毛泽东把实践形式分为基本的和非基本的两大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其他社会实践活动是非基本的形式。后来，他再次强调社会的基本实践形式是建设社会主义三项伟大的革命实践，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这三大实践中来。

再次，他对三大基本实践形式的相互关系作了科学论证，并重点突出了生产斗争这一实践形式。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①，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艺术和教育活动等，无一不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且归根到底都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生产实践是和人类社会相依永存的实践形式，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也是人类认识的主要来源。

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中一项基本实践形式。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活动总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进行的，生产关系则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阶级斗争对生产斗争实践和其他实践有着重要影响。

科学实验作为相对独立的实践形式是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并且随着近代和现代化的生产发展而日益发展起来，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毛泽东所讲的科学实验首先是指自然科学实验，它是人们成功地改造自然而进行的探索性和准备性的活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动，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直接获得某种物质成果，而是为了探求未知的客观过程及其规律。现在的科学实验已不限于自然科学，已扩展到社会科学。科学实验这种实践形式对生产实践和人类社会生活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把科学实验作为实践的基本形式之一并较早地明确提出来，是很有预见性的，现在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就是证明。

毛泽东关于社会实践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思想，不仅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系统化和深刻化，在理论上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繁荣，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但是也要处理好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虽然不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但它并没有熄灭，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有时可能还会激化。因此，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科学实践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为我国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也为我们提供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实现科学技术、科学理论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为此，我们对于每一种基本实践形式，都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

三、系统地阐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分别在有关著作中阐述过实践对认识的作用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时，特别强调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①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象毛泽东那样集

^①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页。

中就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充分的论述。

毛泽东的《实践论》综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针对党内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否认直接经验对于人们获得真知的意义，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从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真理性和认识的目的等方面，系统地、全面地阐发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阐发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人的脑子好比一个“加工厂”，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客观世界，否则，“加工厂”就生产不出任何“成品”来。可是外界的“原料”怎么会跑到脑子这个“加工厂”里来呢？它不会自己跑进来，而要靠我们把它“运”进来。这“运”的办法就是实践，而且只能是实践。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去从事生产劳动、进行建设和科学实验的时候，一句话，只有当我们动手去改造客观对象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感官（眼、耳、鼻、舌、身）才能够同客观对象的各个方面相接触，才能够使它们反映到我们的脑子里来。如果我们根本不去改造某件事物，不去接触它，它怎么会反映到你的脑子里来呢？《实践论》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①“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② 所以，《实践论》反复强调：“无论何人要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288页。

②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

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①这就告诉我们，一切认识（知识、思想）都是通过实践而产生的，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那么，这是不是说，任何一个人只能知道自己亲身接触过的东西，别的就根本不能知道呢？不是的。这涉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问题。为此，毛泽东在论述认识的来源时，还阐述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这是就人类认识的整体而言的，但就个人而言，由于历史漫长的发展和无限的延续，一个人的毕生精力和活动时间都是有限的，哪能事事直接经验呢？而且也没有必要事事都要靠自己亲自实践去获得认识（即直接经验）。特别是有些事情是难于取得直接经验的（如外国的事情），和有些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直接经验的（如古代的事情）。这就需要学习前人和别人的知识（即间接经验）。这种学习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人们少走弯路，是缩短获得知识时间的有效途径。掌握间接经验还能为人们获得直接经验指明方向、提高自觉性。学习间接经验还可以为进一步筛选和提炼直接经验提供理论指导。所以，对于我们自己个人来说，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这两方面都要重视。只重视直接经验，不重视间接经验（书本知识和别人的经验），是不对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很快，知识更新也很快，科学技术知识飞速发展，如果我们不加强学习，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就要成为落伍者。那么，这是不是说认识有两个来源呢？或者说有许多来源呢？当然不能这么说。因为对我来说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对别人还是直接的经验。归根到底，认识还是从直接经验中来，从实践中来的。间接经验好比“流”，直接经验好比“源”。

总而言之，人的认识只能有一个来源，这就是实践。任何英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287页。

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离开了实践，就断了认识的源头，一切都说不上了。

其次，阐述了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毛泽东认为，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他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①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对人类认识活动的高度概括。人类的认识史证明，这一论断是真理。其根据有：

其一，社会实践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新的认识任务，推动着人们去追求、去探索、去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而使人们的认识能够由不认识到认识、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以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为例。人们之所以要去研究自然规律，是为了实践的需要。例如在自然科学史上，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天文学、数学和力学这三门科学。天文学的产生是由于当时发展起来的畜牧业和农业需要确定季节；数学的产生是由于生产的发展需要丈量土地、衡量容积、计算时间（如几何学的发展同尼罗河的泛滥的关系）、同时也还由于天文学发展的需要；力学的产生是由于当时的水利、建筑、造船、航海等方面的需要。欧洲中世纪自然科学的衰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复活”，也都根源于生产的需要。我国解放前后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对比，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对比，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再以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为例。任何社会学说的创立，都是为了适应一定阶级的需要，不管学说的创立者本人自己意识到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3页。

了没有都一样。“为理论而理论”的观点是骗人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研究马克思主义，搞什么“马克思学”，制造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对立，提高马克思的早期思想，贬低甚至反对、攻击马克思成熟后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都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唯一的动力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些规律搞现代化建设，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

当然，我们说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每一个认识活动都一定是直接地被某种实践的目的决定的。有些科学探讨同实践需要之间确实存在着若干中间环节，不承认这个事实，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但是，不管有多少中间环节，归根到底总是被实践需要所决定的，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更加错了。

其二，社会实践不断地为人们的认识发展创造和提供日益完备的认识工具和其他物质条件，从而大大地扩大了人们的认识范围，改善了人们的器官，推动了人们认识的发展和深化。毛泽东说，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创造越来越高级越复杂的工具，将帮助人们向宇宙更广阔的领域更深的层次进军，获取越来越多的信息，把人们的认识推向更加崭新的阶段。

其三，社会实践不断地锻炼和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这也是推动认识发展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指挥员指挥战争的能力和干部的领导能力为例，深刻而生动地说明了人的实践能力、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的。他说：“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

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穿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①我们国家的元帅、将军很少是专门军事学校毕业的，他们的军事知识、军事才干是从哪里学来的呢？主要还是从实践中学来的。是“身经百战”的结果。他还说，对于干部的培养，不应当采取前怕狼后怕虎的态度，而应当让他们做，在做的当中得到教训，增长才干。搞革命是这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是这样。这就是说，实践得越多，实践的能力越强，思维和认识能力也就越强。所以，人类的思维和认识能力就是在长期的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提高的。

再次，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人们对于某个事物有了认识之后，这个认识到底正不正确？凭什么来判断它正确与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只能是社会实践。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恩格斯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③列宁认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毛泽东在继承他们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实践标准的唯一性。他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9页。

②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③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第4卷，第221页。

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①后来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更加明确的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②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就排除了其他任何别的标准，即使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作为检验的标准，因为它本身属于认识范畴，它的客观真理性也是在运用于实践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

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不是说不要逻辑证明。要判定一个认识是否正确，逻辑证明是重要的手段。例如某项计划、方针或工程设计等等在付诸实践之前，是可以而且应该从逻辑上加以论证的。这样，是不是出现了两个检验标准呢？不是的。逻辑规则本身就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并且被千百万次的实践检验过了的；而逻辑推理的前提又必然是在从前的实践中被证明了的可靠知识。而且有许多事情，逻辑证明也还不能作出最后的判断，还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判定它的真理性。所以，归根到底，实践仍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还发挥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思想，指出实践检验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要注意实践的社会性、历史性。作为检验标准的，是整个社会、整个阶级的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不是个人的某一两次行动，是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的实践。一种理论学说，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理论学说的检验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和多次反复的检验才能得到证明。这一思想，毛泽东在其《人的正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

②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

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作了明确的阐述。

最后,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认识之所以能产生和发展,就在于它不仅来源于实践,而且还能为实践服务,能动地改造世界。

强调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马克思早就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毛泽东在批判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是认识的目的、理论为实践服务的思想。他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③所以,毛泽东强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但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就从认识论上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的目的全在于改造世界的思想,进一步阐明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第三节 《实践论》对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深刻揭示

毛泽东的《实践论》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认识经验

①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②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③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的基础上，对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作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和科学的概括。他指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是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两个能动的飞跃。

一、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及其相互关系

毛泽东在列宁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科学地论述了认识辩证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飞跃的思想。

首先，论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能动飞跃。

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就是由实践到认识，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过程。这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属于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说，感性认识是人的认识的最初阶段，它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客观外界事物作用于人们的感官（耳、目、鼻、舌、身）而产生的关于事物的现象的、片面的、外部联系的认识。这种认识由于它是和事物直接联系，因而具有直接性、生动性和多样性等特点。这是认识过程的初级阶段，然而又是必需经过的阶段。只是这种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达到对事物内部的、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所以称之为感性认识阶段。

理性认识是对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是认识发展过程的高级阶段。因此获得理性认识更为重要，是认识的真正任务。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论的认识。”^①理性认识一般表现为概念、判断、推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理等形式。它具有间接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等特点。可见，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是同一认识过程中两个不同质的阶段。

毛泽东把认识区分为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是对认识过程的如实反映，从认识发生发展过程的连续性来考察，这两个阶段既不能混淆，也不能任意颠倒，因为感性和理性不但有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性质上的不同，前者是认识的低级阶段，后者是认识的高级阶段。但两者在实际认识过程中，又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系着的，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其表现是：一方面，理性认识必须依赖于感性认识，只有通过实践，首先获得丰富的可靠的感性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抽象思维，才能产生出理性认识；另一方面，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因为感性认识只解决事物的现象问题，理性认识才解决事物的本质问题，而认识的真正任务则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总之，认识开始于感觉经验，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具体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毛泽东在论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时，还揭露和批判了哲学史上割裂两者关系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特别是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指出了它们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和辩证性，片面地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各执一端，因而在认识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唯理论（教条主义者）“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论靠得住，而感觉经验是靠不住的”。^①所以他们轻视实践经验，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于是就闭目塞听，从不虚心体察实际情况，反而把亲身参加革命实践而有丰富直接经验的同志诬为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

“狭隘的经验论”者。经验论（经验主义者）在党内也确实存在，他们认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①于是他们就满足于自己局部的、片面的经验，不了解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要性，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所以，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的认识论根源，他们在思想实质上犯了同哲学史上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同样性质的错误。

从认识的任务来看，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然而，感性认识怎样才能升华到理性认识呢？根据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论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社会实践的需要和推动。因为社会实践的需要不仅推动人们的认识产生，而且推动人们的认识发展，即由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他说：“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②还说：“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③第二，要有丰富的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毛泽东认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④第三，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材料进行逻辑加工。毛泽东指出：“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页。

②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③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④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0页。

和理论的系统。”^①这就是说，只有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和综合，进行科学的抽象和概括，才能使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三个基本条件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条都不可能加工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毛泽东关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十六字的科学抽象法，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斗争成果的哲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其次，论述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能动飞跃。

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但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说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说，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②“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③因为，认识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指导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同时也因为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否正确，正确的程度如何，并没有受到实践的检验，得到实践的证明。只有通过第二次飞跃，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看它是否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一般来说，凡是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正确的理论，否则就是错误的理论。这就是说，只有通过第二次飞跃，才能检验和证明第一次飞跃是否正确。

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不仅受到实践的检验，而且能得到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1页。

②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③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发展，因为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能完成的。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就能使不正确的认识得到纠正，不全面的认识得到补充，不深刻的认识得到深化，从而推动认识进一步发展。

鉴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既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认为，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比起第一个飞跃则更重要，意义更加伟大。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飞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有重大意义和鲜明的针对性的。对于这个问题，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特别是列宁是很重视的，并作过不少论述，但没有象毛泽东这样着重地系统地加以说明和发挥；30年代苏联和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在讲到认识的发展过程时，更多的是着重阐述从物质到意识和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问题，对于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及其意义却未予重视而作出应有的论述，有的甚至错误地把到达理性认识看作是认识过程的完结或认识的终极目地。毛泽东的《实践论》既肯定了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又反复强调了理性认识必须回到实践。这样，就不仅完整地概括了认识运动的全过程，而且体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思想，突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和以科学的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革命本质。所以，毛泽东关于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飞跃的思想，是对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著的重要补充，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贡献。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这一论述，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讲的。中国革命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是非常宝贵和重要的；但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或者简单地

背诵它的某些条文和词句，而不和中国的实际、中国人民的需要相结合，不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它，那末，马列主义理论再好再正确，也不会变成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综上所述，毛泽东重视认识过程的第二个能动的飞跃，一贯提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要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理论，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同教条主义作斗争而得出的重要理论结论。

二、科学概括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从人类认识史看，人们认识客观规律总要有有一个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不但要经过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完全不深刻的认识，到比较完全比较深刻的认识，而且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成功与失败的比较，在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中，才能使认识合乎客观规律。

首先，对认识过程多次反复性的论述。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①这就告诉我们，人的认识之所以不可能一次完成，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的过程，是因为：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4页。

其一，人的认识受客观对象的发展及表现程度的限制。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是具体的、多样的、复杂的，而且它的发展也有一个过程，甚至是无止境的。当着事物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矛盾及其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人们还无法充分认识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只有当其充分暴露时才有可能认识和把握它。这就需要一个过程。

其二，人的认识也受着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不仅受到客观对象发展过程的限制，而且还受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当一定的科学技术条件尚不具备时，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是会受到影响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例如，在显微镜产生以前，人们对微生物就难以进行研究和认识；没有射电望远镜要考察和研究远距 200 亿光年的星体，那是无法想象的。现在人们对微观粒子的认识，虽然已取得可喜的成就，还有许多科学的假说，虽已接近科学的判断，但由于实验条件不具备，尚不能得到确认和作出科学的结论。

其三，从认识的主体来看，认识也受到个人实践范围、知识结构、水平、思想意识、思维方法和认识能力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一般来讲，人们的文化知识结构越合理，思想觉悟越高，思想方法越科学，人们就越能从实践中、学习中获得正确的知识，反之亦然。这就是说，人们要获得正确的认识，由于主观因素方面的影响，也不得不经过多次反复的过程才能完成。

其次，对人类认识是反复循环，无限发展的过程性的论述。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详细地阐述了人们对于某一具体事物或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之后，进而指出了人类认识运动是无限发展的，永无止境的。他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

远没有完结。”^①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②这是毛泽东对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所作出的科学的高度概括，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其一，这一科学概括，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或总过程，使之具有更加明确简洁、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认识是一个过程的思想的深化和升华。

其二，它明确地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是贯穿于人类认识过程始终，推动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矛盾。人类的认识运动就是认识与实践这一对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人类实践的发展没有止境，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永远不会完结。人类认识运动正是在实践和认识矛盾的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过程中前进的。

其三，它还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形式是循环往复曲折前进的过程。即人类认识运动从形式上看是无限循环，是重复，但不是简单循环，简单重复，而是每一循环、重复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人类认识就是在这个无限循环重复的过程中前进和深化的。

其四，这一科学概括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再认识的概念。毛泽东认为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前进的，再认识是人类认识运动中的普遍现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辩证发展过程。再认识是这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实质上，人类的每一认识都可以说是再认识。因为人类的认识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的过程，每一具体认识都既是过去认识的结果，又是今后认识的起点。人类认识就是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②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297页。

要不断发扬正确的认识，纠正错误的认识，抛弃过时的认识，补充新的认识，从而使认识不断更新、深化和发展。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再认识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社会性质和革命发展规律，从而夺取革命胜利的理论指南，今天这一思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三、提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

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列宁语）、“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斯大林语）的思想，一贯坚持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他在论述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时，明确地概括出一条重要的科学结论。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的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这一科学结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这一结论是对人类认识发展史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正确地回答了认识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但他们都不懂得在实践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曾长期争论不休，但它们也都没有给予科学解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人类认识的发展史，认为主观和客观和矛盾是贯穿人类认识运动始终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实践过程中则表现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矛盾，它们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解决。人们的认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也就是说，人的认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的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亦即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

其次，这一结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本质特征作了精辟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实践为特征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一结论认为认识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统一应当是具体的，即主观认识要同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客观实践相符合相统一。这个统一，还应当是历史的，即主观认识要同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客观实践相符合相统一。只有达到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们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但把这种真理性认识运用于实际改造客观世界时，也总是要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和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就在于此。由此可见，不论是正确认识世界，还是有效地改造世界，都应当是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达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最后，从实际意义上说，这一结论深刻地揭示了党内两条不同政治路线的认识论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种错误路线其具体表现形式虽不同，但其认识论根源却是共同的，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离开了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它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条正确路线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可见，毛泽东所得出的结论，不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而且还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认识论基础。

第四节 《实践论》对认识真理的道路和真理发展规律的揭示

毛泽东在论述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和真理发展的规律，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作出了贡献。

一、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绝对真理

人们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一切矛盾。客观世界的一切矛盾、一切事物都能够或先或后地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所以，对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人们是能够逐渐认识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由不认识到认识、由不深刻不全面的认识到比较深刻比较全面的认识，是一个由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客观物质世界不论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无限的。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认识具有相对真理的性质，但是，每一相对真理都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①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过程，就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全面到比较全面的认识过程。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一共1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9页。

统一起来。”^①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②革命如此，建设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是经过了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误的多次反复才逐步认识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从而认识到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找到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贡献。但是，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并没有完结，仍然需要继续努力探求，从而获得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所谓绝对真理，就是人们对无限发展着的整个客观世界的完全正确的认识。所谓相对真理，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这种认识之所以是相对的，是由于各个具体过程在客观世界无限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有限的，每一时代的人由于受着主客观的各种条件限制，只能认识这些有限的、具体的发展过程，只能认识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一方面，而不可能认识它的全体、它的一切方面；而且对这一部分，这一方面也只能认识到一定的程度，还需要不断地深化。那么，这是不是说，人们只能获得相对真理，而不能把握绝对真理了呢？当然不是。人们认识了客观世界一个又一个具体过程，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相对真理，也就一步一步的接近着对无限发展的整个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接近着绝对真理。尽管就每一代人或每一个人来说，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整个人类（包括过去、现在、未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页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页

来的一切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无限的。依靠无穷的世世代代人的不断努力,绝对真理是可以把握的。正如绝对的无限发展的客观世界是由无数相对的有限的具体过程所构成的一样,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构成的,它就是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同时,绝对真理并不是同相对真理毫不相干的另一个东西,相对真理中包含有绝对真理的成分,绝对真理就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每当我们获得一个相对真理的时候,也就获得了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把绝对真理比作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那么,相对真理就是汇成这条长河的无数“水滴”。世界上既没有离开相对真理而存在的绝对真理,也没有不包含绝对真理成分的相对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这种辩证关系,贯穿在人类认识的全部发展过程之中。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通过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所以,在认识真理的前进过程中,既要反对绝对主义,又要反对相对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在哲学史上长期存在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也产生过类似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错误倾向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属于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革命导师的言论教条化,把苏联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否认革命理论需要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需要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而经验主义者则把自己的经验绝对化,并夸大为绝对的普遍的东西。

我们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在真理问题上,在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上,一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真理,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体,必须坚持它,同时,也要认识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封闭的体系和停滞不前的,而是开放的科学体系,在和革命实践的结合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

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

二、对真理的认识永远不会穷尽

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无穷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的无止境，决定了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永远不会完结。毛泽东指出：“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是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① 这就告诉我们：

第一，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矛盾就是绝对和相对、无限和有限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客观世界的现实矛盾的反映。

第二，人们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一切矛盾。社会实践的每一个过程尽管是具体的，有它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但人类世世代代的实践则是无穷的，并且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随着人类变革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

第三，真理是不可穷尽的。因为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马克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思列宁主义虽然是“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它并不是什么“最后的、终极真理”，它也是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不过由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在实践中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

三、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为要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就必须参加社会实践。

实践是真理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人们只有不断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不断地去接触和发现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积累大量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同时还要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把获得的感性认识提炼、升华，使之成为带有系统性的科学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的认识，为人类认识的长河增添新的真理颗粒。

第四章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根据，它曾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并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发生深刻的影响。它同我们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与前途息息相关。因此，坚持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紧密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深入研究毛泽东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我们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繁荣昌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辩证法思想的集中体现。它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吸收了列宁逝世以后辩证法研究的积极成果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对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发挥，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主要的解决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问题，而把“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问题暂时放下了，这是为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因为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人追击，时间上不允许讨论和解决更多的重大问题。政治

路线、军事路线以及军事指挥问题是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如果不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撤换“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当时在会议上首先解决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指挥权的问题，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这就体现了抓主要矛盾问题的重要性。

思想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理论问题、总结经验的问题以及认识和觉悟问题，如果当时都提出来进行批判，不仅难于为犯“左”倾错误的人所接受，而且那些受“左”倾思想影响的人也将难以接受。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有一个耐心等待的过程。所以在遵义会议两年半之后，毛泽东才于1937年的7月和8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专著，对“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认识根源进行了清算。

《实践论》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出发，为克服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着重从理论上解决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但这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还必须解决另一半，即认识和实践的方法问题。《矛盾论》就是从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对立中，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并系统地批判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宇宙观

宇宙观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观。宇宙观就是人们对宇宙总的看法。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两种关于宇宙发展规律的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根据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论述和哲学发展的历史，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看作是两种宇宙观的对立。

一、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的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①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形而上学的主要观点。恩格斯用两句话揭示了形而上学的实质。他说：“形而上学者思维于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之中。他的说法是：‘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②在他看来，世界上的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征，开始存在的时候怎样，以后便永远是怎样，永远是静止、固定不变的。有的时候，他们也承认变化，但只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场所、位置上的移动，一种事物永远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没有质的变化，一种事物不能变为另一种事物。说到社会发展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发展的质的变化，只承认数量的增减。而这个量的变化原因，在于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地理气候好的社会进步就快，不好的进步就慢。

形而上学宇宙观、思想方法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生活中，也时有反映，这里面多数是不自觉的，或者说是一种旧的思想习惯，不懂得或不习惯于辩证的思维方法，往往就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或观点里面去。同时，也还因为形而上学是最简单的思维方法，看问题，想问题，一就是一，最简单，一分为二就复杂了。把一个事物孤立起来，固定化，只看表面现象，比较着一个事物同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看其发展变化和本质，那就简单省事多了。就拿我们经常反对的官僚主义作风来说吧。我们知道，作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0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0页。

风是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表现。官僚主义作风的思想实质就是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官僚主义者看问题的特点是主观、片面；在不深入、不调查、不了解具体情况的情况下领导工作，凭主观想象、印象办事，抓住一点、一面就当作全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个别而不见相互间的联系；只见一时的动向，而不考虑其历史发展的规律。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和唯物辩证相反的。

再如，在我们的工作中，搞文件周转的事情，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种情况通常称之为文牍主义。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反对文牍主义的。因为文牍主义是官僚主义或“机关化”工作作风的一种表现。喜欢搞文牍主义的领导者，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认为公文、报表、统计万能，好象没有大量的文件、报告、表格、数字就算不了领导，于是就热衷于文牍工作，把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约束在这上面了。当然，适当的文件、总结报告、表格、统计是必要的，反对的只是那种工作不深入、坐在办公室里、埋在文件堆里、泡在会海里的不正常现象。因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是既复杂又具体的，天天发展，不断变化；而再好再多的文件、总结、报告以及数字都不能全面地、发展地表示出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具体变化；任何统计数字都受一定时间、空间的局限，都不能完全说明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发展和创造，更不能说明思想状况、主观努力在科学研究、生产、工作实践中的伟大力量。当然，以适当的、一定的总结报告、统计数字说明问题，供领导者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的参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迷信总结报告、统计数字万能，并且拿它来办事，这就违背了辩证法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根本原则，陷入形而上学了。

在处理政治、思想这类非常复杂的问题，更不可以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如果采取了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思想方法来处理政治、思想问题，那就“害死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三

次“左”倾机会主义者对同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他们用孤立的、片面的、固定的和绝对化的观点和方法来处理政治思想问题，结果就把简单的问题扩大化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两可之间的问题绝对化了，于是到最后把人“一棍子打死”了事。“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对一大批老干部和革命者也是采用的“一棍子打死”的形而上学方法，使革命和建设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这同毛泽东所主张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是没有共同之处的。毛泽东的思想、原则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者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同他们的一系列“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主张一样，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小全有。小到同志之间的关系问题、日常生活琐事问题。例如，同志之间的相互批评本是运用唯物辩证方法，推动进步的好事，可是有些人却往往不自觉的犯了形而上学的片面化、绝对化的毛病，批评起来，往往有坏则全坏，毫无可取之处；或者表扬起来，往往有好则全好，一点缺点都没有。这种抓住一面而不考虑另外一面，不能用“两分法”来评论人的方法，当然也就不能说服人；互相批评或者赞扬，本来是好事，结果反倒变成了坏事。

从以上我们所举的例子来看，在我们的工作中，如果思想、观点一旦离开了唯物辩证法，就会犯形而上学的毛病，这一点必须经常地、不断地引起人们的注意。

毛泽东说，宇宙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有了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办起事来就必然是用这个思想观点来指导实际行动，于是就把思想观点变成方法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树立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克服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一切按辩证法办事。

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正好相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它要求人们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即对立统一的观点，去观察世界和一切事物。它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结合实际事例论证说明了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根据和条件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

首先，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承认不承认事物内部有矛盾性这是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分歧。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首先就是承认这种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既然任何事物内部是矛盾的对立，那么对立着的两方就要斗争，斗争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就要引起质变转化，由一事物变化为另一事物，这就是事物的发展运动。如此斗争、发展、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也叫事物发展运动的内因，它是事物发展运动的根据。

其次，一事物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是事物发展运动的第二位原因，也叫做外部条件或外因。任何事物的发展运动都离不开外因条件。

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归纳起来就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把外因作为发展变化的第二位原因，仅仅把它看作是外部条件，是因为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运动，即范围的大小，位置的移动，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相互变化。即使是复杂的外部原因引起事物的发展变化，仍然是它的内因是发展运动的根据。如植物和动物的生长过程都受着复杂的外部条件

的影响，土质、温湿度、气候、营养、环境等等都是它们生长的外部条件，但是这一切都是通过动、植物本身的新陈代谢的生命运动而起作用的；是动物和植物生长繁殖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外因只能是事物发展运动的第二位原因。自然界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在个人的成长中也是如此。我们有些同志在同样的环境下接受教育和培养，但是有的同志进步得快，有的同志则进步得慢，甚至落后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个人的思想状况和觉悟状况的不同，主观努力的不同。又如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不肯从主观方面即内在的原因去检查，而归之于客观原因，总认为客观条件的影响是主要的，甚至怨天尤人，结果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外因论”。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并不排斥外因，认为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例如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毛泽东关于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理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大革命的失败，有多种原因：蒋介石的叛变，民族资产阶级站到革命的反方面，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等等。这里，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的存在，是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无产阶级的第一位原因，大资产阶级的叛变是第二位的原因，大资产阶级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中国共产党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以后，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受到了敌人的严重打击，不得不被迫离开根据地，而长征北上。在这里，蒋介石的多次“围剿”，正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内的冒险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中国共产党清

第了这种冒险主义，中国的革命事业又重新发展了。这说明：“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要想取得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仍然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中，毛泽东把内因与外因的辩证法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革命和建设，强调依靠中国共产党，依靠中国人民自己认识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实现阶级、民族的解放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性，促进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固然，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支援下进行的，其中包括共产国际的帮助，原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的帮助等等。这种帮助和支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胜利。

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这样。毛泽东一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这一方针在克服原苏联撤走专家、斯大林同志所造成的暂时困难，抵制大国沙文主义，维护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提高民族自尊心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当然，强调依靠人民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并不意味着可以采取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经验和吸收外资的政策。这种排外、盲目排外，把自己与世隔绝起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违反辩证法的，错误的，有害的，不利于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富强。时代不同了，国内和国际的条件都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页。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应该彻底抛弃在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卫生体育、经济贸易以及各个方面把自己封闭起来的观点，这不是否认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方针，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坚持这一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革命和建设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它是万万不能抛弃的。但同时又应该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以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吸收外资辩证地统一起来。

再次，外因是可以转化为内因的。

当一个事物这样或那样的接受了外部条件的影响，引起了质的变化，原来的外因就转化为自己内在的发展因素了。例如，我国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引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本是外因；但当这些外资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已经发生效益，这种外在因素就转化为今后经济建设内在发展的因素了。对于个人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外因条件转化为内因思想也是正常现象。人的思想发展变化与客观条件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例如，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水平提高了，变成为自己的思想，就成了自己今后继续发展的内在因素，这就是外因转化为内因的根据。人的思想变好是这样，变坏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不中无产阶级思想坚定的人，被打中的一定是有内因根据的，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过去以及当前在经济领域里面揭发出来的贪污受贿、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绝不是仅仅的偶然外因，而一定是有不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贪图享受，平素就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由来已久的内在因素，发展到一定时机，遇到了一定的环境，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一击就中。

第二节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事物的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是在区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对矛盾所作的划分，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则是矛盾学说的进一步展开。它所回答的问题是：矛盾是不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如果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存在于各个事物，各个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矛盾，以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是否具有特殊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毛泽东在继承恩格斯、列宁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的前提下，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明确地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作为矛盾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论述，对矛盾的普遍性作了明确的规定，系统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结，突出地论述了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教导人们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错误，发挥了列宁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全面地论述了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论的辩证法，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毛泽东之所以注重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研究，是为了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以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地向前发展。

为了深刻地理解作为毛泽东辩证法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理论，有必要从辩证法思想史的角度作一些简要的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前有一些哲学家，涉及到了普遍、特殊与个别这三个范畴，认为个别是真实的存在，普遍只能在个别中存在，正如“房子”只能在具体的房子中存在那样。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集中地论述了普遍性、特殊性与个性。他认为普遍性

是包含特殊性与个体的普遍性，个体性是包含普遍性的个体性，而特殊性则是联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环节。不过黑格尔在这里所讲的个体性，不等于感性的具体事物，而是理性的具体范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及到了感性的个别与知性的普遍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论述了普遍、特殊、个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既论述了从感性的个别经过特殊到思维的普遍的过程，又论述了从思维的普遍，经过特殊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集中地论述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那里的个别是感性的具体物。

从上述简略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哲学家都涉及到了普遍、特殊与个别这三个范畴，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所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所列举的各个领域的矛盾来看，虽包含有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容，但即便是在“辩证法的要素”中，列宁也没有明确把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列为要素之一。毛泽东基于指导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明确地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矛盾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集中的论述，无论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还是从人类认识史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每一事物内部既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也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为了叙述的方便，先写矛盾的普遍性。

一、矛盾的普遍性

所谓矛盾的普遍性，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

运动。”^①这是辩证法思想史上关于矛盾普遍性的一个最好的规定。一方面，它从存在与发展的最广大的范围揭示了矛盾的最一般的性质；另一方面，它与承认思维领域有矛盾而否认自然界和社会有矛盾的新康德主义、分析哲学的种种说法划清了界限，与否认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的德波林学派也划清了界限。

毛泽东在对矛盾普遍性的范畴作出了规定之后，进一步论述了“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②的观点，批判了德波林在这一问题上的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德波林说：“无区别的同一是一种纯朴状态，一切存在物都应当从‘纯朴’状态中，即从无区别的抽象的同一中摆脱出来。但同一转化为差别，差别又转化为对立，而后又转化为矛盾。”^③毛泽东批判了德波林的这种错误观点，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是矛盾发展过程的最初状态。差异，矛盾激化，对抗，是矛盾发展的不同状态，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而不是矛盾有无的问题。否认事物自始至终的矛盾，就必然要走向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

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规定，深刻地揭示了矛盾无处不在、无事不在、无时不在，即矛盾处处有、事事有、时时有。矛盾即是事物，即是运动，即是过程，即是思想，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对于反对形而上学，把辩证法贯彻到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有些人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否认矛盾的普遍性。于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内团结的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坚持和捍卫了矛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5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③ 德波林：《哲学与政治》第659页。

盾普遍性的原理，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批评和纠正了社会主义社会无矛盾的形而上学思想。他说：“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①他还进一步指出，对立统一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 and 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②

在社会领域，毛泽东还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重要思想，并深刻的指出，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为人们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指明了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个发展。

毛泽东还指出：“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③为了在人民群众中通俗宣传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

① 毛泽东：《党的团结的辩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6页。

③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象，这就是辩证法。”^①所谓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的通俗表述，其含义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关系时作了说明。他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②这和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所讲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③是一致的。决不能把一分为二简单地归结为优点和缺点、正确和错误之分，更不能把它歪曲为只讲斗争，不讲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一分为二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

既然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就必须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必须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两分法，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片面性。毛泽东指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因此，“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④除此外，毛泽东还针对一些人不讲辩证法，对事物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指出：“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

① 毛泽东：《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

③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④ 毛泽东：《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第2页。

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①毛泽东所阐发的“两点论”、“两分法”的思想方法，已为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矛盾的特殊性

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经指出，不仅要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②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它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的特殊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列宁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从方法论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③还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象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把共产主义共同的和基本的原则应用到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上去，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上去，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应该善于研究、探求和揣测这种特点。”^④但是，马克思、列宁没有把矛盾的特殊性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作出系统的概括和阐述，也没有着重从理论上考察矛盾特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③ 列宁：《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290页。

④ 列宁：《英国“左派”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243页。

殊性的原理。毛泽东在其《矛盾论》中，创造性地、系统地阐述了矛盾特殊性的理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把矛盾特殊性展开为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特殊性，物质运动的形式的发展过程和阶段的特殊性，以及过程、阶段的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及主要的矛盾方面，等等。

在谈到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特殊性的时候，毛泽东继承了恩格斯的思想，并着重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尤其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任何物质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特殊性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成为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

在谈到物质运动形式的每一过程的矛盾及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的时候，毛泽东密切联系革命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说明了不仅各种物质运动形式有其特殊的矛盾，而且就一种物质运动形式的发展的每一过程来说，其矛盾也有特殊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①。例如，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社会与自然的矛盾，等等。绝不可象教条主义者那样，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公式去到处硬套。例如，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用城市武装起义的方法去解决中国弱小的革命力量与强大的反动势力的矛盾，用敌我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正规战的方法去解决红军与反革命军队之间的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矛盾，等等。这样做不仅使本来可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而且会使革命事业遭受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的挫折。不仅每一过程的矛盾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矛盾的各个方面也各有特点，也不能一律看待。例如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我党成员一方面实行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革命军中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等方式，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一方面以保持我们党的独立性，批评国民党右派等方式，同国民党进行必要的斗争。而蒋介石一方面伪装革命，一方面则图谋把共产党打入血泊之中。由于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行为以及我们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必要的斗争，导致了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破裂。在此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队以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围剿”，企图消灭革命力量，我们则以一次又一次的反“围剿”，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斗争。如果我们不具体研究国共两党的这种特殊性，就不可能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就有可能重犯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错误，导致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把物质运动形式的各个发展过程及过程各方面特殊性理论，紧紧地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联系起来，阐明了中国社会各个发展过程的特殊矛盾，为正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谈到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矛盾及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的时候，毛泽东阐述了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的理论，并且用它们的发展变化说明了过程发展中的阶段性，教导人们要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的区别以及各个阶段上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毛泽东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发展，透彻地阐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的区别，并进而具体的论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几个发展阶段根本矛盾与非根本矛盾的发展变化，具体地论述了在各个

发展阶段上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

从以上简略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矛盾特殊性的理论，绝不是对哲学教科书中某些观点的简单复述，而是包含了中国革命丰富经验的辩证法和认识论，它与中国革命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虽然在30年代，某些哲学教科书曾涉及到矛盾特殊性的许多思想，但并没有系统化。把矛盾特殊性的理论加以系统化的论述，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结合起来，无疑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中国化的一个贡献。

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矛盾特殊性理论的系统论述，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理论方面来说。首先，它是客观辩证法，深入地揭示了客观矛盾的多水平、多层次结构，揭示了矛盾的多种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它是认识的辩证法，揭示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规律。再次，它是思维的辩证法，具体地说，它是矛盾特殊性的系统分析方法，是逻辑与历史、结构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是包含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的方法。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一理论，无论在革命或建设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实践方面来说。首先，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因为人类认识事物，总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事物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特殊。“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就在于：一方面，他们不懂得只有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有可能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不懂得在研究了矛盾的普遍性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事物的特殊性。他们拒绝对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产生的东西，把它变成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其次，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因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

决。”^①例如，俄国十月革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正确有。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则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国情不同，革命的具体道路和方法也就不同。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也要根据中国当代的国情去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

三、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 相互联结与相互转化

毛泽东指出：“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②毛泽东这一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的基本论点，是说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也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矛盾特殊性之中，普遍规律存在于特殊规律之中。这就是说，共同的本质存在于特殊的本质之中，普遍规律存在于特殊规律之中。因此，要解决具有不同特点的中国革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这特殊规律不是离开普遍真理的，它包含着普遍真理，它是普遍真理的特殊化。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的思想，正确地回答了列宁所提出的多级本质的问题，与此相联系，也从矛盾学说方面论述了普遍规律、特殊规律之间的结构。毛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

泽东还说：“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普遍性。”^①毛泽东这一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相互转化的理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其特殊的国情。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找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并把中国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的。教条主义者 and 经验主义者都不懂得从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联系中去研究事物内部所包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不了解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转化，因而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特别是教条主义者，他们一方面不善于区分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把特殊规律以至某些具体结论当作普遍规律，一方面又否定普遍规律与具体情况的结合，极大地危害了中国革命。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的关系，就是个性和共性、相对和绝对的关系。共性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②个性是说每一事物，每一过程的矛盾都各有其特殊性质，这就是个性。一切事物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着的，所以是相对的。如果除去了一切过程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没有什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9页。

么矛盾的普遍性了。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所以矛盾的特殊性和矛盾的普遍性是相互联结的。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也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怎样相互联结的呢？首先看共性（普遍性、绝对性）是从哪里来的，共性是从千差万别的各种各样的特殊性的事物中抽出来的本质。共性不是在一一切个别事物以外单独存在的，而是寓于所有事物的个性之中，如果除去一切个性，也就没有什么共性了。但是共性又不能完全包括所有的个性，它只能包括所有个性的共同本质。因此，个性还有它自己特有的东西没有包括到共性里面去。

例如生物，对于有生命的东西来说这是“共性”。但是生物又分为植物、动物两大类，而每一类又分为若干科目。所有这些动物、植物的种、类、科目相对于生物来说，它们都是个性。“共性”这个概念是从一切有生命的个性抽象出来的，它并不是一切具体的有生命的东西之外单独存在的东西。但是“生物”这个概念又没有包括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个别特点，而只是包括了所有个性的共同本质。

再如“阶级”这个概念，就是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等阶级中去掉其单独特点，抽象出来的共同本质。而地主阶级对于所有地主来说，农民阶级对于所有农民来说，资产阶级对于所有资本家来说，无产阶级对于所有工人来说，又都是共性。而这个地主、那个地主；这个农民、那个农民；这个资本家、那个资本家；这个工人、那个工人，又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是个性。但是它们的个性，总是不会离开它们的阶级共同本质的。例如，资产阶级的各个个体，虽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质，这就是损人利己，剥削成性，这是它们必然具有的共同本性。

除此以外，从前面的论述中，还告诉我们，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不能作死板的理解。因为事物范围是极其广大的，而发展又是无限的。所以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会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会发生变化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所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说，这是矛盾的特殊性。

了解了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认识事物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客观上既然存在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那末，人的认识过程也必然要符合这个辩证关系；如果离开了这个辩证关系，人的认识就会发生错误。换句话说，我们认识事物，既要认识事物的共性，又要认识事物的个性。认识了事物的共性，就便于深刻地去认识特殊事物的个性；更多的认识了事物的个性，也就能更深刻去认识共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

以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

我们在前章阐述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时已经知道，人的认识过程是：从感性到理性是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也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这就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是认识的第二阶段，第二次飞跃，这就是由一般到特殊的过程。认识总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也就是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往复过程。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的矛盾正是这样，先由认识特殊性矛盾开始，上升到普遍性矛盾；认识了普遍性矛盾，再以它为指导，进一步深入地认识特殊性矛盾。如此循环往复，使人们对于客观矛盾的认识不断深化。

我们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就要正确地掌握和运用这个辩证法，绝不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它，把它们割裂开来。

把这个辩证法用来指导工作，就是“抓住两头”的工作方法，即“吃透两头”的工作方法。“两头”是指上下两头，上头是党的方针政策，下头是具体工作的实际情况；上头是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下头是矛盾的特殊性、个性。上下两头是密切联系的辩证法，作领导工作的人，如果不很好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就不能正确地指导实际工作；反过来，如果不深入实际，具体地了解实际工作情况，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并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上下两头都要抓住，都要吃透。

要抓住上头，即吃透党的方针政策，就要深入下去，结合工作的具体情况，学习、研究、理解党的方针政策；要吃透具体工作中的实际情况，更加需要深入到实际中去，加强调查研究，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矛盾论的方法来说，就是以矛盾的普遍性原则为指导，具体地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不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9—310页。

这样，是不可能吃透两头的，是不可能把党的方针政策同具体实践正确的结合起来的。抓上头为的是正确指导下头，抓下头为的是补充、丰富和发展上头。

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做工作，紧紧抓住上下两头，是一切工作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方法，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方法，是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根本方法，是贯彻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及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也是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方法。

第三节 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

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也是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理论，是回答事物中所包含的诸种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主要矛盾方面与次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是回答矛盾诸方面的矛盾特殊性问题。由于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有其十分突出的意义，所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另列标题进行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概念，但是他们在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的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这方面的思想。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曾经指出，两个极端的对立面的“地位各不相同”，由于一个极端“没有真正的现实意义”，因而“一个极端占了另一个极端的上风”。马克思在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时，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找出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并指出这一矛盾的阶级表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还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一些矛盾，都是受这个根本矛盾所制约的。恩格斯在1892年《致康·施米特》的信

中指出：“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所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①列宁也曾指出：“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你想抓哪个环节就故意挑哪个环节。”^②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都涉及到了主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对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

毛泽东说：“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③

一、主要的矛盾

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中，如果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主要矛盾。由于它的存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他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④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的工作是在复杂的客观事物矛盾运动之中，我们接触这些矛盾，认识这些矛盾的特殊性，目的在于解决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呢？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不能一律看待，要把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70页。

②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第649页。

③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327页。

④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它们分成主次，排一排队，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就好解决了。

例如，当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战争的时候，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而包括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在内的其他矛盾，则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如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以及抗日战争。当着帝国主义不是采用对我发动侵略战争，而是采用较为温和的政治、经济、文化压迫的时候，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而其他矛盾则下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如辛亥革命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都是如此。当着我国革命的发展以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站在一起，与人民大众构成一个主要矛盾。如1927年蒋介石叛变，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就是这种情形。

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发生了多次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因此而实行了相应的转变。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其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军阀的矛盾。为了完成这一时期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开展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实行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蒋介石叛变以后，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不存在了，资产阶级站到了革命的反对方面，城市已基本上为反动势力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是把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极大的改变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是要抗日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参加抗日战争的可能。在这个时期，其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

的矛盾，而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也必须发生变化，于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提出来了，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极为重要的策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解决了，人民大众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事实证明，毛泽东是在分析我国社会主要与次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及时地领导中国共产党实行正确的策略转变，从而把中国革命不断推向前进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随着矛盾的发展而实行策略转变并不是没有障碍的。“左”倾关门主义看不到民族矛盾的上升、阶级矛盾的下降这一事实，否认实行策略转变的必要性，右倾投降主义则只承认民族矛盾而否认阶级矛盾，这些都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

有时我们也看到了个别作领导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不善于抓主要矛盾，做起工作来，总爱眉毛胡子一把抓。凡是这样的作风，工作就做不好，就会陷入被动。所以，在日常工作中，必须把工作排排队，分清轻重缓急，有秩序、有条不紊地进行。这就是要找出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来安排工作，凡属于主要矛盾的工作（问题），就必须放在首要地位，集中力量，立即办理。

我们说要善于从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抓住主要矛盾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决不是说可以忽视或撇开非主要矛盾，因为事物的各种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虽然是主要矛盾对非主要矛盾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但是非主要矛盾对主要矛盾也会发生影响。所以，为了解决好主要矛盾，还要适当地注

意解决有关的非主要矛盾。

毛泽东认为，抓住主要矛盾，决不可忽视次要矛盾的作用。他在1939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进一步阐明了解决次要矛盾对于解决主要矛盾的重要性。他指出：“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①

在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时期更是这样。民主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革命胜利后各项工作的关系给予了科学的规定。他指出，从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面向生产建设。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要抓好城市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府机关工作，工会工作，其他各种民主团体的工作，肃反工作。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要医治长期战争的创伤，在清理旧世界的废墟上建设一个新世界，真谓百废待兴，面临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在极其复杂的矛盾面前，毛泽东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强调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矛盾很多，困难很大。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在主张优先发展重工业等生产资料的同时，经济建设按比例发展，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决不可以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就更谈不上发展重工业。在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主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6页。

张要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很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强调国家利益时，主张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统筹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如此等等。

为什么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一定要解决好其它次要的矛盾问题呢？这是因为：

首先，次要矛盾可以制约主要矛盾的解决，影响事物的发展。任何事物都不是单一矛盾的独立物，而是许多矛盾的统一体。每一种矛盾在事物的发展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作用，产生影响。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次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要促成事物的发展，就必须解决主要矛盾。但是，事物是一个由诸矛盾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有机整体，就象人的手不能离开人的身体一样，主要矛盾也不能脱离事物的整体，不能脱离与其他矛盾的联系，主要矛盾如果离开了与事物整体中其他矛盾的联系，就不成其为主要矛盾了。因此，正确而适时地处理次要矛盾，可以为主要矛盾的解决创造有利条件；如果处理得不好，主要矛盾也是解决不好的。

其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改变事物的性质。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原来的主要矛盾可以转化为次要矛盾，原来的次要矛盾可以转化为主要矛盾。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主要矛盾一改变，事物的性质也就改变了。次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在强调抓主要矛盾的同时，必须注意解决好其他矛盾。这就是说，必须在抓中心工作的同时，也要开展好其他工作。否则，抓主要矛盾只是一句空话。例如，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必须集中主要力量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其他工作，如教育、科学、文化、艺术以及社会治安、道德风尚、劳动态度、党风、民风、领导作风、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等等问题，解决得好或不好，反过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在搞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两者缺一不可。

二、主要的矛盾方面

毛泽东详细地阐明了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为什么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差别呢？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况，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因此，要正确认识事物的性质，就必须研究矛盾双方中哪一个方面居于主要地位。

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一方，矛盾着的双方，哪一方面占优势，对于指导实际工作有巨大意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几十年战争。战争到最后是胜利了，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胜有负的。胜负的原因与战争的指导者之间能否正确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从而正确决定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有着重大的关系。

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总的来说，军事优势在敌人方面，革命力量处于劣势。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却要搞战略进攻，要拒敌于国门之外，进行全线出击；战术上要搞正规阵地战，结果都失败了。这是不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一方面，从而错误地制定战略战术的后果。

毛泽东还以大量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2页。

的。这种转化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当这种力量的增减尚未改变双方主次地位的时候，事物处于量变阶段；当着力量的增减引起双方主次地位变化的时候，事物的根本性质就发生了根本变化。毛泽东通过对矛盾两方面转化的分析，揭示了“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①

毛泽东把矛盾主要方面的理论出色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指导中，使其成为重要的方法论。

人们知道，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所以，我们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样就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那就会混淆事物的性质，迷失前进的方向，就会犯错误。但决不是说，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不发生作用，更不是说可以忽视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关于这一点，虽然《矛盾论》没有进行论述，但是，毛泽东在其他著作中以及实际运用中却注意了这个问题。例如，在进行党内斗争时，他就告诉过我们：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它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可能出现“左”；反对“左”倾的时候，可能出现右。因此，反右时要防“左”，反“左”时要防右。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在强调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时，不能忽视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在《论十大关系》中，他精辟地分析了重点和非重点的辩证关系，批评了那种把重点和非重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主张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要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理论贯彻到底，还深刻地说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3页。

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第四节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联结的原理中，知道矛盾就是既对立又同一；矛盾就是运动，不应把矛盾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运动的、相互转化的东西。为什么矛盾既运动，又能相互转化呢？这就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矛盾内部诸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斗争，即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所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表明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的哲学范畴。毛泽东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原理的研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一、矛盾同一性范畴的规定

同一性是用于表述认识对象所具有的统一性或一致性关系的哲学范畴。对于同一性，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

形而上学所理解的同一性，不是矛盾的同一性，而是事物与其自身绝对等同的关系。 $A=A$ ，是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基本原则。所谓“与自身绝对等同”或“ $A=A$ ”，就是说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它就是它自己，并且恒定只能是它自己。所以，在形而上学看来，生命与死亡就是互不相干而各自只与其自身绝对等同的现象；生命作为死亡的否定因素决不会包含在死亡自身当中，而死亡作为生命的否定因素亦不会包含在生命自身当中。这样，在对同一性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中，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及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因素都被一笔勾销了，事物运动的源泉和动力被移到了事物的外部，事物自身则成了没有运动能力的“死物”。

从思维方法来看，形而上学对同一性如此理解，是由于他们停留在思维中的抽象阶段而没有进一步上升到具体阶段的缘故。所以，形而上学所理解的这种同一性又被称之为抽象的同一性。

辩证法所理解的同一性是矛盾的同一性。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过程中，吸取了黑格尔对同一性的辩证观点，将同一性理解为对立面之间内在的、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理解为对立面之间相互吸引的一种趋势。他们认为，事物是在普遍联系中存在的；只有在与对立面的联系当中，事物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性。马克思在谈到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时强调指出，这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互不可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两者的每一方为自己实现的同时也就创造对方，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同一性具有相互依存、互不可缺、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等内容。例如，无论生命或死亡，这两种现象都只能从其对立面中获得自己的规定性，失去其对立面就会同时失去自己。一切事物存在地完整根据，只在于它是包含着自己对立面在内的矛盾统一体。一切事物只有将其对立面作为自己地存在的环节而包含在自身当中时，才可能有其存在。这样，包含着差异和对立，就成为矛盾的同一性与形而上学的抽象同一性相区别的根本点。这种包含了差异和对立在其中的矛盾同一性，提供了对于事物自己运动的内部源泉和动力的理解，使辩证法将事物看作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永恒发展的东西。

从思维方法来看，辩证法对同一性的理解已经由思维中的抽象阶段上升到了具体阶段。所以，辩证法所理解的这种同一性又被称之为具体的同一性。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96页。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矛盾同一性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在《矛盾论》中第一次将矛盾同一性的含义作了明确的规定。他说：“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①展开来说就是：

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我们知道，事物的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相互对立的，不这样就谈不上矛盾。就其性质来说，本来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的。但是为什么又说它是同一或统一的呢？这是因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如果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另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矛盾着的双方面构成的，不可能设想有单方构成的事物。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能孤立的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7页。

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① 这个同一性告诉我们：矛盾着的双方各自都是以与其相对立的一方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失去了对方，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可见，对立双方各自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不但是在自身当中，而且还在自己的对立面当中，在自己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的关系当中。对立面之间相互规定的关系是联结和吸引对立面的“纽带”，使本来“相反”的东西成为“相成”的东西。因此，任何事物的对立面尽管是与其自身相排斥的方面，但却是事物自身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因而是“与自身同一”的东西。

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向转化。

从第一点中，知道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但是，事情不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是，还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矛盾着的对立面不仅依据一定的条件而互相依存，而且依据一定的条件互相转化。这是矛盾同一性更为重要的方面。矛盾双方如果只是互相依存，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不变化，事物也就不会发展了。相互依存，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只是暂时的，更重要的是这个矛盾着的两方面的相互转化。也就是说，矛盾着的双方面因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例如，原来处于统一体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转化为被统治者，双方各自转化到对方原来的地位。又比如革命和建设中的顺利和困难是同一性，有时候顺利占上风，困难居下风，有时候困难占上风，顺利居下风；顺利与困难的地位是相互转化的。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8页。

这种对立面的相互转化，就叫做同一性。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清楚。为什么对立双方有着同一性就能相互转化呢？理由有两点：

其一，对立双方有同一性，是说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贯通、互相渗透，具备一种彼此可以互相转化到对方去的性质。矛盾双方不是绝对和它自身相等，永远凝固不变的；同一个时间内是它自身，又不是它自身；肯定里面有着否定的因素。不能象形而上学那样把矛盾双方看成是死板的、固定不变的，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辩证法认为形而上学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有互相渗透的同一性，无产阶级本是被统治者，经过革命斗争就可以转化，成为政治统治者和社会财富的统治者；资产阶级本是统治者，有产者，经过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它就转化为被统治者和被剥夺者。又如生与死是同一性，生里有死，死里有生；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生。福与祸就是同一性，祸中有福，福中有祸；福不是绝对的，祸也不是绝对的。失败与胜利也是同一性，所以我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先进与落后的关系也是同一性，先进里面有落后，落后里面有先进；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转化，互移位置，先进成为落后，落后变为先进。

这种能够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的同一性，是指一定条件下的、现实的统一性，而不是抽象的同一性。两个互不相干的东西，就没有统一性，即不能构成统一体（相反相成），也不能互相转化。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现实生活就是这样；而战争与石头就没有同一性，现实生活里不存在这种情况。

其二，对立双方既然可以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一性质，那么，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双方的互相转化就成现实的了。也就是说，对立面的转化（同一性）只有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下，才能实现；缺少这一个一定的、必要的条件，矛盾就不能转化。这个问题很重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很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任何事物的对立双方的互相转化，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条件成熟了，转化就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因此，我们既要认识事物对立双方的转化的必然规律，又必须认识它的转化条件；认识了转化的条件，才可能在客观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向对革命和建设有利的方面转化。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是客观的物质的，它也具备着出现的必然性；但是人们在转化的客观规律面前，不能消极地等待条件的自发到来，当我们认识了这些转化的客观条件之后，就应当积极争取、创造这些条件的成熟，以促进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这里就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我们都懂得精神可以变物质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当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思想、精神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可以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例如，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而这些条件一般地说，不会自发的到来或自发的成熟的，它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力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学说教育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提高革命觉悟，以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精神激励士气，争取革命条件的早日成熟，促进革命的转化。抹煞转化的条件性是错误的。比如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就必须经过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

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国，这也正是使我国向由弱变强，由穷变富的对立面转化。这个转化是必然的，但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如需要有党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4页。

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国家的稳定，国民经济按比例的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吸收外资，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以及有利的国际环境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人的条件。因为现代化建设的一切实践，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而人的条件中思想条件更占主要地位。因此，就必须提高人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政治素质。如果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比较好，又掌握了一定科技知识，就能全心全意地为国家、为现代化建设忘我的劳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有效地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和经济力量的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在我国强调要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是具有非常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它一方面从思想上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又可以从政治上、思想上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污染。

毛泽东将同一性的内容明确规定为上述两个方面，就使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同一性的原理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了。毛泽东强调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是矛盾同一性的更重要的方面，不仅在理论上突出了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的差异性和变化性特点，而且在实践中对于人们正确认识革命和建设的形势以及革命和建设的前途，树立坚定的信念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矛盾斗争性范畴的规定

矛盾的斗争性是用于表述认识对象所具有的排他性关系的哲学范畴，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性质和趋势。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哲学概念，不能把它混同于政治上的“斗争”概念。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斗争”，不能只限于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对于斗争性，同样存在着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两种基本的不同看法。

形而上学所理解的斗争性并不是矛盾的斗争性。由于形而上学将同一性理解为事物与其自身绝对等同的关系，因而作为逻辑上的补充和要求，它不能不将斗争性理解为事物之间绝对相斥的关系。因为，事物与其自身的绝对等同就意味着，任何事物本身都是能够自我满足其存在和发展的，是能够在绝对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孤立自存的东西。所以，在它之外的一切事物的存在，或者是与其无关的，因为它们之间没有或不会发生任何联系；或者是制约其存在发展的根据和条件的异物，因为它们之间只能是发生一种非此及彼、有此无彼的绝对相斥的关系。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科来蒂就认为，对立的“每一方都为自己而存在”，“每一方都无需涉及另一方”，因而“这是一种排除的对立，而不是包含的对立”。由于形而上学将同一性限制在事物之内，将斗争性限制在事物之外，认为同一性与斗争性是毫无联系的东西，所以它理解的斗争性并不是矛盾的斗争性，而是抽象的斗争性。

辩证法所理解的斗争性是矛盾的斗争性。所谓矛盾的斗争性，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某种统一体内部的对立面之间，存在着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离异、互相限制、互相分化的趋向、性质或关系。正如辩证法将同一性理解为包含着差异和对立的同一性一样，辩证法也将斗争性理解为存在于同一性之中并在对立面的同一关系中展开的斗争性。斗争性总是与同一性相联结而存在的。因此，在辩证法看来，矛盾的斗争性与矛盾的同一性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毛泽东在继承恩格斯的观点的基础上，用十分通俗的例子说明，辩证法所理解的矛盾斗争性既不是指事物之间毫无共通之处的绝对相斥的关系，也不是指一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都有着互相否定、互相排斥的斗争关系，而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被某种特定的同一性关系统一起来的对立面之间才会产生的互相排斥、互相限制、互相否定的关系。他说，比如象“柴、米、油、盐、酱、醋、

茶”这些东西，只有在厨师煮饭烧菜进行烹调的时候，才能够被统一起来构成矛盾，它们之间才会形成互相排斥、互相否定、互相限制的矛盾的斗争性关系。毛泽东认为，一切有差别的东西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其差别才能展开上升为矛盾的斗争性。

要准确把握毛泽东关于矛盾斗争性的思想，就要注意毛泽东关于矛盾斗争性的各种不同表述方式。毛泽东常用“矛盾着的各方面”、“矛盾性的方面”、“矛盾的东西”等术语来表述对立面之间互相排斥的斗争性质或关系。例如，他在《矛盾论》中就讲到：“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① 这里两个分句中的“矛盾”的含义是不相同的：在前一个分句中，作为主语的“矛盾的东西”，是“对立的東西”的同义语。因为这里的“矛盾”一词，只能用“对立”或“斗争”来替换，而不能用“对立统一”来替换；而在后一个分句中，“矛盾”作为“矛盾的东西”的宾语，指的是“对立面的统一体”。因为此处的“矛盾”一词，只能用“对立面的统一体”来替换，而不能用“对立”或“斗争”来替换。

除此以外，要准确把握毛泽东关于矛盾斗争性的思想，还必须注意哲学上斗争性概念的含义与社会生活中所使用的斗争性概念的含义的区别。“斗争”是从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借用来的一个概念。但是，它作为具有一般意义的哲学范畴。同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斗争”有质的区别。也就是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的“斗争”，不能只限于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毛泽东除了把斗争的形式区分为“对抗”与“非对抗”两大类以外，还论述了各种具体的斗争形式，比如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武装斗争、公开的与秘密的、和平的与非和平的斗争形式以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3页。

及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都是斗争；在自然界中，吸引和排斥，阴电和阳电，化合和分解，生长和死亡，遗传和异变等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也同样包含着斗争。总之，矛盾无所不在，斗争也无所不在。

毛泽东还把矛盾斗争的发展区分为缓和与激化两种状态，这在实际中有重大的意义。矛盾斗争的缓和与激化，同矛盾的非对抗与对抗，是两对不同的范畴。前者是矛盾斗争的状态问题，后者是矛盾斗争的形式以及性质问题。不仅对抗性的矛盾有一个从缓和到激化的过程，而且非对抗性矛盾也有一个从缓和到激化的过程。对抗的斗争形式固然是与激化状态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非对抗性的斗争形式也并非永远与激化状态没有联系。正因为客观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状态，而且这两种状态的出现又是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的，因此，人们就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去缓和或激化矛盾，以达到自己特定的目的。无产阶级为了集中力量去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务，常常需要创造一些条件去缓和与其他方面的某些矛盾，否则，矛盾全面激化、全面紧张就很不利。有些矛盾，在斗争比较缓和的情况下有利于逐步解决，如果人为的使其激化反而会把事情搞乱。有些矛盾，长期拖着，于革命和建设不利，也可以创造一定的条件使之激化，达到解决矛盾的目的。在这里，一是要讲科学性，一是要讲建设性或革命性，离开了这两条，就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世界上的事物无不处于一定的对立统一关系之中，并且在这种关系中获得自己有别于他物的质的规定性，成为某种特殊的事物。因此，一事物向他事物的转化，归根结底是其自身矛盾关系的转化；矛盾才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有条件的矛盾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矛盾斗争性相结合，就构成了一切事物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发展就是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在各种外部条件影响下，

事物内部的对立面既相依赖又相排斥，既有条件的同一又无条件的斗争，使对立双方的力量处在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中。一旦对立双方的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各自的地位便会发生互相转化，于是新的矛盾统一体就会取代旧的矛盾统一体，使旧事物转化为新事物。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推动事物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列宁曾经指出：“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①，但是，要准确把握这一思想，就不能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结合”理解为互不相干的两个东西机械相加。只有紧紧抓住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从它们自身的对立同一关系上来理解它们的“结合”，才能真实把握事物的发展过程。毛泽东继承与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②的思想。认为事物的发展采取两种状态：一种是相对静止状态，一种是显著变动状态。前一种是量变阶段，后一种是质变阶段。它们是矛盾的同一性，即矛盾双方的互相依存与互相转化的两种表现形态。无论是相对静止也好，显著变动也好，都只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特性，因而都是暂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贯串于这两种状态之中，因此斗争性是绝对的。毛泽东说：“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③

毛泽东在论述矛盾斗争的绝对性与同一性的相对性的时候，总的来说，是把相互排斥作为存在于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

①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②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第712页。

③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3页。

转化这两种情形中的共同的、一般的性质来看待的。这是毛泽东论述斗争性与同一性相互关系的基本前提。正因为如此，所以《矛盾论》说：“在统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只承认矛盾斗争的绝对性，而否定矛盾斗争的相对性。当毛泽东把相互排斥这种一般性质与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加以比较的时候，他指出了斗争的绝对性与同一性的相对性；当毛泽东把矛盾的斗争性与矛盾形式联系起来论述的时候，他又指出了斗争的相对性。前面我们讲到，毛泽东不仅把斗争区分为对抗与非对抗两种形式，论述了各种具体的斗争形式，而且还论述了矛盾斗争发展的缓和与激化状态。这些都表现了斗争形式、斗争状态的相对性。因此，不能因为斗争是绝对的，就可以不讲斗争的形式，不掌握斗争的火候。

同样，相对于同一性的诸多具体形式而言，同一性也有它的绝对性。例如，毛泽东就曾论述过统一战线内部各种不同的联合。毫无疑义，这里所说的同一性的绝对性，是相对于它的具体形式而言的。就同一性相对于斗争性而言，则它仍然是相对的。否则就会造成混乱。

毛泽东把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相互关系的理论运用于统一战线，正确地阐明了统一战线的联合与斗争问题。

一般地说，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不同集团、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联合，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所以能组成统一战线，是因为它们之间有某种共同利益。这就会形成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与联合。在这个问题上，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是不对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是不对的。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3页。

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作怪，对国民党制造的“清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不予反击，一再妥协退让，结果造成了以后的失败。

在抗日战争时期，则有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提法。这种提法否认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是非常有害的。这就犯了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

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一是表现为关门主义，一是表现为过火斗争。关门主义看不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所造成的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看不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情况下，各阶级、集团、政治势力有某种联合的可能。有“左”倾思想的人，则看不到争取中间势力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也不善于对顽固势力进行分析、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

毛泽东批评了“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既承认了斗争，又承认了联合（同一），就算解决了一切问题。统一战线是除主要敌人以外的一切力量的联合，这是一个广大的范围。在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联合，也存在着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如果不善于采取各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与策略，则同样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

通过上述所论，我们就可以回答，为什么矛盾的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为什么矛盾的同一性又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

矛盾的斗争性之所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是因为矛盾有着不同一性，即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性，这是矛盾本来的性质。这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性，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构成同一性，就

^①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

其本来性质讲，是又排斥，又对立的；这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就是斗争。例如，阴电与阳电互相排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推行强权政治的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对立等等，都是矛盾斗争。这种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有矛盾就有斗争；它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贯串于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说任何事物运动过程的一开始到终了都贯串着斗争，而且旧过程斗争一结束，新过程的斗争又开始了。所以斗争是无条件的，又是绝对的。因此，《矛盾论》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① 无论是矛盾双方共处于统一体中的时候，还是统一体破裂、分解的时候，都存在着矛盾的斗争，斗争是不会停止的，只有通过斗争，矛盾才可以获得解决。斗争性的无条件性与绝对性和同一性的有条件性、相对性是完全不同的。

矛盾的同一性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暂对的、相对的，是因为没有一定的条件，矛盾的双方就不能相互依赖构成统一体，没有一定的条件，矛盾也不能转化，所以它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同一性又是暂对的，当矛盾的统一体通过斗争发展到了某一限度，出现了新的条件时，就势必引起统一体的破裂、分解，而出现适应新条件的新统一体。一切事物的同一性总在发展变化，由旧变新，所以它是暂时的。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统一体就要破裂和转化，资本主义社会就要为社会主义社会所代替；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2—333页。

性是暂时的。同一性的这种暂时性也就是它的相对性。说同一性又是相对的，也还指着同一是矛盾的同一，对立的同一，排斥的同一；而不是没有矛盾、没有对立、没有排斥的绝时同一；这种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同一，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为同一，所以它只能是相对的。

从以上两方面的情况来看，事物的矛盾是由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构成的，在发展过程中少不了同一性，也少不了斗争性，缺少一面，矛盾就不存在了。所以，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①在 同一性和斗争性两者之间，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中包含着斗争性。这就是说，没有同一性，也不可能有斗争性，对立面如果不联合在一起，就不会有斗争。但是，任何同一性，那怕是静止状态的同一性，也都包含着斗争性。同样的，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是说斗争性是基础，同一性是结果。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构成为同一体，都是经过斗争转化的结果，没有斗争这个基础，便产生不出新的同一体之果。任何矛盾统一体总是经过斗争，某一方面占有支配地位，然后构成统一体。例如，过去中国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就是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中国共产党占领导和支配地位；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结果。如果对资产阶级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就不能保持这种统一战线的关系。又比如说，现在我们争取世界和平具有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必须是经过与推行强权政治的某些大国和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才能取得的，而不是同它们搞妥协或乞求得来的。所以，没有斗争就没有同一性，任何同一性都是斗争的结果。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斗争性是矛盾发展变化的基础，是推动事物由一种质变为另一种质，由旧变新的动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统一、团结等等一些现象，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是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暂时的，这里面虽然也有斗争性，但它毕竟是在维持旧的状态，矛盾尚未解决，也没有引起新的质变；只有当统一物分解，团结、联合、均势、相持、僵局、静止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由旧的质过渡到新的质，矛盾解决了，事物才发展前进了。所以，要使事物发展、前进，就必须承认斗争性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作用。我们要顺利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就要防止“左”的或右的思想的干扰，并且开展适当的斗争，就要和错误的或落后的以及因循守旧的思想进行斗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要搞精神文明建设。

一个人的思想也是对立同一，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在斗争中发展前进。学习新的知识和进步的东西，新和旧的思想发生矛盾，就要破坏旧的统一，经过自我认识，更新了知识，就达到了一个新的统一。革命和建设的形势向前发展了，思想和行动又要赶上去，这就又需要学习新东西，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总之，事物质变的过程，就是原来的矛盾统一体彻底分裂的过程，是矛盾斗争彻底贯彻的过程。对立面的斗争终究要打破对立双方的互相依存，使旧的矛盾统一体瓦解，新的矛盾统一体产生，这是辩证法的革命性质之所在。

关于矛盾双方的斗争，能够推动事物的发展，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问题是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需要弄清楚。长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是一种保守的、消极的因素。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矛盾论》对同一性有许多界说，诸如“互相渗透”、“互相依赖”、“互相贯通”、“互相合作”等等。这些都不是静态的概念，而是动态的概念，都包含有动力的意思。就是说，不仅对立面的斗争是事物发

展的动力，而且对立面的同一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当然这并不是说同一离开斗争是动力，而是与斗争相结合，构成事物发展的现实动力，正如斗争也只有与同一结合才能构成事物发展的现实动力那样。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下面分别地考察它们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动力”之词，本来是从自然科学中移植过来的。排斥是一种“力”，否定是一种“力”，这是斗争性作为“动力”的情况。与此相对应，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互相合作也是一种“力”，只不过是相反的“力”罢了。而相反的“力”是相成的，这就构成了事物的运动。

那么，作为事物发展动力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互相合作等等，各有什么特点，又如何推动事物的发展呢？需要作一些较为具体的探讨。

互相制约。这里的互相制约，是把互相排斥限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例如，民主与专政、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制，既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制约的。民主制约专政而不致使其成为专断、独断；专政制约民主而不使其形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正确地实行两者的互相制约，就可以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互相排斥的双方都得到发展。

互相依赖。互相依赖是对互相独立的否定。例如，根瘤菌与豆科植物，水螅和水母，还有海洋里的不少动物，各自单独存在不利于发展，而在互相依赖中，就共存共荣。

互相合作。互相合作是对互相干扰的否定。例如，同志之间的合作，党与非党的合作，各种革命力量之间的合作，都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促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致使双方在无休止的干扰中互相削弱，互相抵消。

互相渗透。互相渗透是对互相对立的否定，互相对立使矛盾

双方泾渭分明，森严壁垒，而互相渗透则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情况在化学变化、生物运动以至社会领域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人与自然，人的活动给自然界打下自己活动的印记，反过来自然界也给予人类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人类社会的文明，正是人与自然互相渗透的结果。又如各门科学，各个领域研究方法之间的互相渗透的结果，出现了许多新学科，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把矛盾双方的斗争视为事物发展的动力，而把矛盾双方的同一视为事物发展的保守的消极因素，是不能成立的。只有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须把同一性和斗争性联系起来，根据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具体地分析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作用，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相结合，构成事物发展的现实动力，但并不意味着承认一切斗争以及一切斗争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推动事物的前进运动。例如，反动阶级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而向先进阶级所作的种种斗争，反革命力量所进行的种种目的旨在摧毁人类进步文明的战争，腐朽的思想、观念对于进步的思想、观念所作的种种反抗，等等，不仅不是推动事物前进的动力，反而是阻碍事物发展前进的力量。又例如以“全面专政”的形式去进行各个文化领域的斗争，以对抗的形式去解决党内矛盾和领导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就不仅不能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反而会把社会推向停滞、倒退。这说明，腐朽方面对新生方面的斗争，和采取不适合实际的斗争形式，都不能把事物推向前进。刘少奇曾指出，党内无原则斗争是十分有害的。站在个人利益或派别利益的立场上进行党内斗争，不是为了

把事情弄好，而只是为了把党的事业弄坏，凭感情和喜怒而提出问题和进行斗争，不择手段，不依照正当的组织手段来进行党内斗争，党内这一切的无原则的斗争，都是不好的，对党有害无益。

同样，唯物辩证法认为斗争性与同一性相结合，构成事物发展的现实动力，也并不意味着任何同一性以及任何一种同一性的具体形式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推动事物的前进发展。例如四分五裂的反动派空喊所谓“全面和平”、反动势力在革命时期叫嚣要维护“秩序”等等，都不可能成为推动事物前进的动力，相反却是维护旧的统一体，维护旧事物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腐朽方面所要求的同一性，一切已不适合客观情况的具体的同一性形式，都不能推动事物向前发展。

总之，在坚持斗争性与同一性相结合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的情况下，要对在特定条件下的斗争性、同一性及其具体形式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不可能做一个好的革命者和改革的促进派。

四、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马克思恩格斯还对资本主义社会其它的对抗性矛盾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作了大量的论述。

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而矛盾仍将存在。在这里，列宁明确地把矛盾与对抗做了区别。

毛泽东把列宁这一思想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一方面强调了“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①另一方面又针对“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严重错误，极为注重区分不同的斗争形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4页。

式和不同性质的矛盾，指出应该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斗争形式去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虽然尚未提出“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但实质上是把对抗与非对抗运用于社会领域加以具体论述的。毛泽东区分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革命根据地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的不同情况，论述党内矛盾与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区别，以及对抗与非对抗的联系与转化。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在于：把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性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一般地说，马克思和列宁主要是从社会历史领域论述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的。毛泽东则试图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加以说明，即不仅从社会历史领域，而且从人类思维、自然界来论述这一问题，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加以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毛泽东是从斗争的普遍性、绝对性与斗争形式的特殊性、相对性进一步论述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毛泽东说：“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①他把斗争的形式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抗的形式，一种是非对抗的形式。所谓“对抗的形式”，即是“外部冲突”的形式，而非对抗形式则不是这样。那么，什么是对抗性矛盾？所谓对抗性矛盾，就是一切到了最后都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解决矛盾；而非对抗性矛盾解决则不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

毛泽东还指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说：“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看非对抗性矛盾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情况，就人民内部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来说，本来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如果犯错误的同志继续发展自己的错误，或者如果采取“过火”的斗争，则有可能从非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在后一种情况下，矛盾双方的“斗争”对矛盾性质的转化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说，斗争要“适度”，不要使矛盾激化，不要搞“过火”的斗争。其次，我们来看看对抗性矛盾发展为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政策，而资产阶级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就可以逐步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这里，采取正确的斗争形式同样起了重要作用。总之，斗争要适度，过与不及都不行；要采取正确的斗争形式；要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去灵活地运用斗争艺术。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5页。

第五章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史上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基础上形式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军事家，对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形成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期间，遵义会议以后，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至1938年以前，由于毛泽东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战争，尤其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实践，把战争的所有问题提到了哲学高度，使军事理论和哲学理论统一起来了，从毛泽东发表的一些重要的军事著作来看，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理论体系。

1938年以后到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的革命战争又经历了三个时期（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新的大规模战争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第一节 毛泽东的战争观

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战争与政治、战争与革命、战争与经济以及在战争中人和物的相互关系，作了明确的论述。

一、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①以及战争是某一阶级以暴力手段施行其政治制度的继续的思想，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作了科学的概括与论述。

首先，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政治。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的经验，运用一般与特殊的辩证法，继承和发挥了列宁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观点。他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②这就说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关系。毛泽东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③，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但他又说：“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④他完全同意列宁的“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毛泽东依据战争与政治的这种辩证关系，批判了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的两种错误观点：其一是把战争与政治等同起来。其二是把战争与政治割裂开来。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都是错误的。他指出，战争一刻也不能脱离政治，就是说，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所以，就要反对战争绝对主义者。但是，所谓战争一刻也不能脱离政治，是指一定阶级的政治总是渗透、贯穿、表现在战争中，并不是说战争和政治是一回事。从辩证的观点来讲，战争与政治有其一致的方面，同时又存在着差别。战争不是一般的政治，它是政治的一部分，一个

①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第673页。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

③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④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9页。

侧面，一种特殊表现。所以，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就是表现了个别与一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

毛泽东一贯坚持对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辩证的分析，始终坚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即既反对脱离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又反对脱离军事谈政治的“空头政治”。毛泽东特别区分了战争的目的与战争的政治目的这两件事，他说，战争的直接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战争的政治目的，或是为民族压迫或民族解放，或是为阶级压迫或阶级解放。战争实行者总是通过战争的直接目的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的，两者相比，战争本身就成为手段了。

毛泽东在阐述政治决定战争、战争从属于政治的同时，还指明了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越能改进。但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①“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②毛泽东对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论述，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战争指明了方向。

其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政治建军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建军原则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军队的唯一宗旨；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等等。几十年来，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6页。

②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57页。

很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但基本路线没变。

强调政治建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否定军事工作的特殊性。从辩证的观点讲，一切真理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在军队建设中，强调人的因素的作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完全抛弃了军事的特殊性，把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这一论断中的“特殊手段”四个字抽掉，用政治代替军事，用政治冲击军事，那就错了。军事与政治正如战争与政治一样，是同一事物的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两者既不能等同，又不能割裂。历史反复证明，以军代政或以政代军，都是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都给实际工作造成极大的危害。毛泽东坚持军政统一，坚持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正是坚持战争与政治之间、特殊与一般之间的基本原则，是辩证法的具体运用。

二、战争与革命的关系

战争与革命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的一个侧面。马克思就曾说过，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必然会引起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国鸦片战争后连绵不断的起义，英国的大炮是一支主要的催化剂。不过，马克思那时还没有把战争引起革命作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一条规律明确提出来。

列宁在深刻研究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历史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明确论断，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与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之间的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列宁说：“战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①“没有革命的发展，战争是结束不了的。”^②

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

① 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90页。

② 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92页。

“战争引起革命和革命制止战争”的科学论断。

(一) 首先，提出了战争引起革命。

战争引起革命是指战争对于革命所起的巨大加速作用。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挥了战争与革命相互联系的思想。他认为战争既可以导演出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更可以导演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民主革命。他在分析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时说，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成了中国革命的导演。在1937年9月，毛泽东就预见过，国共第二次重新合作的局面将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后来，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又讲到帝国主义侵略同被侵略国家内部革命条件的成熟有密切联系。就中国来讲，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准备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这就是提供了工厂、铁路、枪炮、子弹，又播种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最后，唤起他们的觉悟并促使他们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

毛泽东不仅肯定了战争与革命之间的相互转化，肯定了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而且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的原理，分析了在不同国度，在有战争和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实行暴力革命原则的具体途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要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议会讲坛，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一旦爆发革命，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但在另一类国家，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的情况下，则是从革命一开始，就要进入武装斗争，包括国内战争，也包括对外民族战争，是走先占领乡村，后取城市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被林彪一伙肢解和篡改，片面地把井冈山道路夸大为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无条件地适用于世界各国。为此，毛泽东在1970年回答日本朋友安斋库治

关于这个问题时，重申了他在1938年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革命观点仍然有效。这就阐明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特点，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可以走不同的道路。

（二）其次，论证了革命制止战争。

革命制止战争指的是革命对战争的反作用。它是与战争引起革命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互为因果的。这个思想是由列宁最早提出来的。他从事物的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一方面他认为战争必然引起革命；另一方面革命也并不是消极地承受战争的作用而对战争无所作为，而是给战争以巨大的反作用。

但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首先在少数国家里取得胜利。那末，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后，对战争（包括世界大战）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列宁并没有作出具体结论。而毛泽东则依据列宁逝世后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新情况，明确地提出了革命制止战争的科学结论。

革命制止战争，从实现的情况来看，主要是指革命能够推迟战争的爆发。不过，如果在世界性的战争到来以前，各国革命普遍发动，革命力量大大超过战争力量，制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极小。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著作中，曾分析过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带有永久和平的性质。这是指接近永久和平，并不断言永久和平立即实现。至于这个“接近”是指几十年还是指几个世纪，这要依据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1945年，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力量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①1960年毛泽东又说，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

^① 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这里说的“持久”同前面所讲的永久，都是指的一个意思。这就是革命的发生可以打破敌人的时间表，推迟战争的到来。这样，革命制止战争与战争迟早会爆发这两个结论就不是矛盾的了。可见，既要承认革命对战争的反作用，又不能把革命制止战争作绝对的、机械、形而上学的理解，而要作辩证的科学分析。

共产党不是战争万能者，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共产党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①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长期的革命战争，打败了国内外敌人，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铲除了发动战争的根源，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毛泽东说：“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②

三、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战争依赖于经济，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一切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最后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就决定着什么样的战争。战争的性质、战争的政治目的、战争的规模、战争的形式，都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恩格斯就曾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4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

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①的。毛泽东也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②这就是说，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资本，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努力的竞赛。战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运动现象，其形式、规律、强度、军队的武器装备、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编制和组织以及战争指挥规律思想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条件、物质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总是强调物质经济条件的作用。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之所以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原因时，除指出了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是得道多助还是失道寡助等政治方面的原因外，特别强调了军力、财力等物质经济方面的原因。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相反，中国则是一个弱国，在军力、财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因而决定着中国的抗战不能速胜，只能进行持久战。但是，日本却又先天不足，它国度小，人力、军力、财力等物质经济条件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而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消耗，经济物质的潜在能力，加上政治的主观方面的因素，必然促使敌我强弱的转化。因此，亡国论是错误的，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把进行革命战争与发展生产辩证地统一起来，既指出战争依赖于经济，又强调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创造战胜敌人的物质条件。他要我军一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② 毛泽东：《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5页。

方面进行革命战争，在军事上狠狠打击敌人；另一方面利用作战间隙开展生产运动，创造战争所必需的物资。这样，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又能支持革命战争，用以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达到消灭一切敌人，解放全中国的目的。

毛泽东在强调战争依赖于经济的同时，还指出战争又是为经济服务的。无论是革命的战争，还是反革命的战争，都是为着本阶级一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所采取的暴力手段。他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但如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这种阻碍时，就使用战争方法去冲破这种阻碍，以便继续其掠夺政策。所以，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的目的。”^①

总之，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战争依赖于经济，从事革命战争不能脱离经济；同时，战争又为经济服务，经济是战争的最终起因。战争实践证明，过去的战争依赖于经济，未来现代化的战争更要依赖于经济。任何割裂战争与经济的关系，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否认战争依赖于经济的唯心论，又要反对无视政治因素、把经济因素唯一化，或否认战争对经济的反作用的战争机械化。

四、战争中人和物的关系

战争无论规模大小，持续的时间长短，也无论发生于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人和物总是构成战斗力的基本要素。所以，在战争中的人和物的关系上，毛泽东既注意了物力、经济力、武器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又批判了战争中的机械论；既充分注意人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又批判了精神万能的唯心主义观点。

首先，阐述了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11页。

战争中的人，从狭义上讲，指的是军队；从广义上讲，他包括除军队以外的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战争运动中去的一切人。

战争中的物，是指在战争行为中人们用以杀伤对方及摧毁其军事设施，或者反过来用以保护自己方面的人体或财物不受对方侵害的那样一种物。

战争中的人和物是缺一不可的。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战争中人的作用，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但是，对武器和技术条件的作用也极为关心。他说：“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①在《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还说：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②然而，在战争中，无论物的作用如何重要，毛泽东始终一贯的观点是：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物。

展开来说，就是：

第一，在构成战斗力的两个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是人，而物则处于被动的地位。因为武器由人制造，要人去使用。离开人，武器自身不会发生变化，离开人，就是毁灭性的武器也等于零。因为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

第二，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的向背。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虽有优势装备也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虽装备处于劣势，但必将取得胜利。

第三，从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武装的劣势是能改变的。所谓改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造，二是夺取。在近代技术水平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页。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的条件下，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就有一个东西降它。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在战争中经常发生。

第四，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战争作为一种政治行动是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上层建筑同人的生产活动并不是一回事，不能混淆。战争的本质是由直接维护哪种政治制度和哪个阶级利益这一点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技术水平所决定的。虽然战争双方都是以自己的物质手段与另一方的物质手段相对抗，都以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为前提；虽然物质基础、技术条件对战争的面貌，乃至战争的胜负影响很大，但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从根本上说，战争是属于政治范畴，而不是属于技术范畴。

总之，承认人的因素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就是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承认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承认人民群众这一伟大的物质力量。它同精神决定一切，由个别人物的主观意志决定一切的唯心史观根本对立。毛泽东所说的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这个人决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指一定阶级的、一定经济地位的人，是物质的人，而不是脱离了物质的精神幽灵。这一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既反对了唯心论，又反对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二）其次，指出了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在战争中，唯武器论者只承认、并且夸大武器的作用，抹煞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决定战争的性质，否认战争中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武器的优劣来决定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而毛泽东则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的优劣，而是人心的向背。他说，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其原因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所以，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战争的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真理，决定战争的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唯武器论的错误在哪里呢？这是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认为，不但要看武器，而且要看人力。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然而毛泽东在强调人的作用时，并没有忽视武器的重要性，是在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前提下反对形而上学一点论。而唯武器论的错误恰恰在于将人与武器对立起来，片面地强调武器而排斥人，这正是形而上学一点论。在这里，毛泽东反对了两种片面性：一是重物不重人的唯武器论，二是只重人不重物的精神万能论。

唯武器论之所以被称为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原因有三：其一，唯武器论者在考虑战争时，把战争这个由许多复杂原因构成的有机的统一体中，只抽出其中的一个因素，即武器做为战争的出发点。其二，唯武器论的观点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直接对立。其三，唯武器论者根本抹煞了战争规律的特点及其发展。因此，要正确理解战争中人与物的关系，就必须对见物不见人的唯武器论的观点进行批判。

第二节 毛泽东论战争中认识的辩证过程

战争是人类互相残杀的一种怪物，有它自己的特性。因此，要进行战争，驾驭战争，就必须首先认识它的规律。战争规律是战争这一事物之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即战争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因素的内在联系，它遍及于战争的全体，并贯穿于战争的始终，决定着战争的发展趋势。

毛泽东依据事物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着重阐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之间的相互联结，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是发展的

毛泽东把关于事物的共性与个性的相互关系的原理应用于观察战争，同时规定了研究战争问题的根本方法。他认为，战争是迅速流动的，随着战争的发展，规律也在向前发展，一成不变的规律是没有的。他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① 所以，毛泽东强调：“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② 为此，战争研究者，必须从一般战争深入到如何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再到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

（一）首先，阐明了一般战争的规律。

一般战争的规律，就是古今中外一切战争所固有的最普遍起作用的规律。例如，所有战争的基本原则，都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所有战争都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集团现行政治的继续；所有战争都采取进攻与防守两种基本作战形式。相应的战争指导规律也是如此。如所有战争指导者都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所有战争都通行“兵不厌诈”、“兵无二令”、“兵贵神速”等准则，等等。当然这些规律和指导规律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寓于特殊战争规律之中。

（二）其次，论证了革命战争的规律。

革命战争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它是推动历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73页。

史前进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战争。要使革命战争取得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这就决定了在革命战争中所实行的“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和以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作战方式为特色并能最好地组织和动员群众，便于打击和消灭敌人作为准则的各项战略战术，一般都是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后发制人；而反革命战争则是凭借其军事优势，往往以进攻和速战速决的方式先发制人。凡革命战争总是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而反革命战争常常夸大武器和实力的作用。

（三）再次，阐发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就是区别于一般革命战争（例如俄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战争，比较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

旧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由许多帝国主义者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国革命战争的道路只能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从战略方针来看，是采取积极防御，既不是有退无进的消极防御，又不是有进无退的盲目的冒险进攻。从战争的形式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表现为包围与反包围的不断反复。这些都是中国革命战争所特有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一切皆流，一切皆变。

毛泽东正是依据于关于事物的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原理，批驳了凝固的、僵死的各种形式的机械论。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关于一般与特殊的辩证联结的道理模范地应用于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

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一些机械论者照搬苏联内战时期的经验或重复北伐战争时期打大城市的经验，结果屡遭挫败。毛泽东从方法论高度对这个历史教训作了总结。他认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移用苏联内战的经验，或重复过去北伐战争时

期的经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时间上讲，俄国的内战发生于1918年到1920年，这是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和世界革命的高潮时期，北伐战争是发生在国内军阀混战，同时全国革命也是处于高涨时期。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处境与两种情况都不同。当时的国际和国内情况就是例证。因此，呆板地移用革命高涨时期的外国以及中国的经验，必然是“削足适履”。

从地域上看，也发生了变化。俄国与中国虽然都是大国，但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却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俄国地广人稀，有两百多个民族，中国虽有五十多个民族，但人口稠密。俄国内战是在各民族聚居区域进行的，中国的内战却主要在汉族地区进行的。

从性质上讲，俄国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都是革命战争，但是所处的革命势力同反革命势力的地位也不相同，俄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平定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虽然是以弱对强，但革命力量在列宁“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发展迅速。中国却处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下。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发展不可能是很快的。相反，如果离开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则随时有可能被敌人所消灭。红军所处的这种情况，同北伐战争时期也不同。那时是革命高潮，这时则是革命潮流的普遍低落。

综上所述，在这样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所进行的革命战争，不能不带有它自己的特殊性。

毛泽东依据战争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和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战争有四个特点：第一，中国是由一个多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政

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又是经历了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的国家。由于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

第二，是敌人的强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政权，又有世界反动派的援助，加上装备优越，物资雄厚，军队数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常备军数量与幼小红军形式了天壤之别。

第三，是红军的弱小。红军是从一些游击队活动开始的。红色根据地分散而孤立。全国较大的根据地，在五次反“围剿”之前最多时只有十五块，而中央红军在三次反“围剿”时期只有三四万人。

第四，是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革命战争能得到正确的指导。而由于土地革命，使红军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援助。

毛泽东作出了这个概括之后，就指出：一、四两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二、三两个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很快的发展和不可能很快的取胜。“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①

战争规律和战争特点密切相联，它是由这些特点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产生的战争规律。而所谓战争的特殊规律，就是这些战争因素之间由于特殊条件而形成的特殊联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就形成了这样的特殊联结。在这种特殊的联结中，中国革命战争的持久性发生了。即在战略方针上不是采取进攻的速决战，而是必须采取持久的防御战。内战的基本形式是“围剿”与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1页。

“反围剿”的长期反复。作战的方法主要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的阵地战。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走先农村后城市的道路，而不是相反。

战争指导规律也必须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战争指挥员，不仅要把握战争的特点，还必须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指挥部队的不同、作战地域的改变和敌我双方军事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部队的指挥方式。一成不变的指挥是没有的。

从当今情况来看，研究战争仍需要着眼于特点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努力研究和掌握现代战争的规律，把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同现代战争的特点结合起来。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 也是变化发展的

中国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进行的。它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的革命战争，也区别于纯封建制度国家里进行的革命战争。于是，随着这个特殊环境和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它的规律和指导规律也不断地发生变化。

(一) 首先，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是变化发展的。

从辩证法的观点看，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上，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中国革命战争，经历了五个时期和两种类型。在不同的战争时期中，无论战争发展的趋势，战争所经历的过程，战争方针的规定以及所采取的作战形式，等等，都表现了它自身所固有的差别。

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四个时期战争来说，它发生的条件和发展的趋势都不一样。不论哪个时期，都处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都是既有困难条件，又有顺利条件。而每一个时期的困难和顺利的程度则又都不相同，敌我双方的强弱状况也不相同。于是

便决定了战争发展的趋势也不尽相同。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趋势是可能战胜敌人，又不能很快战胜敌人，如指挥失当，还可能失败。为避免失败的可能性，毛泽东强调，除了有各项客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首要条件，这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

抗日战争时期，敌强我弱的总形势虽无变化，但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由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战争。在这种变化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暴露得更加明显，它的力量受到了较大的削弱。而中国方面的弱点却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弥补。这是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同的地方。所以，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整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更加有利于革命力量，所以，战争发展的趋势是“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毛泽东对于这几个不同的战争时期的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分析及其结论的不同，概括出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变化。

(二) 其次，论证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是变化发展的。

战争的指导规律随着战争规律的不同而变化和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 22 年的革命战争来看，前 20 年基本上是战略防御，最后两年则转化为战略进攻。就是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方针也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发生过几次变化。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初期的游击战发展到后来以打正规战为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为了广泛地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又把正规军分散开，执行游击任务，于是正规战又变成了游击战。以后又根据具体情况依次发展为运动战和阵地战。由此可见，一成不变的战略方针是没有的。

随着战略方针的不同，战争的形式也是发展变化的。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争的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的

长期反复。不过这种形式上的反复在内容上并不简单的重复，而是随着战争和战斗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内容的。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战争形式变成敌我之间的几层包围与反包围。这是在一个幅员较大的国家，在异民族入侵时，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而产生的攻防运动的具体形式。而这种形式是由敌我力量间的犬牙交错所决定的。当然，这种战争形式的产生，还与抗日战争的若干条件有关。例如，同中国的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这两点关系是很密切的。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所以能够由几支大的野战兵团，实行迅速的分散与集中、大踏步的前进与后退的运动形式，在短时期内使敌我力量的差距大大缩小，并且很快由战略防御发展为战略进攻，也是和当时的敌我力量发生的具体变化分不开的。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一种更加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战争只能实行运动战和阵地防御相结合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战争前期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部分阵地防御。在第五次战役后，按照“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主要是用阵地战的方针进行全线阵地防御，同时辅以“零敲牛皮糖”的打法，在持久作战中积极消灭敌人。

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战争的历史进程，战略方针，作战形式，等等，都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都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活生生的，有条件和可变的。

第三节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创造了一整套以我之长攻敌之短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丰富多采，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中极为重

要、极为精彩的部分。

一、进攻与防御

进攻和防御,是在任何战争中交替使用的两种基本战斗形式,是实现战争目的两种基本手段。进攻是战争双方中,一方对另一方采取主动出击的形式,即为着消灭敌人和攻占重要地域(地区、目标)而实施的战斗行动的一种类型。而防御则相反,是战斗双方中,一方对另一方采取的据守的姿态,即为了抗击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掩护一定的方向,以待机破敌或保证在主要方向上的对敌优势。

其他作战形式,无非是适应不同情况而产生的攻防形式的派生物,都是以攻防为其内容的。战争所要解决的矛盾就是攻防矛盾。毛泽东说:“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①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在进攻与防御的问题上,着重论述和详尽地发挥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果断地抛弃了形而上学者所主张的哪里不能防御,哪里有防御,哪里就不能进攻的古老公式,而代之以防御中的进攻和进攻中的防御的新公式。使进攻与防御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他尤其针对中国教条主义者们机械搬运马克思关于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停止进攻的话,对他们本本主义思想方法的本质作了极其深刻地剖析。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的话,实质上是指趁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不要给反动者得到喘息和恢复政权的机会,不要满足于已有的胜利和放松对敌人的进攻。因为这是巴黎公社丧失政权的教训之一。而决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处于军事对抗中,敌人处于优势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的手段。如果是这样,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6页。

那就是第一号的傻瓜。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来说，军队从无到有，政权从小到大，总是以进攻取胜，不应保守，这是正确的。但在中国革命战争之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防御方针，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持这一方针并不是排除以进攻取胜，而正是以进攻取胜的具体贯彻。它不仅在战役战斗中，包含了进攻，而且是尔后总的进攻的前奏。采取这种战法，第一是有理。弱小的一方在强敌进攻面前，首先退让一步，使全国以至世界人民都看到他们打仗是有理的，是敌方首先发动进攻而不是相反。这样，就能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正义战争，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第二是有利。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并使自己主力相应集中，便于发现敌人之弱点，选择有利时机与战场，迫使敌人就范。同时，也可以扬己之长，避己之短。第三，是能有效地把敌人抛入被动局面。敌人初战而胜，洋洋自得，不可一世，继则兵力分散，背上包袱，由主动变为被动。待其弱点暴露后，士气低落，疲劳沮丧，处处挨打。正是鉴于这几个方面的理由，毛泽东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兵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①

从战争的发展过程来看，进攻与防御，前进和后退，两者相互联结，是不可截然分开的。两者互为存在的前提，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例如，白军对红军“围剿”是进攻，红军对白军的“围剿”是防御；而红军打破白军的“围剿”又是进攻，白军对红军的“围剿”被打破又是防御，等等。因此，毛泽东说，从军事上看，无论说进攻在防御之后，还是进攻在防御之前都可以，关键在于打破“围剿”。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当然，从战争的总体来看，进攻是决定战争命运的重要手段。进攻虽然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一环。这也是毛泽东明确指出的。

二、持久与速决

持久与速决，是战争中的时间概念，是战争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结。所谓持久，是指某一次军事运动延续的时间较长。所谓速决，则是军事运动迅速发动、迅速结束。

毛泽东用辩证的观点看待速决与持久的相互关系，提出了持久中的速决这样的科学概念，并使之在实践中发挥了极大威力。速决战的长处是，军事上人力物力消耗少，对各方面影响较小，容易组织，容易指挥，又容易表现军事运动之快速性和流动性的优点。速决战的短处是，它只适用于对付弱国、小国和毫无战备的大国，对于有战备并全力抵抗的中等以上国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虽然攻占欧洲许多国家，但未能征服苏联，便是实例。况且，即使以速决战取胜，也只能解决军事占领的目的，不能最终征服人民。持久战虽有较大的消费，军队疲劳，人民受苦，弱点也易于暴露等各种缺点。但另一方面，持久战可以利用广大国土，动员众多兵员，逐渐积累力量等优点。在革命战争中，这一优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毛泽东说：“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①然而他又接着补充说：“唯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②

除此以外，毛泽东还用辩证法观察了持久与速决的相互关系。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4页。

他认为，持久与速决不是绝对对立的，两者相互包含，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转化。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争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①客观事物本身就是这样辩证的发展着。德国法西斯攻打苏联，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造成的结果，都没有违背这个辩证法。

另一方面，战略持久又不能无限制地持久下去，它在一定条件下要转化战略速决。其条件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转变。毛泽东曾预见过：“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②例如，抗日战争是战略持久战，但战争进入到最后阶段，就由持久转化为速决。解放战争发展到反攻阶段，形成了秋风扫落叶的形式，也就由持久转化为速决了。

又如，在战斗方面，持久与速决同样相互包含，相互配合。例如，某一战场或战线上进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并不完全排除在另一战场或战线上进行战役战斗的持久战。特别是在“围城打援”的情况下，目标不是打围敌，而是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持久，对援敌作战是速决，两者并行不悖。在战略防御时，固守箝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往往要求相对持久，又是速决中的持久。

我们应当特别看到，毛泽东提出的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是唯物而又辩证地观察了战争中时间概念，又是和中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5—486页。

②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0页。

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条件观察联系起来的。因为中国的反动派是在许多帝国主义支持下从事反人民战争的。而革命势力的增长却只能是逐渐的。这就需要时间，于是就产生了战略上的持久。但这种持久又以战役战斗的速决为其必要条件。这乃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只有战役战斗的速决集合了很多，使这些战役战斗进攻都能迅速获胜，才能迫使敌人停止进攻或减慢其进攻势头。否则，战略持久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三、内线与外线

内线与外线是战争中的空间概念，是指进攻与防御的范围而言。内线是双方交兵在自己的占领地内进行。外线是双方交兵在敌人占领区内进行。一般说来，防御者处于内线，进攻者处于外线。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内线与外线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说明。他认为，正象世界上一切对立着的事物之间的界限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和可变的那样，战争中的内线与外线的界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揭示了红军能以少胜多的秘密之一，就在于适时地把内线变作外线。他说，处于战略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强敌“围剿”中的红军，蒙受着许多不利，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中把局面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变成我军对敌军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这样，对敌军来说，形成了外线中有内线的态势，对我军来说，形成了在内线中有外线的态势，这就包含着生动而活跃的辩证法内容。

例如，在10年内战中，第二次“围剿”就是红军以弱胜强，变内线为外线的典型战例。当时，敌人以20万强兵对我军30000，敌七倍于我，使我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形势中。但从另一方面看，敌人缺乏人和、地利，他分在山川相隔的广阔的地面上，不进展到

一定的位置，各路兵力很难相互支援。这一点又有利于我而不利
于敌，使我军能采取“分兵法”来分割敌人，以逸待劳，各个击
破。分别与敌军多路作战，共战 15 天，横扫 700 里，五战五捷，
歼敌 30000 余人，缴枪 20000 多支，红军以 30000 对敌 20 万，取
得了重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我军积累了近 20 年的作战经验，对于
变内线为外线的作战方式已经达到纯熟地步。人民解放军经过几
个战役的战斗，就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

当然，在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的问题上，战略指挥者应依
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处置，不可把一时一地的经验呆
板移用。

除此以外，毛泽东具体指出：第一，可使主力军处于内线，游
击队处于外线，形成为夹击敌人的奇观；第二，当敌置于外线对
我主力实行包围时，如若顽敌死盯住我根据地而久留不去，应采
取“围魏救赵”一法，即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外线
解决战斗；第三，为了变内线为外线，应着力于打运动战。因为
此种方针是将“进攻”、“速决”、“歼灭”这三项合而为一的最佳
作战方针。

四、兵力的集中与分散

在战争中，兵力的分散与集中是矛盾的两个侧面，两者既相
排斥，又相联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组成矛盾的对立统
一体。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一不把集中兵力作战看成是赢得战争
胜利的根本方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吸取前人军事思想优秀成果的基础上，
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进一步揭示了集中兵力的丰富内容。他们除
了把集中兵力看成是军事胜利的规律外，还看作是社会政治斗争
胜利的规律。恩格斯说过，战争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列宁也

说，在决定的时机和决定的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规律，同时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突出贡献，是用辩证法的方法，较为详尽地分析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及其条件，考察了兵力集中与分散的相互关系，并把它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战争紧密结合起来了。他指出，所谓集中兵力，就是要善于分割敌人，使我军的数量在局部战场上对敌居绝对优势，使我军在每一次战斗中居主动地位，以多胜少。他说：“……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大战果，各个歼灭该敌。”^①

毛泽东进一步说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威力，成为促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转化的最重要的条件，这是因为：

第一，由于在局部战场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战而胜，便能局部地改变进退形势，在了一项战役或战斗中就起了振奋军心的作用。

第二，虽然我军在总体、在战略防御中尚未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在内容上却逐渐改变着攻守形势。这种变化成为战略进攻的前奏，即由战略防御转化为战略进攻的过渡。

第三，它改变着内线与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内线作战的红军，被敌人重兵包围，虽蒙受许多不利，但红军在许多不利中又可寻求有利。那便是集中优势兵力，使敌军对我军的许多大“围剿”中形成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小围剿，即“围剿”中的“围剿”，将我军在战略上的分进合击转变为红军对敌军战役战斗中的分进

^① 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8页。

合击。将敌军在战略上的优势转变为红军在战役、战斗中的优势。这种敌我双方在力量对比方面矛盾的转化，基本上靠集中兵力这一招。

毛泽东还深刻地阐明了打歼灭战与集中优势兵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贯彻始终的军事指导思想是打歼灭战，而不是打击溃战或消耗战。他说：“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①而红军打好歼灭战主要靠集中兵力。我军只有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才能有效地执行歼灭的任务。全歼的好处是最有效的打击敌军，尤其是对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有用。全歼才能充分地补充自己，包括兵源和弹药。全歼，可以使敌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对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

毛泽东虽然重视兵力的集中，但又反对把集中兵力绝对化。他认为兵力集中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并不是不问时间、地点、条件，一切都要集中。而是应依据情况，灵活运用。

第一，在战争中，由于战争各个阶段情况不同，集中和分散则因时而异。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争为辅。解放战争时期，作战方法则相应变化。我军便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

第二，集中兵力还应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定。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的优势的原则上。在这一原则下，有三种情况均可取胜：其一，对付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兵力临之；其二，对弱敌或不关紧要战场作战，以相对的优势兵力便可；其三，并非每次都要集中优势兵力，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7页。

现于战场，但其余条件必须是在人民、地势、天候对我方极为有利的情况下，为了打破某股优势敌人的进攻，以游击队的小支队牵制敌人之正面或一翼。此种情况在战争实践中不少见。

总之，兵力的集中与分散，应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该集中的集中，该分散的分散，集中与分散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又是相辅相成的。在革命战争中，没有分散，兵力集中的正规战，便不能奏效；只有分散而无集中，战争也不能取胜。自从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以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化零为整”为特点的运动战与以“化整为零”为特点的游击战相伴随，密切配合，成为发展我军，制胜敌人的主要方法。毛泽东还说：“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①

毛泽东最后指出，从分散到集中是更高基础上的集中。由以分散为特点的游击战发展成为集中为特点的正规部队，需在数量上扩大和质量上提高。例如，抗日武装部队就经历过从分散到集中的辩证运动。我们用麻雀战的办法使八路军和新四军集中到91万。所以，毛泽东形象地说，麻雀不再是麻雀，麻雀长成了野鸡。这是集中与分散的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五、主动与被动

毛泽东历来强调在战场上争取主动权的重要性。他说：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就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迫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7页。

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和被打败的危险。所以“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①

那么，这个主动权怎样才能取得呢？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战争中争取主动权的可能性问题。他说：战争中的绝对主动和绝对被动是少见的，常常是相对的被动或主动。绝对主动性往往出现在战役最后而不是在他的先头。因此，通过主观努力，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不承认争取主动权首先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是拼命主义和冒险主义，是军事理论中的唯心论。但是，若把客观条件凝固化，否认在运用客观条件时，有会用与不会用的区别，就会变成逃跑主义与失败主义，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争取到主动呢？根据我国三次革命战争的经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集中兵力，即集中大量而有活力的军队。为了集结军队，就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内线与外线、人和地的相互关系。即在全局上处于被动地位时，要力争局部主动；在内线作战处于不利地位时，要打到外线去；在战略上持久时，在战术上要速决；在和人地发生矛盾时，要集中兵力首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样，在局部范围内先争取主动，当这种主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在全局上变为主动。

除此以外，毛泽东提出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是摆脱被动转为主动的方法。

六、全局与局部

毛泽东通过对战略和战役、战术关系的研究，以及战役和战术关系的研究，深刻地阐述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0页。

关于战争的全局和局部问题，毛泽东说，凡研究战争之总体，即研究战争之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反之，凡研究战争之一个方面和一个阶段状况的，则是战争的局部。

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战争的某一方面和某一阶段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局是战争的总体，局部是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全局总是由若干局部构成的。不过，这种构成并不象形式逻辑中所说的那样，整体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相加。相反，它是由战争各个部分组成的、有机的、生动的、活跃的、有着各种错综复杂联系的统一体，好象一个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一样，人这个整体不等于人体各个部位的机械相加一样，战争全局也不是多次战役或战斗的机械相加或综合。

全局和局部的界限又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动的，它随着研究问题的范围的不同而不同。

在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首先是全局高于局部，局部隶属于全局。毛泽东批判了那种毫无战略头脑，只企求以战役、战斗的胜利代替战略上正确方针的观点。他指出，战略指挥者，最吃紧的是要有战略头脑，要时刻把注意力的重心摆在照顾战争全局上面。因为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才能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只有善于通观全局，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局部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能使战役和战斗的指挥者更自觉地使战役战术服从于战略的要求，并且在服从于总的战略意图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为争取全局胜利作出贡献。毛泽东还指出，一个战略指挥者，为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的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阶段。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缺乏战略眼光的人，在一步棋走出以后，往往不知下一步之所措，迟疑坐困，常使自己处于被动。在红军长征时期，张国涛企图在毫无战争影响

和群众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而遭到失败，就是丧失了战略头脑的实例。

但是，虽然局部隶属于全局，但反过来又影响全局。就是说，局部也可以对全局起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或反作用。毛泽东认为，这种反作用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在战争中某一局部被破坏了，对全局不起重大影响。其原因是该局部并不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二是多数局部被破坏了，往往使整个战局起了变化。这是由于局部积累多了，上升为全局，由量变引起了质变。三是某一局部破坏了，引起整个战局的变化。这是因为这个局部如同列宁所说的那样，是链条上的中心环节。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转变全局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

对于要善于捕捉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毛泽东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如若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失败，全局为之立刻改观。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次反“围剿”打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打王金钰；第三次反“围剿”向莲塘、良村、黄陂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从全局出发，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的范例。毛泽东用杜甫的前出塞中的一首诗：“弯弓先弯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来说明抓住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的道理。

七、胜利与失败

胜利与失败，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失败有全局与局部、根本与暂时之分。红军反“围剿”没有成功，这只能叫局部的、暂时的失败。我之某一战场、战斗的失败，也只是暂时的、局部的失败。与此相对立，胜利也是如此。我之夺取反“围剿”的胜利，某一战场、某一战斗的胜利，也同样是局部的、

暂时的胜利，而非全局的、根本的、最后的胜利。我们的目标，是夺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然而这样一个根本的、最后的、彻底的胜利，要靠一部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胜利来取得。我之某一次反“围剿”，某一次战斗的失利，我们叫失败，敌人叫胜利。然而失败中可能包含胜利的因素，而胜利中也可能包含着失败的危险，关键在于能否正确的总结失败与胜利的教训与经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其战争之非正义性，思想方法的唯心论与形而上学，总的说来不可能正确地总结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最后失败得更惨；而我则为人民而战，为正义而战，又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作指导，因而有可能正确地总结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一步一步踏上取得最后胜利的坦途。

战争中的最后胜利与失败，是与战争的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战争的目的就是“剥夺敌人的抵抗力”。战争进行到一定时期，达到了“剥夺敌人的抵抗力”这一目的，就取得了战争的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研究战略战术时，根据战争规律及其特点，提出了许多反映战争各个方面的战略学和战术学的军事范畴。除了上述七种军事辩证法范畴外，还有质与量、直线与曲线、运动战、游击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等等，因篇幅关系，不再一一列论。

第六章 毛泽东经济建设辩证法思想

毛泽东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极为丰富，其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经济建设内部、经济建设与其他方面（特别是与革命战争）的关系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但它的主体，则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般理论与方法。诚然，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由于对中国现实国情的认识不足和“左”的指导思想，致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过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失误，但不能由此而忽视、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的理论贡献。应当看到，毛泽东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重大成绩，并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基础，同时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我国当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本书的篇幅的关系，本章只能就其与唯物辩证法直接有关的方面，作一些初步探讨。

第一节 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依据我国经济的内在矛盾， 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

毛泽东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思想，产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辩证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原有思想的基础上，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

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不可分割。

1928年毛泽东就指出了革命根据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只是当时主要是从解决根据地军民生活和红军给养的角度提出来的。到了1933年毛泽东则明确的论述了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自然，在革命战争时期所要进行的经济建设是有限度的，并且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这一中心去进行。1943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集中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革命战争时期经济建设的辩证法。其中包括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供给战争与改善民众生活的关系，发展农业生产与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的关系，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经济的关系，以及实行有计划有组织经济建设等内容。后在建国前夕，即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个具有伟大意义文献中，从我国的国情，即我国当时经济领域的内在矛盾出发，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现代化工业与农业、手工业的辩证关系，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

首先，毛泽东把从事物内部、从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研究事物发展的辩证法运用于经济，他指出：“中国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① 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本是一个有机整体。然而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关系看问题，生产是基础。生产的部门很多，就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代化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则是其中的重要部门。把握了我国现代工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业与农业、手工业之间的百分之十与百分之九十的矛盾，就把握了我国经济领域的内在矛盾，把握了矛盾的质和量以及量的比例，从而为研究我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其次，毛泽东对矛盾双方的质与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就国民经济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来说，它体现了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有远大的发展前途，因而是进步的。中国的现代工业，主要掌握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手中，它一旦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领导作用。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现代工业中占第2位。在我国特殊条件下，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性，以利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要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从占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的农业与手工业这一方面来说，它代表了旧的生产力，是原始的、落后的。然而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有取得逐步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将还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对于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要谨慎地、逐步的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没有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

最后，毛泽东对作为矛盾双方的我国现代工业与农业手工业进行辩证的综合，并把它放到国际环境中加以考察。他指出：“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

可计日成功的。”^①

二、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的内部关系，

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生产，并提出两大部类保持合理的比例，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生产的部门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一对关系。它们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重工业是进行生产资料的生产，而轻工业和农业则主要是进行消费资料的生产，它们分属国民经济两大部类。但在社会生产过程中，重工业向轻工业和农业提供重要的生产资料，而农业、轻工业则向重工业以至整个社会提出消费资料。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推动，以求共同发展。因此，要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的内部关系，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不能不对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进行辩证的分析。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论述过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强调捉住主要矛盾对于实践的重要意义，并且论述了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方面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建国后，毛泽东把这一理论用于分析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得出了重工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我国建设的重点的结论。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同时，要改变我国经济依附于外国经济的局面，维护民族的独立，要促进轻工业、农业的迅速发展，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使我国的重工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毛泽东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② 只有迅速发展重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工业，以更多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材料来武装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各部门，才能使国民经济转移到现代化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从根本上改变我“一穷二白”的面貌。

那么，这是不是说，在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这对矛盾中，可以忽视农业、轻工业这一方面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尽管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相比，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它的发展，对主要方面的发展变化有极大的反作用。农业（包括林牧副渔）的发展，将为全国人民提供足够的粮食以及其他农副产品，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原料，为工业提供广阔市场；轻工业的发展，则为发展重工业提供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资金和广阔的市场。所以，没有农业、轻工业的尽快发展，就谈不上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目标。

那末，怎样才能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之间的辩证关系呢？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①前一种办法是形而上学的办法，后一种是辩证的方法。用辩证的方法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为此，毛泽东尖锐而又深刻地提出：“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地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你就打击轻工业，对它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注重农业轻工业，……。”^②这就不仅全面论证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加快发展消费资料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且具体阐述了实现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必要条件和正确途径，打破了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形而上学观点。这就告诉我们，为要解决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必须注重矛盾的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9页。

次要方面。

辩证法除了要求人们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还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处理好这种关系。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来看，由于两者公有化性质不同，生产的技术条件不同，工业和农业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一贯强调发展国民经济要工农业同时并举，使两者保持适当比例，不致因工农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严重问题。为了划清在这个问题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在一定条件下为了更好地突出发展重点，反而要向它的对立面（非重点）用力。他提出，要想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必须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样不仅不削弱重工业，反而更好地保证和促进了重工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①那种认为要发展重工业，就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观点，是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其结果是商品匮乏、市场紧张、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社会也不稳定，并推迟了工业化的进程。从思想认识上说，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形而上学地理解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我国在吸取原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采取了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以促进重工业发展的道路，其结果是保证了比较充足的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保持了物价稳定，满足了人民生活的需要，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这种辩证的思想方法，是与那种直线式的、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根本对立的，是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①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三、正确认识沿海工业与内陆工业的关系， 促进工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旧中国，工业发展微弱，且百分之七十集中在沿海各省，这种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工业布局，造成了沿海工业比较发达，内地工业比较落后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的状况，在改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这对矛盾的两方面作了辩证的分析，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优势，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方针。只有这样，才能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使其在相互促进中各自得到发展。他说：“沿海的工业基础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①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大力发展沿海工业是发展内地工业的基础。因为沿海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内地工业提供资金、机械设备以及技术力量等等，支援和促进内地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内地工业的发展又能促进沿海工业的发展。

建国后，党和政府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支援和发展内地工业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些省市已经成为各具特点的新兴的工业基地。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们对发展沿海工业重视不够，致使沿海工业长期处于设备陈旧、场地狭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的状况。这样，沿海工业长期积累的技术、人才、资金等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步伐。根据这种状况，毛泽东为了使我国工业得到全面而较快的发展，反复强调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采取积极的态度加快沿海工业的扩建、改建，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其中有些可以是大型的。他说：“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0页。

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①这样，在建设的布局上，既强调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又要求“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老底子”，并用“真想”和“假想”这一鲜明、生动而深刻的语言来说明内地工业和沿海工业的关系问题。这既是毛泽东关于注重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又不忽视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辩证法在工业建设上的具体运用，又是讲对发展工业的动机与效果的方法论。因为单有发展内地工业的愿望和动机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有良好的效果。因此，要实现内地工业的大发展，就必须优先发展沿海工业。这些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充满辩证法思想的观点，对我国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今天仍不乏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依据毛泽东关于“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辩证法思想，首先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建立了经济特区，而经济特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新的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国家确定把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提出正确处理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地带的关系，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把加强传统工业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大力开拓新兴产业结合起来。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档消费品工业以及高、精、尖、新产品为重点，加快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的建设，使其成为全国传送新技术、提供咨询和信息的基地。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大力发展中部同东、西部地带的横向经济联系。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的准备工作。在此基础上，把东部沿海的发展同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0—271页。

中西部的开发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又根据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不同产业在投入产出效益上有较大差异的实际情况，建议沿海地区要根据经济技术水平较高而资源缺乏的特点，致力于发展高、精、尖、新等层次较高的产业和出口创汇产品，将耗能高、运量大的工业逐步转移到能源充裕、资源富集的内地。加工地区和资源地区可以采取横向联合、利益兼顾的办法，以便把各自的优势结合起来，以达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目地。同时还建议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省、市，分别同内地一两个经济比较落后的省、区签订协议或合同，采取经验介绍、技术转让、人才交流、资金和物资支持等方式，帮助落后地区加快经济的发展。这些战略决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对毛泽东关于正确认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四、正确认识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关系， 促进经济建设的全面高涨

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总的过程来看，是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统一。马克思就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过：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①我国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也曾指出，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既是对作为总生产过程的诸环节、诸要素相互关系的深刻揭示，又是唯物辩证法的整体观念在经济领域的出色运用。

第一，在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这一有机整体中，生产决定消费、分配、交换以及这些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对它们起支配作用。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来说，两者具有直接的同一性，它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不可缺。从有什么样的生产就有什么样的消费，生产创造出一定的消费方式，并把消费的动力和能力当做需要创造出来这一方面看问题，可以说消费本身也是生产生产出来的。因此，生产是对消费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方面、要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提出的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制订出来的。与此相反，不着眼于发展生产，在消费上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是行不通的。在生产与分配这对矛盾中，生产同样对分配起着决定和支配的作用。马克思指出，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再就生产与流通这一对矛盾来说，生产决定流通，决定流通的方式与广度。

第二，生产就其片面的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虽然生产决定分配，对分配起支配作用，但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再者，生活资料的分配对于生产的发展也起巨大的作用。这不是“分配决定论”，而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认真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把生产者的责任、组织生产的权力与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将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的巨大发展。这是为我国多年实践反复证明过的客观真理。又如，交换、流通对生产的发展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市场的扩大，交换范围的扩大，商品流通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将不断增大，专业化程度也将不断提高。这说明，要发展生产，不仅仅是抓工农业本身，还要高度重视流通与交换。

第三，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从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这一有机整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来看，消费的需要也决定生产的发展。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最后行为，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因此，生产本身不是目的。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发展生产的目的在于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重视社会的需要、市场的需要、用户的需要、消费的需要。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之所以有竞争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对消费的需要有及时而深入的了解。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实现生产与消费的高度统一。它将不断为生产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并推动生产以高出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向前发展。显然,为生产而生产,重生产、轻消费,不仅会使生产的发展失去强大的动力,而且不可能完成使产品成为产品、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必然造成产品不能实现以至生产停滞、萎缩的局面。这种错误,就其认识原因来说,则是对于生产与消费关系问题上的主观性与片面性。

综上所述,可见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和调整,是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四者之间,生产是基础。然而它们是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是相互作用,而不是单方面的作用。重流通、分配与消费,轻生产是错误的;但反过来,重生产而轻流通、轻分配、轻消费,同样是错误的。所以,一定要辩证地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为经济建设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节。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

一、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

尊重中国国情的现实

尊重中国国情的现实,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揭

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关系，是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① 国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它包括一个国家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自然环境、人口、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生产力状况以及在社会制度诸方面的因素和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制约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其许多论著中，对我国国情作了多方面的深入分析和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是：其一，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这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但也有困难。其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农民的情况如何，在政治、经济上影响极大。第三，我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工业不发达，文化科学水平低。其四，我国虽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它建立的时间不长，而且很不完善。从发展的观点看，这种“一穷二白”的情况，既是我們进行建设的有利条件，又使我们在建设中面临着许许多多的不利因素。

经济规律则是人们在生产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的运动规律，它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潜藏在国情内部的东西。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因而除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有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特殊经济规律。毛泽东不仅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特别注重研究由中国国情决定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工农业方面，没有机械地完全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3页。

索了中国自己的道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统的原则下，创造性地解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且探索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积累了一些很宝贵的经验。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已以经不存在教条主义的错误。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片面地强调集中统一，使企业失去活力；片面地强调计划经济，否定市场经济调节；使经济成分日趋单一化，否定多种经济成分的多层次结构，这些错误都与教条主义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历史在新时期赋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任务，仍如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是开创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从我国国情出发，是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前提。我们知道，国情是一个复杂的、处于变化状态的客观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国情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人们对国情的认识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辩证发展的过程，每次认识的深化和飞跃都必须经过实践才能取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从国情出发，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探索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中的意义。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①于是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同志务必深入实践，逐步地加深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今天，它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在一个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建设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页。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别国的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总之，要尊重中国的国情，就要正确地把握国情。因此，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辩证的分析方法。既要有全面性，又要牢牢把握主要之点；既要看到它的现在，又要看到它的过去和未来；既要看到它与其它国家的相同点，更要看到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点；既要作定性的分析，又要作定量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全党在认识我国国情方面，无论在深度上或广度上，以及采取的手段和方法上，都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关于从一般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论公式。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经济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我们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目的，全在于正确地掌握和应用它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①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1—372页。

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49页。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俄国以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为指导进行了实践，结果证明行不通，只好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生产。30年代又兴起商品经济“消灭论”，50年代的“限制论”。斯大林虽然有所突破，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但斯大林在理论上仍然不承认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交换关系，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也存在类似于苏联的状况。毛泽东针对我国1958年“大跃进”中刮起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反对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的观点，指出有些同志企图避开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①毛泽东在其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他还针对中国的实际说：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很快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因此，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②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比斯大林的观点也是一个重大发展。但是毛泽东始终未能完全克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

① 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9—10页。

② 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9—10页。

不相容的传统观念而把二者有机的统一起来。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一科学论断，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即既是计划经济又是商品经济，两者在公有制基础上有机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新发展，为我国全面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1959年3月，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社与队、队与队、社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必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那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的。要教育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这一级干部，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客观法则，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①

毛泽东把价值规律比作一个伟大的学校，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教益。尽管毛泽东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也有过失误，但在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后，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基本上坚持了上述观点。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① 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对旧的计划体制进行改革，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和总量调控，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次，坚持按劳分配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大原则问题。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分配原则。所谓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按劳分配原则，就是社会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给劳动者相应数量的、经过社会必要扣除之后的个人消费品，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持和贯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作了具体论述。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之一。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不是由什么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1958年，毛泽东针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尖锐地指出，这是剥夺农民。1962年他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明确指出：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坚持和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第二，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奖勤罚懒，坚决反对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和按劳分配是根本对立思想和原则。平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红军中的错误倾向严肃的批判了绝对平均主义，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毛泽东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①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曾有人主张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毛泽东针对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企图离开农民自己的劳动、通过平均主义来增加农民收入的错误观点，严厉指出：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

第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必须加强思想工作。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由于缺乏经验、分配制度不够完善以及人们物质利益和认识方面的原因，在执行按劳分配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加强思想工作是十分必要。毛泽东曾提出：“政治工作同必要的按劳分配要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②他的这一观点，贯穿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一方面，只有坚定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才能使劳动者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上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激发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只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使劳动者正确认识 and 对待在按劳分配原则贯彻中存在的问题，不片面地为个人利益所计较，提高觉悟，振奋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三、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是 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

①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1页。

② 转引自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证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既要有宏观调控，又要有市场调节，两者缺一不可。我国建国以来实行计划经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曾取得成功，使我国初步建成以重工业为中心和以三线为重点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比例失调、大起大落的现象；物资匮乏、效率上不去，也曾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难治之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5年我国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包括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经济主体（企业）的市场化，市场体系的培育，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逐步间接化（即通过市场管理），等等，都表现为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扩大、不断深入的过程。事实证明，市场取向的改革越是深入的地方、部门、企业，那里的经济活力就越大，发展速度就越快。例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就比全国其他地方快；同为沿海的广东又比上海发展快；非国有企业又比经济实力最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展快。从全国看，改革10多年来，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了，市场物资空前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了。这就说明，经济建设只强调计划调节，忽视以至否定市场调节的做法，是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计划经济，不能是商品经济，更不用说市场经济了。那时认为，商品经济只能以私有制为基础，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当然，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也允许某些商品和市场的存在，但商品只限于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市场只能存在于计划经济的缝隙之中，作为它的补充。我国在改革前也是这样，比如大计划、小自由；容许集市贸易；允许三类商品上市，等等。但总的看，是严格限制市场的范围和作用，理论上否定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存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党中央对计

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先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随后又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等等。这些提法，反映了人们对市场作用认识的深化。到了1984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讲得最早、最明确的是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布尼时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但也有不同。特别是在后来举世瞩目的1992年年初的南巡讲话中，又对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区别。”这一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传统观念，诊治了人们在市场和市场经济问题上常犯的“恐资病”，启发了人们重新思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共产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决定，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是继80年代初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之后，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最重要的一次突破。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

市场经济本身的一般共性，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它是一切商品生产发达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所客观必需的资源配置方法，基本上不依存于社会制度的性质。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法上基本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就是对市场经济本身通行的共性东西而言的。当然，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某些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如以私有制为基础，攫取利润为唯一目标，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种种弊病，这是我们不能学习的。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则、形式、手段、方法，等等，我们都可以借鉴，拿来为我所用。

市场经济的一般共性的：一、企业是市场的法人主体，不论是何种所有制、具有何种法人地位的企业，都应能够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二、各种产品、服务、货币以及包括资本、劳动等在内的生产要素，都能够依据价格成本的有利性，自由流动；其供给和需求自由适应，形成均衡价格。三、通过价格等灵敏的市场信号和优胜劣态的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企业，形成经常性的动力和压力，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社会需求。四、由于市场结构本身难以达到完全竞争和提供完全的信息，而市场调节本身又具有自发性和后发性的特征，市场经济仅靠自身运转，难以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难以实现长期经济稳定，难以防止两极分化，难以应付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对未来的重大挑战问题。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弥补市场机制的这些缺陷，必须有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计划调控，来干预市场的运行。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上述一般共性的东西，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适用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同的共性以外，还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从

政治制度方面讲，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这个政权从总体上说，不是为某些集团或个人谋私利，而是以为全体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从基本经济制度上讲，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为补充，不同所有制可用不同形式组合经营，各种经济成分和经营形式的企业都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市场机制拉开差距，刺激效率，同时运用多种调节手段，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基本特征，不能不对市场经济的运转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公有制为基础，有共同富裕的目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处理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期利益与近期利益的关系上，在处理计划与市场、微观放活与宏观协调的关系上，以及在刺激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关系等方面，则能够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有成效，做得更好。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也将会呈现较多的自觉性和计划性。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两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运行中力度较强的国家自觉调节，虽然有利于减少市场本身的缺陷，但也可能由于计划调控失误或宏观调控力度不当而产生新的问题。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既为我们发展经济提供了一定的优越性，又要求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的规律。

综上所述，为了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增强我国整体经济的实力，就要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就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便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把计划和市场这两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手段结合起来，凡是市场能解决好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市场管不了，或者管不好的，就由政府用政策和计划来管。同时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也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不

仅不排斥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当然，这种计划调控也不是传统的以行政指令型为主的计划，而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则要求的、主要是政策性和指导性的计划，并且也不排除对国民经济某些关键部门必要的行政指令的管理。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就可以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人民生活的关系

一、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一方面指出要加强国防建设，另一方面又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基础是加强经济建设，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①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那么，怎样才能发展国防建设呢？毛泽东指出：为了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②，“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③

那么，为什么说加强国防建设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呢？这是因为：首先，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提供充足的粮食、衣服、生活日用品等物质资料，特别是重工业的加速发展，才能为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272页。

②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272页。

③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272页。

国防提供钢铁、机械、能源、原材料等先进的技术装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强大雄厚的经济实力，就没有巩固的国防。其次，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促进教育、文化、科技事业的发展，从而为国防建设补充大量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专门人才，为国防科学和国防工业输送大批技术力量，促进国防建设迅速发展。因此，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这是一个战略方针的问题。

经济建设虽然是国防建设的基础，但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能保障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生产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首先是由于国防建设和战争的需要引起的。许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往往先在国防工业部门产生或首先采用，然后逐步推广到农业、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部门。因此，我们应该努力使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保持充分合理的发展，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

从根本上讲，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又进一步激发广大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两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实践中，在用于经济建设的积累资金和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基金之间，常常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同劳动者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用辩证的方法来妥善地加以解决。

要发展经济建设，必须增加积累基金。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农业大国，要想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更需

要执行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努力节约资金，以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反之，如果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就不可能提高。因此，在解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矛盾时，首先要讲统一性，教育人民群众自觉地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但是，讲统一性，重视国家经济建设，绝不能讲独立性，忽视人民生活的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经济建设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所以，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毛泽东在总结原苏联的严重教训时，曾尖锐地指出：“你要母鸡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①总之，“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指导我们经济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反复进行教育。

由于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上，需要根据不同时期矛盾的特殊性来确定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指出，要根据丰收年和灾荒年的不同情况，经常调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做螺旋式的。”^②毛泽东多次教育干部不能只顾国家利益而忽视群众的个人利益，同时也对片面强调生活福利、忽视艰苦奋斗的倾向进行了严肃批评，强调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问题。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

②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三、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人们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利益划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层次，指出这三个方面就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物质利益关系。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国家和集体利益是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是劳动者个人利益的源泉和保证，而劳动者个人利益则是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基础和最终归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物质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和矛盾，由此形成了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和差别性的矛盾运动。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指出正确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他在《论十大关系》等著作中，精辟而系统地论述了调节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概括起来主要是：

第一，坚持统一性和独立性、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是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物质利益关系的理论基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就是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利益整体内部即“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①体现着统一性与独立性、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毛泽东针对中央权利集中过多和在某些方面对生产单位和个人的物质利益有所忽视的情况，指出不能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要联系的独立性，”同时，也要给他们一定的物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

质利益，“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产中的迫切问题。”^①对于农业生产单位，毛泽东说：“要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规下保护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②只有这样，才能调动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使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协调一致地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第二，解决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说：“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③“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④在处理国家与工人、农民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逐步调整。他多次强调，不能剥夺农民，不能把农民搞得很苦，在政策上要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⑤无论在什么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反对任何小圈子主义。

第三，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和解决有一个过程，必须根据实践，经常调节，不断解决。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特点，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矛盾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内容及其在生产、需要、积累和消费等方面的具体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0页。

③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④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⑤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

表现。由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实践中一个长期的任务，因而解决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也是一个过程。为此，毛泽东指出：对这三个方面，“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①这就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矛盾的经济实质，而且指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长期性，为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和经济利益矛盾运动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第四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 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要发展对外交流，向外国学习。毛泽东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②

一、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以及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的原理，是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最基本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肯定事物运动的力量源泉在事物自己内部，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是“自己运动”。但事物的自身运动又离不开外部条件，离不开同它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毛泽东说，事物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0页。

^② 转引自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①他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阐明坚持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的辩证关系。其主要思想有如下几点：

第一，在自力更生和向外国学习这对矛盾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这一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方针放在什么基础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叫做自力更生。”^②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又特别强调这一思想。他把自力更生作为基本点，强调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按照本国的实际，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自己找出适合自己情况的建设道路。毛泽东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而不是靠外国人去认识的。我们学习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成中国的东西，“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③邓小平也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④

第二，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并不排斥学习外国。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各个国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作用越来越大。我们应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部条件的促进作用进行经济建设，那种闭关锁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

② 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

③ 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页。

④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

国，拒绝利用外援、外资和外国的技术，无异于作茧自缚，是十分有害的。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①邓小平也说：“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②因此，那种把自立更生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强调自立更生就不必要再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是错误的。从经济意义上说，我们积极参加国际经济活动，有助于我们打开眼界，激励自力更生的意志和信心；有助于增强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加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步伐。

第三，坚持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不能盲目照搬。毛泽东曾批评有些人就象《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节，直不起腰。他一再强调，在向外国学习时，我们一定要“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③。我们在经济上发展同各国的贸易关系，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但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④邓小平也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

①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

②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88页。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1—402页。

④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

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① 坚持这种正确的学习态度，正是对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的表现。只有正确地向外学习，才能反过来巩固、促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根据40年来的经济建设实践，从新的高度提出了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战略方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坚持自力更生和向外学习辩证关系的思想。

二、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与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国是一个拥有近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应该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又不能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而需要大力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越强，对外出口的产品越多，竞争力越强，创汇能力大，就越有条件扩大和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关系。这又能进一步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如果进入这种良性循环，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都能相互促进。反之，如果把自力更生等同闭关自守，既无力发展对外关系，也不可能从对外开放中增强自己的能力。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贫困落后，这已为我国历史的多次教训所证实。邓小平在谈到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时说：“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②这就把两者的关系说得十

①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72页。

② 邓小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67—68页。

分清楚了。

第一，自力更生是我们的立足点。

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也只能是靠本国的力量，才能取得成功；企图完全依靠外援使国家强盛起来，是不现实的。象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人口众多，底子又薄，经济文化落后，单靠外部力量的帮助不可能使我国富强起来，基本的途径就是依靠我国人民自立更生。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这样。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有过多失误，但毕竟已经使我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极端贫困落后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的国力空前增强。所以，邓小平说：“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①

自力更生，具体地说，包含着以下内容：其一，建设国家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各种形式的外援，只有经过本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才能真正转化为民族经济力量的一部分。其二，建设国家必须与自己的国力相适应，不论是建设速度，还是建设规模，都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不搞盲目引进，不借超出自己偿还能力的过头债。其三，建设国家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照抄照搬外国的模式。其四，建设国家必须独立自主地进行，坚决维护我国的主权，保护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以上几点是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可是在执行开放政策的过程中，有的人对这些前提和基础有所忽视，表现在盲目进口上，明明自己国内能够制造的设备 and 许多十分普通的消费品，也要花昂贵的外汇进口；有的人似乎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可以从国外买得来的，这是不切实际的。其一，我们没

^① 邓小平：《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61页。

有这个力量，什么都从外国购买；其二，即使有力量去买，外国也不可能满足我国大量的需要；其三，假定前两者是可能的，外国的东西买来后，还要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在我国目前交通、教育、文化、技术等等都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也是做不到的。所以，一切依赖外国的思想，都只能是一种幻想。一切外来的东西，无论是资金也好，技术也好，人才也好，都是极为有限的，只能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补充，只能是一种辅助性质的东西。所以，“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①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绝对对立起来，把两者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自力更生的方针曲解为“自给自足”，这实际上是闭关锁国的翻版，是小生产保守思想的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国民经济的许多方面都提出了所谓“自给”的口号，甚至不惜耗费超出引进费用几倍乃至几十倍的资金，生产所谓“争气”产品，企求在一切方面自给自足。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必要的。在当前的改革开放大潮中，个别习惯于搞“左”的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他们不了解世界上一切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各有其优势，同时又有其局限性。只有在扩大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和社会合作中，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已有的先进科学技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才能使本国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样样自己搞，万事不求人，实际上是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落后保守的信条，根本不可能与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日而语，它是对自力更生方针的歪曲。

^①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72页。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因和外因，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才推动事物本身的运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充分依靠本国的力量，又必须充分地利用国际条件。就是说，既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又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两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

首先，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使自力更生的方针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我国的经济实力越强大，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条件就越充分，基础就越雄厚。同时，对外开放是增强自力更生力量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外开放，可以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加快发展速度，壮大经济实力。自力更生的力量越强，工农业生产的能力就越大，利用国际分工，参加国际联合生产，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的力量就越大。可见，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是相互促进的。

其次，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了解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向和趋势，提高我们的经济竞争能力，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自己的经济活动置身于这种联系之外。因此，自力更生必须包括在世界经济横向联系中具有灵活的应变能力这一点。

最后，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学习世界各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使我国的经济活动建立在科学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使自力更生的方针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需要说清楚的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防止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袭和腐蚀。邓小平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

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①“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和颓废的东西。”②如果在对外开放中，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社会就会动荡不安，以至出现动乱的因素，于是对外开放，经济建设，统统都无法进行。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存在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党中央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执行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开放不能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我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③

①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51页。

②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③ 邓小平：《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60页。

第七章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在同中国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包含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深刻经验教训，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逻辑。

第一节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石和核心。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两对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新范畴，并且根据它们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的新论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一、“社会基本矛盾”概念的提出

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概念，既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又寓于新意，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

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

东适应新的历史情况，于1957年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他在批评斯大林否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矛盾的时候，指出：斯大林“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①毛泽东还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

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概括，是人类对社会的认识史上的一次飞跃。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不仅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概括为“生产方式”范畴，而且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形态”范畴，这是对人类认识史上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则从发展观的角度，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从而揭示出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全貌和发展的动因，使社会这一骨骼有血有肉。因此，“社会基本矛盾”这个新范畴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人类社会认识的更加深化，同时，还为我们进一步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提供了更根本、更全面的指导线索。

然而，有的同志则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只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这一对矛盾。他们认为，如果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就和“基本矛盾”这个概念相冲突。而且还认为，如果把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也作为社会基本矛盾，就会使生产关系“一身二任”，上层建筑也跻身其中，就容易导致“生产关系中心论”、“上层建筑决定论”的错

①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误，等等。这种看法，很值得商榷。

第一，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的提法是一致的。我们知道，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可以看成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矛盾的展开和具体化。所谓社会存在，主要的是指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而所谓社会意识就是指反映经济基础的社会政治思想、法权思想、道德、科学、哲学、艺术、宗教等观念和学说，它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统称为上层建筑。然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涉及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即物质与物质的关系。只有加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中包括社会意识形态）这一对矛盾，才能比较全面的反应出物质关系与思想关系，也就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否则，如果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排除在社会基本矛盾之外，那么，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就无法说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就会把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with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割裂开来。所以，只有承认社会基本矛盾是两对，才能抓住社会历史观的重大基本问题，并在不断改革中解决这个矛盾，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第二，从人类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看，社会基本矛盾的概括，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人类社会是物质生产运动的一种高级形式，是一个充满矛盾、错综复杂的有机体，它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包括人与人的关系；既有物质、经济关系，也有政治思想关系，这些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构成一个统一的完整社会。从“社会基本矛盾”这一哲学范畴的内涵与外延看：内涵是指两对矛盾三个领域，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外延是指它贯串于全部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之中。两对

基本矛盾构成了完整的社会有机体,概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它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和客观趋势,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它不会因为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它影响、规定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它在人类社会诸矛盾中具有基础性、连贯性,起着规定与制约其他矛盾的作用。这两对基本矛盾之间密切相连,构成一个统一整体。如果撇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那就等于把构成人类社会有机体的“三层楼”大厦结构,去掉了“一层楼”,那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大厦了。可见,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来运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

第三,从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看,“社会基本矛盾”的概括,既承认生产力的作用,又承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物质生活、物质关系,无疑是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但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地方在于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同具有意志的社会的人分不开的。因此,在承认社会物质生活决定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决定性因素的同时,还必须承认由反映社会物质生活的社会意识所起的巨大的反作用。而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恰好是这种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思想相统一的科学概括。当然,承认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并不是否认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毛泽东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①诚然,承认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就使生产关系具有“一身二任”的作用。然而,正是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正是生产关系这种中介作用,就更清晰地阐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乃根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就更好地说明了两对基本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2页。

矛盾之间的主从关系。这是对列宁的“两个归结于”（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①的思想的发挥。

需要指出的是，一种社会发展阶段飞跃到另一种社会发展阶段，一种社会形态代替另一种社会形态，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②就一个国家的社会革命来说，固然要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就离不开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正如毛泽东指出那样：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要不，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再武装夺取政权，然后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进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呢？恩格斯就说过：“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③

总之，毛泽东把贯穿于一切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盾决定着、制约着社会的一切方面、过程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规定和影响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着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它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情况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这样。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

①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②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③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6页。

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地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个提法比其他一些提法妥当。”^① 我以为这个评价是公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同时，也克服的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理论。

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 生产力、经济基础起决定作用

毛泽东在《矛盾论》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多次论述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自觉能动性等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情况。他在《矛盾论》中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② 当然，毛泽东提出的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条件就是“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68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326页。

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①毛泽东的这一“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不同，对社会基本矛盾所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生产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学说的时候，是比较侧重阐明它们的唯物主义原则的话，那末，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则比较侧重阐明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突出其反作用，强调一定条件下的反作用。这个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新侧重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主要任务在于与历史唯心主义作斗争以及与空想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因而特别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则较少论及。恩格斯晚年已有所察觉，并在多次通信中有所补正。如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说过：“青年们有时过分着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②他在《致弗·梅林》的信中也说：“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形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326页。

②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9页。

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①为此，恩格斯在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又强调上层建筑等的反作用。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就指出：“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且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②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据中国革命的新鲜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贯彻到社会领域，在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使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而侧重点在强调辩证过程，突出反作用的方面。他提出的“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论”是建立在“生产力决定一切”这块基石之上的。他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③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点是十分明确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我国生产力的基本状况是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和百分之九十的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的问题。”^④

然而，有的同志认为，“一定条件下的决定论”是站不住脚的，是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他们问：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① 恩格斯：《致弗·梅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1页。

②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③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④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时候，生产力、经济基础还起不起决定作用？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陷入了二元论；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就又陷入了唯心论，二者必居其一，最终都是宣扬唯心史观，云云。

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从总的历史发展来说，的确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决定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就会或早或迟地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在这里，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绝对的，二者之间不能相互转化。颠倒二者的关系，就会陷入唯心史观，把二者轮流突出出来起决定作用，就会陷入二元论。但是，从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来看，二者又是可以转化的。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生产力、经济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次地位发生变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必须承认的。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象毛泽东那样明确提出“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论”，但却有过这种辩证思考。马克思就曾说过，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力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批判了把历史唯物论庸俗化的作法，指出在历史过程中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①列宁也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能不占首位”。^①他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还明确指出“英勇首创精神”，“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②这种首创精神在苏维埃俄国当时的情况下，曾起着扭转危局的决定作用。由此可见，毛泽东的“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论”，是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

毛泽东关于“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论”的“条件”是一个限制词，必须紧紧地把握住。他在《矛盾论》中，对“条件”的限制是讲得很清楚的。这就是，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可见，仅仅是在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的具体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更才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再没有其他的状况、条件可以随便地使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正如马克思说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③

毛泽东关于“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论”的思想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它极大地鼓舞着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去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战胜敌人，创造新生活。当然，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新的侧重点的思想，和任何真理一样，如果强调过了头，那怕多跨出一步，就会走向反面。列宁就说过：“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说得‘过火’（如老狄慈根所指出的那样），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便可以弄到荒谬绝伦的地

① 列宁：《辩证法和折衷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441页。

② 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5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必然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就是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不敢肯定他的正确的理论观点，恰恰相反，只有坚持并发扬他的正确的理论观点，才能更好地纠正他的错误理论观点，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继续阔步前进。我国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生动而有力的证明。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

毛泽东科学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社会基本矛盾同以往一切社会基本矛盾相比，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首先，从矛盾的性质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根本区别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①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以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由此决定的交换和消费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既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又是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矛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的法律，以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关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系即经济基础所制约并为其不断完善和发展服务的，它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尽管从局部和一些环节上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水平的部分，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但从整体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本质上是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以达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的目的。这就充分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

其次，从矛盾的特点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基本适合的情况下局部不适合的矛盾。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①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基本适应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看，是以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为补充，不同所有制可用不同形式组合经营，各种经济成分和经营形式的企业都进入市场，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与所有制结构相适应，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市场机制合理拉开差距，刺激效率，同时运用多种调节手段，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消除了旧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脱离的弊病，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劳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劳动者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少数剥削者的利益，而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也消灭了旧社会“劳而不获”的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这就能充分调动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动性、责任心、紧迫感和积极性。于是就可以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来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也是基本适应的。从政治制度上说，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是建立、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强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保卫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保卫人民的合法权益。它还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把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结合起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因而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尤其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领导力量，这个政权从总体上说不是为了某些集团或个人谋私利，而是以为全体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所以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根据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改革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使上层建筑各个方面能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思想方面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自觉反映经济基础的要求，它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科学的理论一旦武装了群众的头脑，指导了群众的实践，就会变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巨大物质力量。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除了相适应的一面，还有相矛盾的一面。

从所有制来说，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为补充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崭新的制度，还是不完善的，有许多问题需要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层次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完

善。另外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之间、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同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虽然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的机制来调整,但要作到平衡也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些矛盾处理不好,也要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着“三大差别”,人们的体力、智力还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还不能立即消灭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因此,在人民中间还存在着领导者、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直接生产者等相对固定的分工,这些关系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在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其他生产要素分配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时,如何既不搞平均主义,又不搞过分悬殊,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又加强思想教育,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等等的问题和关系,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加以解决。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也有不适应的方面。其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则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其二,国际敌对势力的影响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遗毒还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干净,因而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其三,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没有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只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取得明显的进展,才能巩固和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相适应是基本方面,相矛盾是非基本方面。正是这种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矛盾,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中,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办法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办法，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一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和改革，不断地得到解决。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来解决。

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方法时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①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由于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产阶级私有制范围内不管怎样进行调整，也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必须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是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不会自动放弃剥削，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必然要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来维护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所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不同，它是非对抗性的，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基本相适应条件下的矛盾，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因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制度，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调节和改革，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而不断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解决的思想，不仅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为我国的实践所证实，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会以来，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是以这一思想为理论依据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自身调整过程中，逐步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调整、改革、完善和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逐步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旧的矛盾解决之后，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不断地调整 and 改革中前进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①

回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历史，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节和改革，通过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使矛盾不断得到解决的。即使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十年内乱，也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动群众揭批查，由司法机关绳之以法，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即便是处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也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依靠本身力量来解决的。

第二节 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375页。

争的一般原则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不断总结新鲜经验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阶级斗争理论。然而，毛泽东晚年又恰巧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贡献是第一位的，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取得胜利的。

一、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主要贡献

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第一，在深刻分析旧中国各个阶级及其关系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不象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阶级关系简单化和明朗化，不象典型的封建社会蒙上等级制罩衫的阶级关系那样森严清晰，也比沦为完全殖民地国家的阶级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尤其是近代中国已成为东方乃至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奇特交错。在这种情形下，要认清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搞清中国的特殊国情，不是仅靠本本，靠共产国际的指示，更不是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能够奏效的。

毛泽东投身革命后，就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条指导性线索，调查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第一次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深刻指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如何以及立场如何，全依他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这就既坚持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又从发展的观点，从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观点，并把这一标准创造性地运用和加以发挥。毛泽东不仅考察了各个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而且还顾及剥削量、劳动状况、分配和生活情况等等。这就得以划分地主、破产地主、二地主、富农、

小土地出租者、富裕中农等。他不仅考察了各阶级在中国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而且还顾及与国际资本的依附情况等，从而把中国资产阶级创造性的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一个作为打击的对象，一个作为团结的对象。他不仅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各阶级的关系，而且还顾及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变化。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把大资产阶级区分为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一个作为打击对象，一个作为统战对象。还有，他不仅深刻细致地把一个阶级区分为不同的阶层，而且还顾及它们的条件发展而有所变化。例如，土地改革后，农村趋向中农化，就及时地把依靠贫农、雇农的阶级路线，修改为依靠贫农、下中农的路线。这样，把下中农和上中农加以区别，一个是依靠力量，一个是团结力量，从而得以把依靠力量始终建立在大多数的基础上。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说毛泽东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第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新概念，把建立人民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原苏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了全国政权。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举行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地区的起义，都先后失败了。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通过什么途径和道路才能实现暴力革命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进军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并成为其他根据地的楷模，起着指引全国革命航向的作用。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农村根据地的建设，把建立人民武装、进行土地革命

和政权建设结合起来，积累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他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他鉴于旧中国“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①从而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

第三，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相对于巴黎公社和苏维埃政权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史上的第三步，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间接地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点。

人民民主专政正确的反映了我国的国情和革命经验，是一种较为灵活的政治形式。毛泽东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今天担负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的制度。”直到今天我国的新宪法仍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我国的国家政权称为人民民主专政。虽然随着

^①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2页。

革命阶段的转变而注入了新的内容，但还是坚持了凝结着革命经验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这一名称。

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提法，在政权的阶级构成上，阐明了中国各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权的阶级构成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①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把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不作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专政的对象，在经济上采取赎买政策，在政治上继续保持联盟的形式，这样，中国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资产阶级，是在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这种特殊政治形式下完成的，这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所独具的鲜明特色。现在，作为整体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作为那一部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代表，仍然继续参与政权领导工作，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法宝。我国现阶段享有民主权利的主体的范围空前扩大了，专政的对象已经不是作为整体的反动阶级，而是只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与此相关，国家组织经济建设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独特贡献。

“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述，概括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完整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阶级的历史的政治概念，本来就包括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内容和职能；然而，它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在字面上却只有“专政”，而没有“民主”。至于“人民民主专政”在表述上则不仅有“专政”，而且有“民主”；并采用内容更为广泛和丰富的“人民”一词，来包括、代替“无产阶级”一词。这样，人们从“人民民主专政”这面旗帜上很容易理解我国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国家政权的性质、内容和职能，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防止误解和产生片面性，有利于防止个别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上作文章，搞什么“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全面专政”等等。

第四，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通过开展阶级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至于是采取强力剥夺方式，还是和平赎买方式来消灭资产阶级，那要依据主客观的各种条件来决定。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设想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在俄国由于资产阶级勾结国际资产阶级，反抗苏维埃政权，甚至进行武装叛乱，所以列宁的设想未能付诸实施。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则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毛泽东依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的特点，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1956年全国出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资本家敲锣打鼓，赞成社会主义改造，震动了全世界，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和平赎买资产阶级的成功范例。当然，这并不是搞阶级调和，正如周恩来曾经指出的：“实质上就是在无产阶级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①

我国无产阶级经过浴血奋战，夺取全国政权以后，率领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群众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没收了占

^① 转引自 1979 年 2 月 15 日《人民日报》第 3 版。

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比重达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革命，接着又进行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建设、农业以及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这样，就既从右边断绝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动阶级的联系，又从左边切断了它同小生产者的联系。况且，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赎买，是经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拿定息到取消定息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是经过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长期较量和斗争，尤其是1952年开展的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五反”斗争的伟大胜利，才有1956年把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转为高级形式，以后再转为完全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接二连三的胜利。所以，从新民主主义过渡的革命转变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就不能不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用和平赎买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变阻力为助力，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资本家的力量来消灭资产阶级，充分地表现了高度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创造性的领导艺术。这是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中的灿烂篇章之一，也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精神财富。

第五，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规范了苏联解体以前世界阶级斗争的新格局。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他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处于两霸和发展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现在世界上实际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着的三个世界。

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它们又斗争又勾结，斗争是主要的。它们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它们几乎在遍及全世界的各个地区展开势不两立的争夺，以各种手段直到军事力量

干涉别国的内政，通过代理人甚至直接出兵占领别国的领土。当今世界上局部战争不断，都是超级大国支持、纵容和策动的，或者是它们亲自干的。它们的争夺形成了世界动乱和不安的主要根源，构成了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新的威胁。

第三世界的兴起，是今天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这些国家过去曾经是帝国主义的“后院”，现在成为反帝、反霸、反殖的主力。它们的斗争汇成了一股国际正义和人类进步的潮流，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都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第二世界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压迫、影响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面，又有在不同程度上受超级大国控制和欺负、受到战争威胁的一面。因此，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同它们进行联合反霸，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指明了当时国际斗争的大方向。指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至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次要的敌人，谁是直接同盟军，谁是间接同盟军，这就为我们在当时国际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和结成最广泛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使全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全世界无产者必须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斗争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科学地规范了当时世界阶级斗争的战略新格局；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进步。

二、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几点理论探讨

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有精辟地分析和恰如其分的结论。我们在这里只

是试图从哲学的角度作点探讨，以利于我们正确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一，与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意见分歧有关。

“文化大革命”从现象上看，是“炮打司令部”、“夺走资派的权”与所谓的“二月逆流”、“丙辰清明运动”之间的斗争，但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从1957年以来，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估量上，在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和建设速度、程序上，都存在过摇摆、曲折，其中政治与经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例如，从1956年纠正急躁冒进到1958年“批判反冒进”，来了个“大跃进”，又到“八字方针”的调整，再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

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意见分歧是有一定联系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

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可见邓小平着力整顿的和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东西，说来说去，首当其冲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在分析“文化大革命”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重大问题，除了经济因素以外，也要看到其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情况。《决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节末尾的两段，列出了八条，连同前一节所列的一条，共九条原因，就是对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原因的全面而深刻地科学回答。

第二，与对“过渡时期”的错误理解有关。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及其阶级关系的认识上，有过摇摆。虽然一度转为正确，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把过渡时期拉长，把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因而犯了“左”的错误。现在分几个阶段进行分析。

从1952年底《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到1957年6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见报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①认为过渡时期完成就是剥削阶级消灭，阶级斗争结束。毛泽东在1956年9月22日接见意共代表团的讲话中说：“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从一阶段过渡到了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了，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指斯大林——引者注），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②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记录稿），也认为阶级斗

①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② 转引自《学术研究辑刊》1979年第1期，第14页。

争已经基本结束。

1957年6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后的一段时间内，随着整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对前面的认识有所修正和完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要“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①这就是说，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但过渡时期尚未走完这样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此相适应的阶级关系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②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还存在。这样，既纠正了斯大林忽视阶级斗争存在的右的错误观点，又否定了斯大林认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左”的错误观点。这是对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客观实际情况的科学反映。

从1957年7月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到1962年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段时间，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日渐“左”倾，但间或也有比较正确的精辟的分析。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还是必要的，以后才能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这就修改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正确概括。同年又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375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文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于是就推翻了“八大”决议中比较科学的提法，然而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一条中却正确地指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要“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可是，到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错误地认为，阶级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消灭了；但是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反右时发现的。那些地主、资产阶级现在虽然不剥削了，但阶级还存在。有些代表人物，不是作为经济上的剥削阶级还存在，而是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还存在。这种观点显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按经济状况划分阶级的标准。1959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在党内错误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在理论上作出了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②的论断，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引向党内。然而毛泽东在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正确地指出：“在我国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③

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

①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② 转引自《人民日报》1967年8月16日。

③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3页。

级斗争”的号召，认为过渡时期就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错误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错误行为的交互影响、演进的苦果，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过渡时期的终结线究竟划到哪里，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开展阶级斗争的重大实际问题。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论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曾正确地区分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三个不同的阶段，这既符合马克思、列宁的原意，也与我国的客观实际相吻合。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设想是极其明确的。即：（1）长久的阵痛；（2）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3）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正是把这三个阶段分别用三个小节来叙述和发挥的。可见马克思和列宁都是把过渡时期的终结线划到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前夜，而不是拉长到进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前夜。但是，在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在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提法上，对原来的正确提法有所改变。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1964年7月14日中国共产党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过渡时期就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就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和过渡时期等同起来，即认为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混淆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阶段的区别，把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误认为是完整形态的阶级斗争，并错误地把它引伸到中国共产党内，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从这个错误的推断出发，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必须多次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

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而“文化大革命”就是实现这种所谓“政治大革命”的“极好形式”。由此可见，理论认识上的失误，必然导致行动上的错误。

第三，与对国情的错误分析有关。

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在取得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胜利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进程说明，虽然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先夺取政权，创造政治条件，然后再去创造物质条件，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应该看到这类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背负的沉重包袱。有鉴于此，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就指出：要看到现代工业占工农业比重很小的这个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种对国情最根本方面的正确分析，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指导我国的工作在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可是在后来，毛泽东又片面地认为我国“一穷二白”是好事，穷则思变，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就把我国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不利因素看成了有利因素，结果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良后果。如什么“趁穷过渡”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呀，等等，使生产遭到了破坏。当有人对“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作法提出批评时，他就认为“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①后来他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对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进一步推向极端，形成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一观点，既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严重违背了中国的实际国情。

^① 转引自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所以我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是毛泽东晚年最主要的错误思想，是“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发生和延续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四，与背离唯物史观的个人崇拜思想有关。

1957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1957年以后，他就不谨慎了，变得逐渐欣赏、接受个人崇拜了。具体表现在：其一，毛泽东在晚年听不进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彭德怀1959年提意见被打成反党分子，刘少奇1965年提意见被看是修正主义问题，就是证明。其二，毛泽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毛泽东晚年越来越脱离集体领导，常常不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而由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者随意否决已由党中央集体讨论通过的决议。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是总结和概括全党的智慧和总结人民群众的历史经验，而主要是概括和总结他个人的“左”倾错误思想观点；提出之后，对这些观点的态度，又成了衡量人们对待毛泽东、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以致长期被肯定，被颂扬。因而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延续正是推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结果。

当然，我们说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这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负有责任，并不是说别人一点责任也没有。“文化大革命”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毕竟是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错误意见，并形成了集体决议而公开号召进行的。因而，当时在党中央任职的其他领导同志以及这个领导集体也是有责任的。

第五，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如在阶级斗争理论上，错误地把政治思想因素纳入划分阶级的标准，也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之一；另外，我国进行的反修防修活动，也增加了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因素；还有，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种种社会政治矛盾和

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当着阶级斗争来处理。

第三节 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

一、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

提出及其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虽有过设想或论述，但都未能作为重大的全面性的理论课题加以系统研究或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还是作了有益的探讨和预见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限制，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按劳分配”中存在着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些矛盾，主要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谈到过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

列宁在领导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后，也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进行过探讨和分析。他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和官僚主义的矛盾等作过一些具

体分析和研究。但由于列宁没有亲身经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实践,所以就不可能把两类社会矛盾问题,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重大理论课题,进行全面研究。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显露和突出出来,两类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斯大林对此从理论上也曾作过一些说明。但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又缺乏辩证法思想的一面。主要表现在1936年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内,认为苏联国内没有矛盾了,只有政治上、道义上的和谐一致。一旦社会上出现了矛盾和问题,就归结为外部因素的作用,认为是外国资产阶级走狗、代理人的破坏。这就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党内的和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于是就导致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1956年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特别是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

1956年12月29日,经毛泽东修改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和阐述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对概念。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作了论述。他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①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

^①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东进一步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①又说：“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②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具体地历史地考察了人民和敌人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指出它们是一对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③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则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而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则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则都是人民的敌人。分清人民和敌人，是正确处理表现在人与人关系上的社会矛盾的首要前提。

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按照毛泽东的分析，这两类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表现在“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阶级和剝削阶级之间说来，除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③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① 所以有这种性质上的不同，是由于这两类社会矛盾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产生的。敌我矛盾是人民同各种敌对分子之间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极少数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从各方面进行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活动，因此，人民群众同他们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与此相反，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范围内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内部以及他们相互间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所以，矛盾双方的一致性为主要的基本的方面。

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对打倒的剥削阶级分子通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变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的公民，就是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② 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由于历史上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在各方面遗毒的影响，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势力、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势力的拉拢腐蚀，使得某些社会成员和我们党以及政府内的个别成员腐化变质，蜕变为腐化变质的犯罪分子，这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的表现。

除此以外，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阐明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正确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0页。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针等问题。从而形成了崭新的、系统的、两类社会矛盾的科学理论，成为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强大精神武器，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

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在关于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基本内容中，一个突出的并且特别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的社会矛盾总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意义是什么？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就是把这个问题的作为我国全部生活的主题；并在阐述这个主题上表现了他的理论创造才能。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在阶级社会以及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但仍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都表现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然而，这两类矛盾在不同社会的矛盾总体中所处的地位则是各不相同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指出：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以基本矛盾为根源，又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社会矛盾。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国内形势，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

……”^①毛泽东的论述与“八大”的论断一致，显然他已明确地看到，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相联系，我国社会中敌我矛盾尽管仍然存在，却是少量的、局部的；社会矛盾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社会矛盾总体中上升为突出地位。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我国社会中除敌我矛盾以外的各种复杂的、千头万绪的矛盾，用一个词——“人民内部矛盾”来概括。他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②这样，他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来了，这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还是第一次，在人类认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人类社会存在了几千年的阶级斗争，第一次为马克思恩格斯当作社会主要矛盾所认识，并当作推翻旧社会的武器一样，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第一次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人民内部矛盾，并把它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而且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按其表现特征分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主要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这些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有多种类型、多种层次，它们相互交错，相互影响。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处于主导和突出的地位，是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紧密相联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科学地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对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

路线的继续和发展。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多样的人民内部矛盾，其产生的根源也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政治和认识方面的。但引起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深刻最主要的根源则在经济方面。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了，社会财产丰富起来，人民内部的许多矛盾和实际问题，如升学问题、就业问题、工资问题、住房问题等，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所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的主要根源。

这里需要搞清楚的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以及人民内部矛盾三者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面貌和发展，也制约和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矛盾。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则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既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主要根源，又具体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只有积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使生产力得到高度的发展，才能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的各类矛盾，又会反过来促进主要矛盾的解决，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当前我们搞好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都是一致的。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最终通过人与人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表现

出来，这样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了。

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由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各自的特殊性，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要解决好处理的方针和具体方法。毛泽东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所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原则和方法。

人民内部矛盾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毛泽东指出，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党和国家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但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此外，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年龄的人们之间也有矛盾，工业与农业间的矛盾，工业内部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矛盾，工业、交通和能源间的矛盾，生产、建设和流通相互间的矛盾，生产建设同科学文化教育间的矛盾，以及文化科学领域中的矛盾，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等等。因此，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有多种类型、多种层次、错综复杂关系的庞大矛盾群。

如前所述，在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解决矛盾的原则和具体方法也不同。毛泽东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

两种不同的方法。”^①即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专政即镇压和强制的方法，就是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按照法律的程序，对敌视和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敌对势力、严重犯罪分子，依法拘捕，依法治罪，判处有期徒刑，剥夺其政治权利等，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所谓民主的方法，即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和疏导的方法。毛泽东把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②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历史经验的总结，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这个公式中的第一个“团结”是愿望，是出发点。在人民内部讲团结，是这个公式的灵魂，有没有团结的愿望和动机，是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前提。当然，讲团结不是不要批评和斗争，不是主张一团和气。恰恰相反，人民内部不管是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矛盾，只要是带有某种原则性的，都有一个是非的问题。为此，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当然，开展批评也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不能无限上纲。第二个“团结”是目的，就是通过批评和斗争，用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此，团结是开展批评或者斗争的起点和归宿，批评和斗争是否正确，归根到底要看它是否达到了新的团结。

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原则、总方法。而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1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9页。

人民内部矛盾是多种多样又错综复杂的，因而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还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多样化的状态和特点，把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个原则，具体化为一系列的具体方针和方法。这就是：解决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也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或右；而解决人民内部在物质利益方面的矛盾，则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以国家为代表的人民长远利益和生产单位的集体利益以及劳动者个人的目前利益之间的矛盾；解决人民群众同政府机关的矛盾，既要采取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又要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合理的组织机构和制度，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特别要在执法部门和直接掌握人、财、物的岗位，建立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解决共产党的矛盾，采用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使党员的意见、建议、批评能及时准确地反映上来。在党内生活中发扬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支持和保护党员依据党章规定的权利发表意见。对侵犯党员民主权利，压制党员批评，进行打击报复或诬告陷害的人和事认真查处。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个人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必须服从和执行集体的决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无组织无纪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各行其事的行为，任何党员违反党的纪律，都必须给以应有的处理；对于科学文化领域中的矛盾，采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对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矛盾，应在爱国、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民主党派协商议事；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矛盾问题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既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

当然，在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还必须辅之以社会主义法制。在人民内部有的人触犯了党纪国法，这就不能仅限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还要绳之以党纪国法，有的还要依法坐牢。毛泽东说：“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有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的内容极其丰富，并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化和成功经验的结晶。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篇章，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的逐步实现，人民内部矛盾还将以新的内容和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369页。

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就要努力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尤其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①

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斗争虽已不是主要矛盾，但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它主要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同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的斗争。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性质和特点的问题，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八大”时就明确指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

^①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页。

级也在消灭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但是，“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①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②后来又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在我国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③毛泽东提出，我国现在的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④这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向自然开战，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幸的是，在此后不久，毛泽东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他自己的正确思想，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上的失误，酿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悲剧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合乎实际的论断。中国共

①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③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3页。

④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势的科学概括。

我国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这些敌对分子包括：原有的和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极少数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进行活动的目的和结果，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他们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人民同他们的斗争仍然是一场阶级斗争。

我国在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之后，阶级斗争之所以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具有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的根源和条件：第一，历史上剥削阶级的各种影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遗毒，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可能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消灭而立即消失。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会腐蚀我们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使其中的一些人蜕化变质，成为新剥削分子、新反革命分子。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有许多不完善和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它既不可能完全防止某些社会成员的腐化，也不可能杜绝极少数剥削分子和敌对分子的产生。第三，剥削制度虽然在大陆上消灭了，但作为我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还存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剥削阶级思想必然通过各种渠道向内地进行渗透和发生影响。第四，我们还处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某些敌视我国社会主义的势

力还会对我国进行侵蚀和破坏。随着对外开放，同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往的增多，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输进我国，腐蚀人们的心灵。总之，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是一种与国内外相联系的国际现象，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国家里就会有阶级斗争的反映，我国的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完全消除。

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既不同于以往的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也不同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它有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是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的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因而斗争的基础不同。历史上的根源于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是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了剥削制度，也就消灭了产生阶级对抗的基础。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是根源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而主要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新条件下的继续。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①

第二，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制约着社会结构中的其他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55页。

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

第三，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斗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原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总是要竭力维护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和劳动人民为打破统治阶级的阻碍，就必须进行夺取政权、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激烈斗争。所以，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的阶级斗争就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直接动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情况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直接动力。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由于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四，阶级斗争的范围不同。以往的阶级斗争是全社会规模的，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并占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所谓“一定范围”，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诸种矛盾中，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只是阶级斗争残余的反映，并且不占主导地位，而大量存在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矛盾，已经失去了根本利益对立的阶级对抗的性质，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而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

第五，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方法不同。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都是各个阶级围绕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展开的生死大搏斗，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着自己的彻底解放必须浴血奋战，目的是夺取政权。因此，斗争形式是短兵相接，暴力对抗，武装斗

争是这种对抗性斗争所采取的最高形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掌握了国家机器，这时资产阶级还拥有赖以剥削工人的经济实力，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优势。无产阶级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必须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因此，阶级斗争有时要以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对于残余的剥削势力、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则不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是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力量，以法律为准绳，按照司法程序来解决。

第六，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不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激烈，最后引起社会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斗争”，这种斗争尽管在某种条件下，即在强敌入侵，国内残余反动分子蠢动的时候；在国内某些政治力量胆敢与无产阶级较量的时候；在国际上反共逆风，国内残余敌人遥相呼应的时候；在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犯错误并为坏人所利用的时候，还有激化的可能，但从发展的总趋势看，是逐步缩小、减弱和缓和，直到最后消亡。

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状况、根源和基本特点，既可以同以前社会的阶级斗争区别开来，又可以和未来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社会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也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好地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避免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第八章 毛泽东辩证思想方法 和工作方法论

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实际工作领域，作为指导各项工作的方法论，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与集中，群众路线，以及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矛盾分析方法，等等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生动地体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这些方法论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又是给予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①。

第一节 科学的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解决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相一致的问题，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性的原理。他指出，世界观就是方法论，要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必须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作为方法论。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7页。

一、世界观就是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即任何世界观都起着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作用，这是一切哲学的共同点。但是，在全部哲学发展史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科学地解决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正确地反映了世界的本来面目，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进一步论证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他指出，方法论不是别的东西，它是世界观的体现。他在延安抗大讲课的《辩证唯物论提纲》中说：“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什么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这里，毛泽东肯定了方法论不是别的，是世界观在认识和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出发，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应用。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①所以，要达到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的，就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懂得了它，就得到了一种科学的武器，在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就有了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和办法。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

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并不是说世界观直接就是方法论。世界观是对于世界本来面目的反映。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和实际运用。从世界观到方法论，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过程。世界观作为一种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是一种理论形态，是普遍真理，是一般的東西。而任何实际的情况都是个別的东西，都有自己的特点，有它自己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普遍真理只反映各种情况的共同本质，而不能完全包括它的特殊的东西，不能代替实际情况。普遍性的理论只有同具体客观实际相结合，找到普遍原理在具体实际中的特殊表现，从而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办法，才能发挥其对具体的客观实际的指导作用。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教条主义者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时就是方法论，不了解世界观与方法论一致的特点。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们看问题、处理工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因而也就不能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毛泽东根据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的原理，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同具体的实际相结合。任何理论，如果不同客观实际相结合，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还表现在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同时也是两种方法论的斗争。毛泽东指出，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都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都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各个阶级都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因此，世界观的斗争，必然表现为方法论的斗争。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用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来解释世界，以维持他们的统治；而革命的人民总是用辩证法的世界观作武器来同反动派作斗争。所以，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两种方法论的斗争。在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斗争中如果不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就会产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在实践中就会犯错误。

二、方法论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形成的一整套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为哲学的实际运用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整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解决了哲学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哲学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去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同时，毛泽东又对其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采取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使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进一步实现了哲学同人民群众相结合，从而为哲学的实际运用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二，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性的原理，表明方法论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列宁说，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运用哲学来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制定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他们认为唯物主义缺少了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和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这就是说，哲学没有方法论的内容，就不能体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就不能发挥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哲学也就不能发展。毛泽东所提出的一整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例如他在说明调查研究的方法时，把调查研究作为取得正确认识的重要环节；他在解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时，把认识论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说明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这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他在阐述矛盾分析方法时，提出一切事物都具

有两面性，都是一分为二的，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等观点，就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

总之，哲学原理作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用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是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崭新的事业，它要求严格地按照科学方法办事。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然会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进一步现代化、科学化，必然会提出新方法，使毛泽东创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的发展，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

第二节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根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共性与个性这一辩证法原理和实际工作经验，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采取的科学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

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与党的群众路线

一般和个别辩证关系的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就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所谓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

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①它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方法的组成部分，是不论任何单位，不论进行任何工作，都应普遍采用的方法。

毛泽东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的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②这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上级的一般指示进行一般号召是必要的。否认一般号召的指导作用，满足于狭小范围和部门的个别工作，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这样的领导者就将成为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领导者。但是，一般号召又必须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因为离开个别指导，不仅无法检验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不能使一般号召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且还会使本来是正确的—般号召失去具体的丰富的内容，变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空洞的抽象的口号和公式，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样也就无法进行普遍的指导。一般的重要性只是在于它对同类事物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它能指导我们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代替这种分析。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仍然要从特殊（或个别）开始，而不能从一般开始。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不论做什么工作，在没有取得具体经验以前，都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而应该选择若干个别单位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又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的工作方法，是把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紧密结合起来的

^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0页。

^②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页。

正确途径，体现了人们认识事物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发展过程，体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法。首先，所谓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作为一般号召，从认识的秩序来说，就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认识一般的事物，把握许多事物的共同本质。这个一般号召的形成，同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①其次，发出一般号召之后，紧接着就要深入个别单位作个别指导，也就是以已经认识的一般事物的共同本质为指导，继续认识尚未认识的其他具体事物。这个具体指导的形成，同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过程也是一致的。如果满足于一般号召，不作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就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同时，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又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公式。因为，无论从个别到一般，还是从一般到个别，都离不开领导和群众这两头，都要求领导人员深入群众，实现领导人员与广大群众的紧密结合。

二、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形式。

第一，分类指导法。就是在区分相同与不同类事物矛盾的基础上，对同类事物的矛盾采取相同的方法去解决，对同类事物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也是把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的重要工作方法。

第二，“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任何地区、部门、单位的工作，其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总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情况。先进和落后总是少数的，中间状态总是多数的。抓先进的典型，可

^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以带动中间和落后，推动全面工作；抓落后的典型，使落后变成先进，也可以促进中间和先进。在实行个别指导时，强调抓好先进和落后两种典型，以带动大多数，这也正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

还有“解剖麻雀”法，由于其内容极为丰富，将另辟一节进行阐述。

毛泽东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①紧接着又说：“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②这是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关系的原理，提出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体现了领导和群众、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节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人们在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思考问题的时候，都要进行分析与综合。这是正确认识事物的一种科学方法。毛泽东曾以人们对延安的认识为例，生动地说明了在观察基础上的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他还把这种方法称为“四面受敌法”，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研究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方法。

一、分析和综合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

所谓分析，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部分，把一个复杂的事物分解为几种简单的因素，对它们加以分

^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②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1页。

别研究；所谓综合，就是按照客观事物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从总体上把握客观事物，把对象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它们加以综合研究。由于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分析，最基本的是对事物矛盾的分析；综合，最基本的是对事物矛盾的综合。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事物矛盾中各个方面的特点；综合矛盾，就是把事物矛盾的各个方面，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对事物矛盾总体的认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人们要从总体上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就必须首先对它的各个部分逐一加以考察，就要运用分析的方法。如果不把事物的整体进行分解，不了解各个部分的性质和状况，就不能清晰地认识事物的整体。毛泽东指出：“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①“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②这就告诉我们，认识客观事物离不开分析的方法。

但是，人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分析上，还必须进行综合。由于分析只着眼于事物的局部的研究，人们运用分析法所获得的认识，还只是对于事物的某个片断、侧面和局部的认识，不是对事物整体的认识。如果只有分析而没有综合，就容易把人们的认识局限在事物的某个部分、片断或侧面，人们对于在一个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了解就会变成孤立的、静止的、死板的东西，人们就不能形成关于这一事物的整体的认识。因此，为了认识事物的整体，就要把从分析所得到关于该事物各个方面的认识综合起来，就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2页。

要运用综合的方法。只有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才能从研究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

运用分析与综合构成概念和理论系统，以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在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例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从问题的提出开始就运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通过对目前形势各个方面、各种因素的深刻分析，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然后又以这个基本特点的矛盾展开为前提，继续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了在当时形势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态度，分析了中国民族革命营垒的情形，也分析了反革命营垒的情形；最后综合上述这些分析得出了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结论。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科学的分析是科学综合的前提。毛泽东在注意正确分析问题时已经注意到运用正确的综合，从而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是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方法的具体体现，是调查研究中必须运用的主要方法。我们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引出其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就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分析矛盾、综合矛盾的方法，是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方法论的运用和体现。因此，运用这一方法，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矛盾分析的根本方法。这就是说，我们对事物矛盾的分析与综合，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它包括：分析与综合所依据的材料必须是客观的，又是全面的；分析与综合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分析与综合不能片面抓住事物矛盾中的某一方面、某一联系，必须全面研究它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只有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与综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二、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毛泽东提出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分清主流和支流、“弹钢琴”、胸中有数等工作方法，都体现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道理，因而也都可以说是分析与综合的具体方法。

第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从具体事物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以了解总体的方法。这里虽然侧重讲的是分析，但也包含着综合。掌握这一方法，就是既要分析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特殊性，又要将对矛盾各方面特殊性的认识综合起来，以把握事物矛盾的整体，把握矛盾各方面在总体上的相互联系，提出适合不同事物矛盾的特点的具体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说，首先要有精细的正确的分析，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综合。

第二，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从事物的现象的分析入手，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它要求我们，认识任何事物都要既深入分析该事物大量的现象材料，分析现象与本质的多方面的联系，又要将对现象和本质的分析综合起来，以达到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目的。就是说，只有通过深入的分析与综合，才能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也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过程。

第三，分清主流与支流，是从事物发展的主流与支流的分析与综合中抓住事物发展主流的方法。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主流与支流，人们认识事物都不但要了解支流的东西，更要了解主流的东西，了解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事物发展的本质。要分清主流与支流，就要进行分析与综合。

第四，“弹钢琴”的方法，是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展开其它方面工作，以求协调发展的方法。要弹好“钢琴”，首先必须对整个“琴键”及各个部分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全面的深入的认识，以便在分清主次的基础上，使各个手指协调动作，从而奏出好的曲子来，取得预想的工作成绩。所以也要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

第五，“胸中有‘数’”，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强调要学会“胸中有‘数’”的方法，正是因为有些人往往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这个方法正是基于对事物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的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这也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总之，只有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对事物矛盾做出客观的、全面的分析与综合，才能正确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而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保证工作的胜利。

第四节 调查研究的方法

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要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必须先有对客观情况的了解，要了解客观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查研究。

一、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

调查研究是了解情况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人脑只是一个加工厂，其原材料是来自客观世界。要形成正确的认识，首先需要有大量的实际材料。而要掌握材料，其基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说：“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①人们从事的各行各业的工作，尽管具体的特点和情况彼此各不相同，但无论多么千差万别，总是同一定的客观对象打交

^①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

道，都要从一定的客观条件出发进行工作。因此，要搞好各种工作都必须要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前提，离开实际调查，没有材料，情况不明，就不会产生正确认识，也就不可能有好的处理。所以，毛泽东一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调查既要掌握事物的全貌，又要特别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重点材料，这样才能为作出正确的结论，奠定可靠的基础。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要找出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性，以形成正确的认识，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通过调查，掌握材料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如果只掌握材料，不整理，不认真研究，只是一堆死材料，不能从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必须把调查和研究结合起来。调查和研究的过程，既是一个搜集材料的过程，又是一个分析综合整理材料的过程。毛泽东说，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解决矛盾就要把问题提出来。而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必须在深入调查、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作指导，进行分析综合。这是通过调查，详细占有材料的第一步。第二步利用分析的方法把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第三步就是用综合的方法，对各种材料加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整理，得出正确的结论。当然，这种分析与整理不是截然分开的。调查研究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基础。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客观规律的反映。要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首先必须有大量的实际材料作依据。所以，毛泽东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而党的“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

政策，那是危险的。”^① 只有从实际出发，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的占有材料，才能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

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是正确执行政策的前提。正确的方针、政策反映了整个客观情况的一般本质、规律。它是适合于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一般原则。而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则是千差万别的。因此，要正确理解和执行政策，就必须把政策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从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具体的方案和办法，才能正确执行政策。

人们对于客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为了取得正确认识，必须长期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调查研究之所以是长期的，首先是由客观对象的复杂性和变化发展所决定的。其次，检验认识和发展认识也需要作长期的调查研究。

二、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进行调查研究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态度是搞好调查研究的根本条件。

第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理论，而是为了从客观实际中找出其固有的规律性。因此，调查研究，首先必须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了解。也就是说，对客观事物的了解，不能附带任何主观的成分，必须从客观事物本身出发。所以，毛泽东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② 他指出，在客观事物面前，要老老实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既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3页。

②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0页。

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必须从客观事实中引出结论，而不是用先入为主的“框框”去套客观事实，或用事实证明自己某种先有的观点、理论。

第二，要有尊重群众，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

调查的内容主要是群众的实践，必须树立向群众学习的态度，跟群众交朋友，群众才能讲真话。

搞好调查研究，还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毛泽东总结自己作调查研究的经验，论述了许多作调查研究的方法。其主要方法有：

（一）“走马观花”法。

“走马观花”只能作为面上的调查之用。所谓“走马观花”，就是作粗略的、面上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法包括自己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的直接调查，也包括在很短的时间内研究各地送来的书面报告和统计数字的间接调查。

“走马观花”的好处在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事物的轮廓，及时掌握情况和问题的数量方面，以便做到“胸中有数”。这就是说，面上的调查可以了解事物的量的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整个运动状况和发展趋势。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讲，随时进行面上的调查，是很必要的。但是，“走马观花”不深入，它只能看到矛盾的大致情形，不能对矛盾的各个侧面及其特点以及事物的内部联系有深入的了解。因为第一，“走马观花”是一种粗略的调查，走一走，看一看所得的材料，大都是关于事物的外部联系的，不全面的感性材料，不能作出科学的结论。第二，别人送来的书面材料，往往是第二手的材料。在形成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即使是报告者作了实际调查研究所写出的，但是，由于各人的立场、观点不同，在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问题观察的角度就不相同，从而材料的取舍，分析问题的深度也就不相同。而且，即使报告的材料、结论都是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的，但它对于看材料的人来讲，乃是一种间接的经验，是表现为一种确定的东西。然而

客观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领导者要能作出反映事物当前状况的科学结论，单凭着材料、间接了解情况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实际，亲自作典型调查，才能取得可靠的实际材料。

（二）“下马观花”法。

“下马观花”是深入实际，进行典型调查的方法。所谓典型调查，就是从许多事物中，找出有代表性的个别，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是要使人的认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总结出普遍的共同的规律性。毛泽东把这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叫做“解剖麻雀”。通过“解剖麻雀”，得出“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的结论，也就是从个别中看出了普遍性。科学研究中，生产中对于产品的抽样分析鉴定，也是一种典型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应用到各个领域中去，提出了“一切经过试验”的方法。试验就是典型调查研究的一种形式，它既是取得认识材料的方法，又是检验已经形成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能否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一种方法。

搞好典型调查，必须根据调查的目的，正确选择典型。典型调查是为了从个别中认识同类事物的共同规律。因此，典型就必须有代表性。毛泽东说，调查的典型可分为三种，即先进的、中间的与落后的三种类型。每类调查两、三个，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情形了。这就告诉我们，要根据事物发展不平衡的情况选择各种不同典型，通过调查各种典型，就能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貌，并从中总结出事物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开调查会。

开调查会可以直接同时听到群众中的各种意见，能够得到各种材料。所以，毛泽东说他使用这个方法得到了很大的益处，是一个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但是，要开好调查会，必须作到：第一，要有调查的纲目。调查纲目就是表明研究的目的，反映调查者要了解事物的范围和深度，要通过调查研究解决什么问

题。毛泽东指出：“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纲目发问，……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① 有了好的调查纲目，调查才有明确的方向。当然，调查的纲目也不是一经作出，就一成不变，而是要在调查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改、补充、完善。第二，要选好到会的人。毛泽东指出：“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② 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了解的情况很多，容易收到调查的效果。至于到会的人数多少为宜，则必须依靠调查人的情况而定，但无论如何要有群众性。第三，要讨论式的开会。参加调查会的人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他们各自所提的意见也难免有片面性。为了深入了解情况，调查会必须是讨论式。调查人要自己主持会议，适当指挥到会的人，要按照纲目提出的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这样，一是使群众没有顾虑，敢于讲真话。二是通过讨论，把问题引向深入，然后才有可能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作出正确的结论。

当然，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可以随着调查研究的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或改变，而且还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总结出新的更科学的方法给予丰富和发展。但是，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才能获得正确认识，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的思想则是普遍有效的。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引入认识论，作为取得正确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①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7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第五节 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我们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工作经验、贯彻群众路线过程中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民主和集中及其相互关系

所谓民主，就是让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所谓集中，就是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民主和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群众不敢讲话，大家不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集中正确的意见，实行集中领导，就无从谈起，集中也就失去了实际的内容。集中是民主的深化和保证，没有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形成的正确意见作指导，民主就不会有正确的方向，也不可能保证实现。离开民主的集中和离开集中的民主都是错误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与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这就是说，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我们的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制度，实际上就是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就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它反映了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反映了党的群众路线。

二、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对于人们来说并

不陌生，但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却有许多人是不很清楚的。有些人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看成是互不相容的东西，认为强调民主就会削弱集中，强调集中就会压制民主。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或者把“集中”变成“家长制”，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或者把“民主”变成否认集中领导，搞无政府主义、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这些人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了解和运用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就必然会造成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以及贯彻群众路线联系起来，深刻阐述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造出好的成品来。”^①而 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则正是这种加工原料的唯一来源。所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②因此，只有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作历史的考察，才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820页。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820页。

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出适宜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从而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在这里，毛泽东正是把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作为一种重要的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加以提出与阐述的，并把它与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就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所以把民主集中制看作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是因为在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中，进行调查研究，实行群众路线与坚持民主集中制具有某些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表现在它们有着共同的对象和目的，即都是要面向群众，到群众中去寻求真理和实现真理，以便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且表现在它们有着大体一致的工作过程和认识过程。领导者发扬民主、从群众中集中正确意见的过程，就是向群众作调查研究的过程，也就从个别到一般，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而领导者实行集中领导，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正确意见拿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过程，则是继续向群众作调查研究的过程，是把领导者的观点、思想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实行调查和研究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过程。民主集中制与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这种一致性，充分显示了民主集中制作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在认识论上的意义。采取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重要保证。离开民主讲集中与离开集中讲民主，都只能导致认识上和行动上的错误。只有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实行正确的集中，把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

三、实现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在实行民主和集中相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

第一，广开言路，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就是要搞“群言堂”，让群众讲话，让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一锤子定音”。这是一个民主作风问题，也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邓小平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①只有广开言路，才能广泛听取到群众的意见，才能有正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而要真正做到广开言路，就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第二，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讲的就是要全面的看问题。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有的可能是真理，有的可能带有片面性，甚至错误。只有将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使认识中的矛盾得到充分暴露，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进行分析、比较，才能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②毛泽东深刻地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③所以，经“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④对于不同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要听，少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因为真理有时可能在少数人一边。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134页。

②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135页。

③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4页。

④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页。

第三，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和集中的矛盾，领导和被领导者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的矛盾，一般地说来，都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指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①“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②“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③邓小平也说：“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到达这个目的。”^④所以，开展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实行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重要方法。

第四，实行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集中；强调集体领导，同时也要有分工负责的制度。毛泽东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⑤邓小平说：“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页。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1页。

③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8页。

④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21页。

⑤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页。

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①这就是说，集体讨论和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工作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这样，既可以避免个人说了算、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病，又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00页。

第九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从此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其历史条件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相对照，都面临着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艰巨任务，都要求回答共产主义运动中新的历史课题，都集中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斗争。

第一节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恢复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斗争：一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的错误，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另一条是反对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在斗争中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总结概括出来的，它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这条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然而，党的这一思想路线遭到林彪、“四人帮”

的肆意践踏；林彪搞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弄得支离破碎，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让人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四人帮”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鼓吹“永远按既定方针办”，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当时党中央的负责同志推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的错误方针。因而，党内存在着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及时彻底地纠正，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没有得到恢复。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力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邓小平领导和支持了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同年5月24日，在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②在1977年7月21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③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

①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6页。

② 邓小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5页。

③ 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40页

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总的来讲，我们党对“两个凡是”的分析批判，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主要内容：

第一，指出了推行“两个凡是”的目的是要原封不动地继续和保持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如果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改变，那么，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难以纠正，我们党长期以来所犯的“左”倾错误就难以清除，拨乱反正的工作就难以深入展开。

第二，指明了“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割裂和歪曲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说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是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凡是毛泽东说过的每句话都要坚持，抓住毛泽东说过的某一句话不放，就会把毛泽东思想体系搞得支离破碎，不能根据它的科学体系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第三，指出了“两个凡是”的危险，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毛泽东的话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讲的。如果把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置之不顾，死守着原来的字句不放，势必导致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总之，“两个凡是”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维持“左”的思想指导，阻碍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后，不仅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批评和抵制，而且也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反对。在这种历史条件下，1978年我国展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重新统一到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基础上来，并且重申毛泽东在一贯强调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中实践

第一的观点，重申只有千百万人民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常识，但多年被遗忘了，甚至被搞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的确击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就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正如邓小平所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①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②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首先是坚持这一条思想路线的。坚持和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坚持就要发展，发展才能坚持。从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新时期确实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普及、大提高、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忠实地继承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且发展了这条思想路线，谱写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篇章。

第一，揭示了实事求是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

①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2页。

②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2页。

位和作用。

我们党把实事求是提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党中央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①这一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高度概括，揭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华，阐明了实事求是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同时也告诉我们，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基础和精髓；不懂得实事求是，也就不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弃实事求是，也就等于抛弃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用相当多的篇幅阐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历史发展及其重要性。他说：“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呢？这种根本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②这就是说，抛弃实事求是，就必然走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了泥坑。邓小平的这一精辟论述，是对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高度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为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增添了新的颗粒。

第二，阐明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方面。

我们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实践经验，对党思想路线作出了新的概括。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①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64页。

②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13页。

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①这一表述以极简洁的语言，说明了党的路线的基本点。这决不是对过去思想路线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的充实和发展。诚然，毛泽东创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也分别论述了这四个方面，但他并没有把这四个方面完整地有机地统一起来，赋予它明确的思想路线的规定。我们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作的完整的科学的新论断，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有机统一。这就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并使之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展开。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但斗争并没有结束。一方面，“左”的思潮即“两个凡是”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致使一些干部不能自觉地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伟大意义，也不能从根本上去认识“两个凡是”的错误及其危害性。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右的思潮，他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作了错误的理解，误认为解放思想可以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有的人甚至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过时了”、“无用了”，并利用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提倡解放思想之机，大搞无政府主义，搞大民主，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两种错误倾向，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严重干扰和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围绕着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一方面继续克服“左”的、“两个凡是”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来自右的、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

^①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2页。

误思潮进行回击。简单地说，既要反对“两个凡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指出：“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①这是邓小平针对着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错误倾向，从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角度提出的一条指导性原则。这就是说，只有坚持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为，搞教条主义，搞“两个凡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对书上的话或上级指示照抄、照搬、照转，习惯于“唯上”、“唯书”，必然思想僵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而搞修正主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更谈不上实事求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就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总结我国长期革命和建设经验和针对新时期的现实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可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是相辅相成的，切不可反对一种倾向时，却又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搞形而上学片面性。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

第四，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

毛泽东分别提出和论述过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给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把三者统一起来，深刻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其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确立政治路线的基础，是贯彻实行政治路线的保证。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

^①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2页。

^②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42—243页。

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政治路线，都是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的；凡属错误的政治路线，都是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违背的。如果思想路线不对头，不能坚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那就不能使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贯彻执行。其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其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因此，组织路线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大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②可见，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既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思想路线起着指导的作用。

第五，把实事求是同民主集中制结合起来。

历时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都在苦思着：怎样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致重演？邓小平对这个有关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回答。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

① 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76 页。

② 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78 页。

成了很大的不幸。”^①他还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②他认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的、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必然要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我们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1980年8月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向邓小平提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③所以，邓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3页。

②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3页。

③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307页。

小平一再强调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要坚持党对国家生活的正确领导，党就必须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重要原则，并把它规定在新党章中，后来，新宪法又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又明确地提出：“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领导集体，是保证党的路线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对不负责任、不胜任现职甚至以权谋私的干部，要果断地调整下来。对个人主义严重、伸手要官的人，决不能提拔重用。选拔任用干部要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事，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这就从法律上、制度上解决了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正确关系，为国家民主生活的制度化、法制化奠定了基础，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实行作出了切实保证。

第六，把实事求是同改进工作方法结合起来。

毛泽东创立的唯物辩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指导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科学方法。那种认为这一整套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然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它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坚持原有的一套科学方法的基本方面，而且将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套方法加以改进、丰富和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6页。

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在解决思想路线的同时，邓小平一再强调：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还说：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那就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但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反对不讲实际的形式主义，克服实际工作中那种甘当“收发室”、照搬照抄照转的本本主义弊端，并且指出：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闲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

邓小平为了提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水平，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这说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要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还必须开动脑筋，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思想水平，以利于我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节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恢复、 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清算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从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恢复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本来面目，并且把它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其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一、根据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

第一，我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发展变化。

在我国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历史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正确认识我国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工作的成功与失败。这一问题，党和毛泽东曾作过正确的阐述。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已经处于从属向自然界开战、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地位。可惜的是，在这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并没有坚持和发展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而是在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的基础上，越来越对我国现实的主要矛盾作了错误的判断。把本来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成是阶级斗争，这就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差别以及主要矛盾的转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原则，坚决地纠正了对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恢复并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理论。

首先，坚持了辩证法的客观性，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势。

党中央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和判定阶级的理论，指出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产阶级已不再占有用以剥削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并开始逐步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资产阶级已不复存在。尽管剥削阶级的遗留还存在，并且还会产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刑事犯罪分子，腐化变质分子，以及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因

而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从全国范围来说，毕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其次，否定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提法，恢复并发展了中共“八大”和毛泽东曾经提出过的正确认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合乎实际的科学结论，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这个提法避免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的提法可能带来的理论上的困难，坚持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同时又在肯定社会基本矛盾的前提下，摆脱了长期从政治思想领域去寻找主要矛盾，离开社会赖以存在的总的生产过程（包括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去探索我国主要矛盾的羁绊，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统一起来了。

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提法，有利于正确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问题，有利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逐步实现人类美好的前景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第二，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

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同我国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的，是由客观存在着的主要矛盾及其发展所决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是这样。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既是社会矛盾的一次更为深刻的变动，也是党的工作重心的一次重大转变。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该及时地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1957年毛泽东依据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

的经济和文化的任务。但自那以后，我国工作重点的转移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回顾历史，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所以迟迟不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其原因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错误。其表现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扩大化，接着是1959年进行的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随之而来的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以及1966年发动的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果不仅没有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反而一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把经济建设放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政治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党中央在确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基础。

首先，我们党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主要矛盾，坚决而又彻底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的问题。这是一项涉及面广、问题复杂、既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才能完成的艰巨工作。从而为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党中央反复要求各级党政组织，要把主要精力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级党和政府机构，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认真抓好生产建设，经营管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职工的业务、技术培训，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重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要牢牢掌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必须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

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①所以，就要冷静地客观地观察形势，排除来自“左”和右的干扰，否则就可能犯错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今后除了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那时仍然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容许的经济建设），决不能再离开这个重点。”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国际国内发生这样那样的重大事件，我们党都没动摇经济建设中心。党的“十四大”要求今后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这样做。

再次，我们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也注意了恰当地处理其他次要矛盾，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除了处理好阶级斗争的残余表现外，我们党还坚持为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采取了许多措施，注意精神文明建设，注重民主与法制建设，重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重视环境保护等等。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既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处理好了其他方面的矛盾，使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为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 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为 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①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0月21日。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矛盾依据性质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正确认识与处理不同性质矛盾这一问题上，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一个独创性的贡献，在于把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一般原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特别是运用于认识和处理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对这一矛盾的性质以及解决的方法作出了创造性的说明。

在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矛盾的问题上，我们有过失误甚至严重的失误。究其根源，在于对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党内矛盾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首先，在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虽然存在着对抗性矛盾，但大量的矛盾则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对这些矛盾不必要也不应该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其次，既然在阶级对抗极端尖锐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的大量矛盾属于非对抗性质，当然就更不能设想在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的社会条件下，党内会产生和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需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了。这种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战场即党外战场，移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共产党内部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恢复了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理论。

与此同时，在我国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情况下，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有了明显增加，少数地区还很猖獗。面对这种情况，党

中央一方面指出，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又指出，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划清工作失误同违法犯罪的界限，划清经济上的不正之风同经济犯罪的界限，划清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同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中由于某些制度、办法不完善而发生的问题的界限。这就为在新形势下正确区分经济领域中的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正确地进行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解决对抗性矛盾的问题上，我们党过去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这种方式在革命战争中，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是正确的。然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阶级斗争，就容易混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犯扩大化的错误。所以，党中央在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时候，就没有沿袭过去的老作法，而是既坚持群众路线，又坚决不搞群众运动，正确地区分了矛盾的不同性质，防止了把对抗的斗争形式普遍化，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与发挥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辩证法。

第二，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及其辩证关系的理论，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在民主革命中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使我国出现了国家统一、人民与民族团结的大好形势。不幸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逐渐产生了强调斗争、忽视同一的片面性。结果造成了党内党外无休止的斗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毛泽东辩证法思想运用于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继承与发挥了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理论。其主要表现是：

首先，重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邓小平针对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承认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把同一性视为事物发展的消极的、保守的因素的情况，强调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并且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强调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在总结正反两主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方法开展必要的斗争。如在克服思想战线领导的涣散软弱状态的问题上，我们党一方面反对那种抵制批评、同情以致支持确实犯有错误的人的不正常状态，一方面则反复强调，开展批评应该对需要批评的对象有全面的、深入的了解，要有团结的愿望，要既入情，又入理。这样做，既否定了取消斗争的错误作法，又避免了过火斗争，坚持与发展了斗争性与同一性相结合的辩证法。

再次，依据矛盾斗争的特殊性，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矛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艺术。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的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群众斗争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是很可宝贵的。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我们党对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的斗争则缺乏斗争经验，并且发生过严重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累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许多新经验，尽管有些经验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斗争艺术的丰富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人民内部思想政治上的原则分歧，采取科学的、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坚决废止用对敌斗争的方法解决思想政治上的问题；对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根据其具体情况，或采取经济手段，或

采取行政手段，或绳之以法，或同时采取多种方法去加以解决；对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包括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去解决；无论是解决人民内部的斗争问题，还是阶级斗争问题，都坚持既走群众路线，又不搞群众运动，比较好的处理了各种矛盾。

三、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

全面系统地论述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是毛泽东辩证法思想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突出贡献。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普遍规律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不是城市暴动、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且探索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已经不存在着教条主义的错误。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片面地强调集中统一，使企业失去活力；片面地强调计划经济，否定市场调节，使经济成分日趋单一化；否定多种经济成分的多层次结构等，都与教条主义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和社会发展的道路，是由其本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任务，仍如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那样，是开创一条中国式的道路，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79年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国情，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

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① 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又一次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从事的事业，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②

第二，坚持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出发。

坚持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就是坚持从我国实际存在的特点出发，从中国矛盾的特殊性出发，这既是唯物论，又是辩证法，同时也是使特殊国情与普遍规律达到辩证统一的认识途径。

全国解放以后，我国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又进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邓小平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其特点至少有两个。他说：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之所以说底子薄，不仅是因为我国过去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还因为尽管我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49页。

② 1992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就，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贫穷的国家之一。说我国的底子薄，还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这是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基本事实。再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口多、耕地少。我国有十一亿人口，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过去我们曾片面地讲人多是好事，对人的生产失去控制，吃了大亏。因此，实行计划生育就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我国土地面积广大，但是可耕地很少。人口多，农民多，可耕地少，这是我国所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这些特点自然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必须认真加以注意的。陈云指出，一方面我们很穷，另一方面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现实的情况，是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我国的国情，除了上述经济方面的重要特点以外，还有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特点以及我国所处的国际条件，都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不可忽视的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文化，则是进一步建设我国高度精神文明的基础，而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存在则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肃清。我们是在一个文化、科学与技术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我们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一个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这种国际环境，对我们既有挑战，更有利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

总之，我国的特殊国情，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自然条件、国际环境等诸种因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要正确地把握它，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辩证的分析方法。既要有全面性，又要牢牢把握主要之点；既要看到它的现在，又要

看到它的过去和未来；既要看到它与其他国家的相同点，更要看到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同点；既要作定性的分析，又要作定量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认识我国特殊国情方面，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以前有了更大发展，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关于从一般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论公式。

第三，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曾经指出，由于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我国的特殊国情，这是矛盾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规律，是矛盾的普遍性。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两者统一的结果。一方面，我们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的普遍原则，坚持发展生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经济规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分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矛盾，坚定不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总结了我国30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路。这就是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讲的：“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的道路。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我国的特殊国情一样，也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有机统一。从经济方

① 《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面，我国改革开放 1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营，所有企业都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国家实行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既适合我国的国情，又能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在政治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重新确认及其在实践中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的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方针，既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又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丰富和发展。

1979 年，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不仅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需，而且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第三节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的基本原则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实现战略转移和确定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实行改革开放，建设社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49 页。

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的过程中，使这一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社会基本矛盾与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全面情况，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制定了正确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第一，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不过，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新的发挥，并把它运用于指导各方面的改革实践。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劳动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直接参加管理国家和企业，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个人消费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而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这是我们今天进行体制改革的基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本依据。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尽管我国的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存在着种种弊端，却阻碍和束缚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深入发展的必然。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因为原来的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来由，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 requirements 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这场新的革命。这场新的革命，是在过去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的。它不是要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这场革命其目的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

第二，深入开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为了推进社会生产的大力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遵循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在积极地、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在生产关系方面，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地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搞“一大二公”，“穷过渡”，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依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要求，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和发展多层次的生产关系，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条件下，不仅允许个体经济、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还允许外商来我国投资办企业。在分配制度方面，建立了

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努力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现象。在商品经济方面，增加了流通渠道，克服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了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试点和推广，增加了企业的自主权，克服了国家对企业统得太多太死的现象，树立了国家机关为企业服务的新观念，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在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方面，我们党经过了一段探索、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党逐步摆脱了那种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形成了新的认识。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初巡视南方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1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市场作用的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所以，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尽快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①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的改革愈益显得紧迫。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还未肃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认识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为了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政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党的“十三大”指出，我们党提出克服官僚主义，要着眼于具体制度的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进一步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建立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等等。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

① 参见：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一项根本制度。”所以，就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除此外，要“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江泽民指出：“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目前，党政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许多单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脱离群众，障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统一认识，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下决心对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党政机构进行改革。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重点要转到加强宏观调控上来。撤并某些专业经济部门和职能交叉重复或业务相近的机构，大幅度裁减非常设机构。精简机关人员，严格定编定员。……要把人员精简同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既改善机关人员结构，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又使大批人才转移到第三产业和其他需要加强的工作岗位上去，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同时还指出：要“加快人事劳动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分类管理体制的有效的激励机制。这方面的改革要同机构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相结合。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①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不仅深刻关注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切实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为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在体制改革中，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

^① 见1992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科学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其一，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具体地阐发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从而把复杂的体制问题理出了一个头绪，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指出，现行经济体制中的弊端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活力，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增强企业活力，关键是赋予企业自主权，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实行政企分开，凡是国家法定属于企业行使的职权，各级政府都不要干预，下放给企业的权利，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都不得截留。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进一步改革计划、投资、财政、金融和一些专业部门的管理体制，同时强化审计和经济监督，健全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方法。合理划分中央与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实现上述要求，就必须明确认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过去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及解决的关键的认识还不深刻，那末，现在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则深刻得多了。

其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指出，我们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改革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消灭贫穷，达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党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成败的最主要标准”。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

要使生产力发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这就是说，搞社会主义，不能忽视生产力这个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个重要思想。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制约很多“左”的东西，统一人们对体制改革的认识，为体制改革的发展扫清道路。

其三，明确了生产关系各方面、上层建筑各部门都要转到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轨道上来。党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把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概括为八项，这八项归结到一点，就是“服务”二字。这对于改革上层建筑，改变机关作风，改变过去长期形成的领导机关不是为基层服务，而是让基层和企业围着领导机关转的局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其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我们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党中央一再指出，改革只能促进而不能损害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这是党中央对过去搞政治运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例如，要根据国民经济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和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分别轻重缓急和难易，有先有后，逐步进行。但在指导思想上，“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①这就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

①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认识的深化，是对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大贡献。

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第一，社会主义民主的科学含义。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社会主义的民主，包括两方面的科学含义。一是从国家的性质来说，是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成了国家主人，在国家政权中居于统治地位；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的不同形式的占有权和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二是从国家的民主制度、民主生活来说，是指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各项民主制度，民主生活的高度发展和高度完善。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前者是决定性的方面，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要求、具体表现和保证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

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中共“十二大”报告、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等，都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又深刻地指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一项根本制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①这就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

^①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从理论到实践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实际出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其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对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建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它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并为这种经济服务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政治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手段。但是，它同时又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不仅要有富裕文明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要有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样，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

其二，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我们国家和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民主是集成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是保障民主得以实现和发展的必然条件和必要形式。民主和集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只有实现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结合，才能正确有效地实现人民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必须以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权利为条件。我们建设

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意味着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按个人的意志自由行动。如果以损害国家、集体和别人的民主权利作为自己行使民主权利的条件，那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权利，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民主需要国家机关来组织实施。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必然的途径和形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她能够协调各部分人民之间不同具体利益的关系，所以，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保证，是共产党的领导。

其三，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法制的统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人往往把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对立起来，认为法制限制人民的民主。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是把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把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力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而社会主义法制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也就是说，只有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和制度化，民主才有可能实现。谁要享受一定的民主和自由，谁就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和纪律，每个人都应该按照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动。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①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因此，江泽民在“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出：“要把民主法制实践和民主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广大干部群众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② 这

①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36页。

② 《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是我们党关于党的领导与社会民主关系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其四，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前提和基础；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是对人民实行民主的保障。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意味着否定专政。邓小平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①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正确处理我国现阶段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

其五，社会主义民主是广泛的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社会主义民主是广泛的民主，它不只限于政治生活领域，而且包括经济生活领域，文化生活领域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在这些领域中实现和加强人民对这些领域的民主管理，既保障人民的政治权利，又保障人民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得到全面实现。

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方法。在人民内部运用民主的方法，开展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相互间的矛盾，纠正错误的思想，宣传正确的思想，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是走向高度民主的条件和表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更加新的历史阶段。党中央把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就把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了战略地位的高度。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障和支持。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55页。

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一个根本任务和目标，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第一，精神文明的科学含义。

关于文明的含义，中共“十二大”报告作了说明。所谓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状态，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精神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种客观世界的同时，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到了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了发展，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一切文明社会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进步，最终都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样，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来阐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就使精神文明的含义，达到了规范化、科学化的高度。

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说法，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是在精神生产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之后才实现的，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恩格斯说：“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

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①马克思也说过，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剥削。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文明也是不断发展的，但是，文明的发展总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谈文明和文明发展史时，是强调同阶级斗争发展史联系在一起。而党中央在“十二大”报告中，论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时，是把文明同人类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连在一起的，是和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一定的文明发展程度，反映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程度。

总之，文明是人类在改造世界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是人们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程度和状态。

第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

党中央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起推动作用 and 保证它的发展方向。两个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和源泉。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物质前提，一切精神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物质设备和手段。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说，都离不开物质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作为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设方面的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

内容，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认识能力才得以改造，人们的道德观念才得到不断地进步。历史证明，精神文明的发展，依赖于物质文明的存在和发展。

精神文明的发展是物质文明发展的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是物质文明发展的精神动力。物质文明不是单纯体力活动创造的，而是人类智力的“物化”，任何社会中物质文明的创造，离开精神文明发展这个条件，是难以进行的。文化科学知识可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处于第一生产力的地位。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从古至今发生的巨大变化，都是人类劳动创造的，是人类知识力量发展的体现。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道德观念的提高，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可以激发人们建设物质文明的革命热情，可以促进新型的人际关系的形式和发展，强有力地推动物质文明的发展。

两个文明建设互为目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有物质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有精神利益的追求。社会越向前发展，人们对精神利益的追求越强烈。人们从事物质文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的要求。人们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于增加社会精神财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为了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断满足和提高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从不同方面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造就一代一代的具有先进思想的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两个文明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化，而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结晶。物质文明的发展，可以转化为精神文明。如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现代化科学文化

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可以转化为物质文明前进的动力。精神文明中的科学文化知识，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成为物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文明中的思想建设部分，可以间接转化为生产力。如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提高，组织纪律性的加强，主人翁劳动态度的发扬，就有助于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物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精神文明的某些方面，发展得比较快，水平也比较高；而物质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精神文明的某些方面却比较落后。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精神文明内容结构的复杂性和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特点决定的。精神文明是由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部分构成的。文化建设部分，如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直接相连的。一般说来，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科学文化比较发达。反之亦然。而思想建设部分则不然，如思想道德观念等，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并不直接与生产力的发展相连，它是对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反映，它要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介与生产力发生关系。所以，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或地区，只要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必然产生反映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社会意识形态。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是相当高的，但是，只要资本家占有制没有改变，反映剥削制度的社会意识形态，从根本上不会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曾经说过，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发展不平衡性原理说明，在我们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生产力较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一样，也一定会成功的。有的人认为，物质文明不发达，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等将来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就自然而然地上去了。这种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可以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物质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列宁在谈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指出：工人阶级一方面要学习做组织工作，建设大工业和城市生活；另一方面要学习全部社会主义文化和文明，否则，就不能实际着手组织社会主义新社会。这就是说，只有“文化和文明”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新社会，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什么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其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门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因此，学习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掌握正确的方向，并且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不致因限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忘却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

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明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处理好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这个“总体布局”是我们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

总结。这个“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着眼于建设。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认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生产发展了，经济理顺了，思想才能理顺。思想问题，不能单靠思想来解决，思想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人们要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同时又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走历史必然要走的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共产主义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丢了这个最高理想，也就会失掉这种力量和精神支柱，就有可能发生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

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现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也就是为党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共产主义理想不是空洞的口号，当前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同各行各业的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结合起来，同各自的岗位职责和人生追求结合起来，立志建设，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干事业。

在道德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的最高尚的道德，但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也不能脱离现实，要照顾到多数人的实际思想水平，不要苛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共产主义战士。在当前要注意对人们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教育人们向善、向真、向美、尊重人、关心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并使这“五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在同志间，在民族间，在家庭内部和邻里间，在人民内部的一切相互关系上，建立和发展平等、互

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注意民主精神和法制观念的教育。高度的民主是社会主义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民主、平等、自由”是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统治提出的口号。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是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的扬弃，与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有原则的区别。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把争取民主作为人民大众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口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民主问题有深刻的发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十分注意这个问题。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①当然，民主精神与法制观念是不可分的。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把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党中央明确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决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②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要加强科学精神的教育。科学文化既是物质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觉悟水平等要素的重要条件。当今世界，科学越来越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力量，成为代表一个民族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应当自觉地依靠科学，发扬尊重科学、追求知识的精神，努力在全民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就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

① 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② 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类先进的精神文明，我们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环境，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杠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高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样，势必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这就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单是经济问题，生产力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文明问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高文化经济，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经济。人们从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搞商品经济要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不仅要知道产品的性能、质量、规格和货源情况，而且要了解消费者的心理以及购买力的投向，还要清楚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及其给市场带来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些，如果没有文化，不懂科学技术，不懂得经营管理，不掌握市场信息，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搞不好的。所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将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要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在理论上，要保障学术自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养成创造性的研究精神，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加理论队伍建设，重视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培养和提高。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鼓励创作内容健康向上特别是讴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有艺术魅力的精神产品。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工作。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以增强其民族自尊、

自信 and 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以焕发出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精神。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准则。只有遵循这个准则，精神文明建设才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才能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第十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一个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一系列哲学理论，作出了丰富和发展，因而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特点，又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特点相一致。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毛泽东哲学思想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特点。

毛泽东哲学思想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主流，是新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因此，它在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独特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在唯物论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

发展了“实践的唯物主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 and 存在的关系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作了深刻的阐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一般地从什么是物质，什么是意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样的命题出发，而是以中国化的民族语言来进行表述的。而又着重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 and 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例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等命题，都贯穿着思维 and 存在同一性的思想。

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他们把存在统一于思维，把客观统一于主观，于是就把仅在将来有实现可能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实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脱离了当前的现实性。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则落后于存在，主观落后于客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克服和纠正党内错误路线，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对错误路线进行清算外，还特别重视从世界观上对错误路线进行清算，以揭露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所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所碰到的论敌，主要是革命内部和党内的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思想。因此，毛泽东在哲学上所批判的对象主要不是以学术理论形态出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而是以主观主义形式出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活动中的唯心论。

毛泽东早在1929年《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接着，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又进一步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一种颇有欺骗表现形式的本本主义。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①总之，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一系列原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从实际出发和从本本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脱离实际的斗争，是毛泽东哲学唯物主义和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基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哲学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毛泽东把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作为共产

^①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上册，第112页。

党思想建设的最主要的内容。因为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反对以主观主义为特征的唯心论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它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突出贡献。

二、在认识论方面，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上，系统论证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经常遇到的关系到革命成败的最重大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无论是犯右倾错误还是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都没有能够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革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以及中国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表明，要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过程。为了在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引导群众去争取胜利，就必须对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后来又为列宁所发展了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对认识真理的辩证途径，进行详尽地系统地阐述清楚。毛泽东的《实践论》直接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

毛泽东的《实践论》，不是从一般地讲认识论原理出发，而是针对从两个极端出发到割裂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哲学倾向，紧紧抓住实践和认识这对矛盾，突出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并以此中心全面开展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系统论述，阐明了认识的辩证过程、认识真理的道路；论述了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运动的全过程，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揭露了党内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等等。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同历史唯物论高度结合起来，使它成为真正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实践论》是一本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专著。后来，毛泽东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在他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深刻地阐明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认识论辩证法。重申了对党的干部和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从而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实践论的根本特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三、在辩证法方面，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的高度，

集中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础上，使辩证法和唯物论统一起来，于是辩证法就成了科学的世界观。从而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就被揭示出来了。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实践需要，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他在进一步总结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应用于认识过程和发展，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明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他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①这个说明和发挥的任务则是由毛泽东来完成的。

在旧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存在着各种纷纭复杂而又相互交错的矛盾，且有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则是世界所罕见的，于是中国就成了世界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这种客观世界复杂的矛盾运动，必然要在哲学上反映出来。但在这许多复杂的矛盾总体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碰到的

^①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0页。

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种客观的辩证法就决定了矛盾学说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而写的《矛盾论》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系统地阐述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辩证法专著。

《矛盾论》不是一般地从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的理论出发，而是针对党内主观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否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紧紧抓住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全面展开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系统的完整的论述。毛泽东在这一书中，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针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要害，系统地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尤其是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从而使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更加理论化和深刻化，在辩证法理论的许多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为了纠正国际上形而上学否认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错误思想，反复教育全党要按辩证法办事，要用对立统一规律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观察和分析国际斗争中的新矛盾，把辩证法运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宝库贡献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的辩证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还善于把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及领导方法体系，使辩证法广泛地普及于群众之中，成为群众手中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这说明，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个杰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家。同时也说明，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篇章。

四、在历史唯物论方面，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上，着重阐明了

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发挥了唯物史观的思想。他在《矛盾论》中，批判了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的双方可以相互转化的机械唯物论观点。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①并对“一定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并且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②这显然深化了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表达得更明确、更彻底，这就反映了毛泽东唯物史观的特点。

毛泽东正是运用这种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剖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又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探索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新概念，明确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立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提出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历

①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页。

②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6页。

来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坚持和发挥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这些基本理论都贯彻了社会基本矛盾的主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是新的一页。

五、在军事理论方面，全面发挥了马克思主义

军事辩证法和认识论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创始人。他在军事科学领域里，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总结了战争的经验，揭示了战争的规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根据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历史条件，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是进行长期的、持久的革命战争，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全面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经验，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规律，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阐明了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面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与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著述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可以说是关于战争的《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战争发展规律，批判战争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杰作。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地、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阐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根本规律，揭露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认识论根源，体现了战争问题上的辩证法。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争

的形势和规模有了新的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这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结晶。十大军事原则系统地阐明了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战法、作战形式、战斗作风以及战斗保障等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并指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还揭示了战争中具体矛盾具体分析的矛盾辩证法，指出要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阐明了战争中的主观与客观、质变与量变、根据与条件的辩证关系。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贡献。

综上所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研究、领导和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形成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体系，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列宁逝世之后的最主要的代表，它在一系列基本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六、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

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转折性的会议。从此，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实践中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继续推向前进，从而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

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辩证唯物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只有坚持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革命和建设才能发展和胜利前进，否则，就必然遭受挫折或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

学体系的观点；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亡党亡国；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党的指导方针。解放思想，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党的思想路线，立足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就是说，解放思想不能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把思想路线的解决，提到了党和国家存亡的高度，提到了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这是对党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第二，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对一般建设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党中央认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建设的规律，还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尤其是要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一切别国的建设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于我们都是重要的，应该而且可以吸取有益的成份，有所借鉴，有所丰富，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但是，如果生搬硬套，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经验。因此，党坚决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还要进一步揭示一般规律在中国的条件下的特殊表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特殊规律。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第三，逐步确立了一条中国式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邓小平说，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这就为确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提供了总的指导思想。所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坚定地把党

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而且逐步地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七中全会总结归纳为十二条，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不断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体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建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民族关系；以“一国两制”的构想促进祖国统一；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第四，深刻阐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曾多次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共十二大报告从我国和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出发，从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发，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概念作了明确解释，对两种文明的辩证关系作了说明，对共产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进行了阐述。所有这些论述都具有新的见解，新的思想，从理论高度和政治高度阐明了精神文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战略中的意义和作用。

“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作全面的总结时，归纳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中，就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条。这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上事实说明，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包括它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中共“十二大”文献以及中共“十三大”以来的一系文献，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范例，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新的结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① 十二大《文件汇编》第29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与现实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目录

第一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
	一、产生的时代特点、历史条件和思想状况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节	在三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一、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
	二、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三、粉碎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胜利
第三节	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完成
	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二、转变的思想渊源
	三、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转变	
第四节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和初步形成（1921～1930年）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1930～1937年）
	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1937～1949年）
	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1949～1957年）
	五、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1957～1976年）
第二章	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第一节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中国化
	一、反对主观主义的理论结晶
	二、主观主义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
	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
	一、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就是实际
	二、从运动着的客观事物的特点出发，就是从实际出发
	三、理论联系实际
第三节	尊重客观规律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
	一、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二、主体的能动性只有人类才有
	三、主体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第三章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一节	《实践论》的问世及其意义
	一、《实践论》的问世
	二、《实践论》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实践论》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传播与普及作出了独特的
贡献	
第二节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
	一、完整地概括实践的内涵及其特点
	二、实践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三、系统地阐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节	《实践论》对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深刻揭示
	一、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及其相互关系

		二、科学概括认识发展的总规律
		三、提出“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
	第四节	《实践论》对认识真理的道路和真理发展规律的揭示
		一、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绝对真理
		二、对真理的认识永远不会穷尽
		三、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第四章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宇宙观
		一、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第二节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矛盾的普遍性
		二、矛盾的特殊性
		三、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与相互转化
	第三节	主要的矛盾与主要的矛盾方面
		一、主要的矛盾
		二、主要的矛盾方面
	第四节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一、矛盾同一性范畴的规定
		二、矛盾斗争性范畴的规定
		三、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四、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第五章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	
	第一节	毛泽东的战争观
		一、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二、战争与革命的关系
		三、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四、战争中人和物的关系
	第二节	毛泽东论战争中认识的辩证过程
		一、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是发展的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指导规律也是变化发展的
	第三节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辩证法
		一、进攻与防御
		二、持久与速决
		三、内线与外线
		四、兵力的集中与分散
		五、主动与被动
		六、全局与局部
		七、胜利与失败
第六章	毛泽东经济建设辩证法思想	
	第一节	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依据我国经济的内在矛盾，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
		二、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的内部关系，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三、正确认识沿海工业与内陆工业的关系，促进工业的发展
		四、正确认识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的关系，促进经济建设的全

面高涨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客观经济规律
 - 一、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尊重中国国情的现实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 三、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相结合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人民生活的关系
 - 一、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 二、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
 - 三、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 第四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
 - 一、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
 - 二、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

第七章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

- 第一节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 一、“社会基本矛盾”概念的提出
 - 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对生产力、经济基础起决定

作用

- 三、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
 - 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办法
- 第二节 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 一、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主要贡献
 - 二、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几点理论探讨
- 第三节 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
 - 一、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理论的提出及其意义
 -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
 - 三、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 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
 - 一、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
 - 二、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第八章 毛泽东辩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论

- 第一节 科学的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
 - 一、世界观就是方法论
 - 二、方法论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 第二节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 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与党的群众路线
 - 二、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 第三节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 一、分析与综合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
 - 二、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具体方法
- 第四节 调查研究的方法
 - 一、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
 - 二、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
- 第五节 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 一、民主和集中及其相互关系
 - 二、民主和集中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 三、实现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方法

第九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和发展
第一节	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恢复和发展
	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第二节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恢复、运用和发展
	一、根据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三、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三节	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一、社会基本矛盾与体制改革
	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在唯物论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发展了“实践的唯物主义”
	二、在认识论方面，从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上，系统论证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三、在辩证法方面，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的高度，集中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
	四、在历史唯物论方面，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上，着重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五、在军事理论方面，全面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和认识论
	六、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